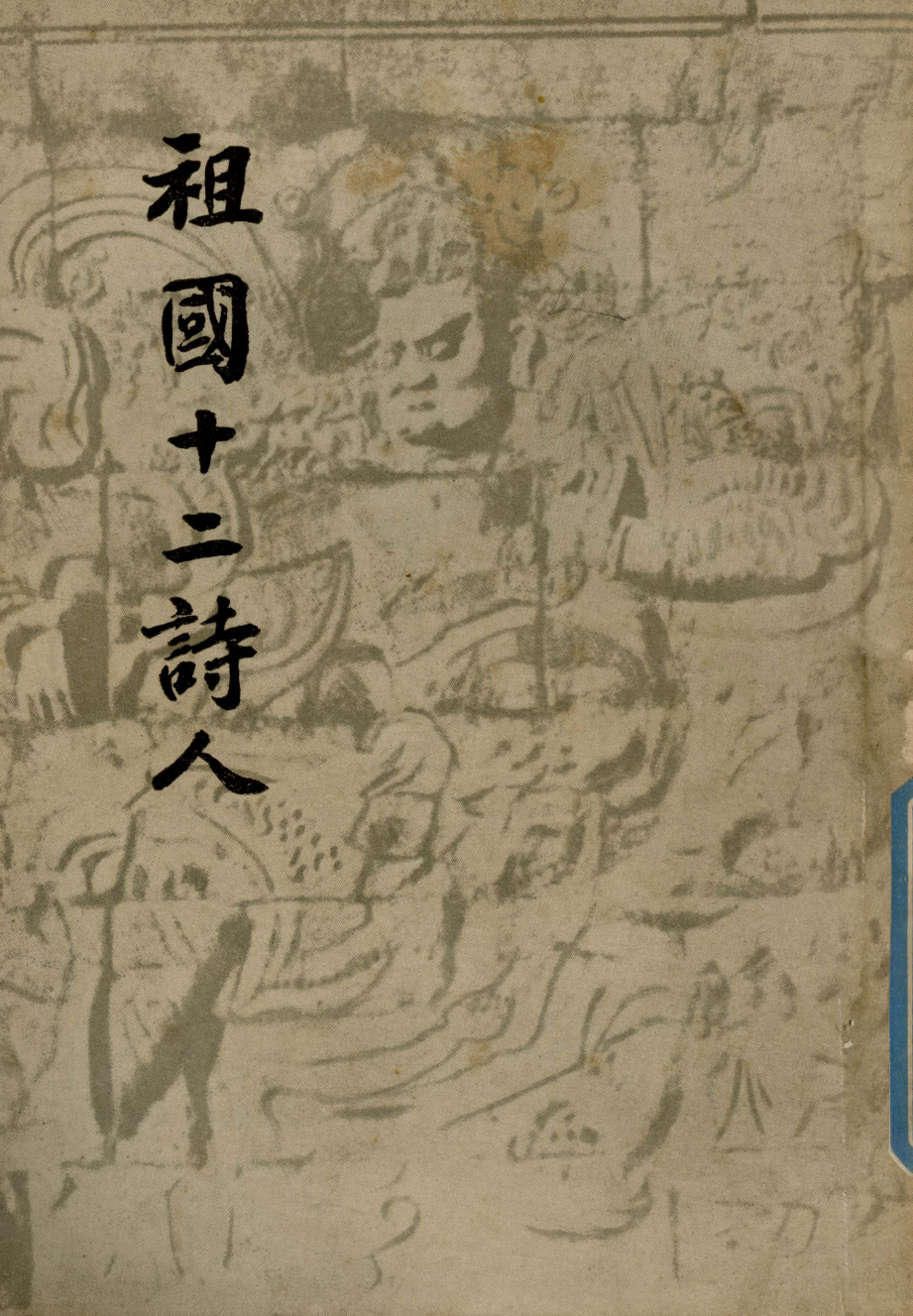


祖國十二詩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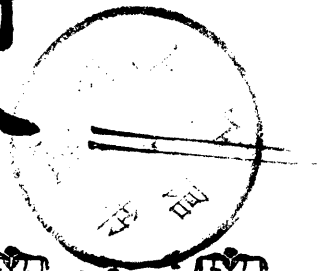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4831B

開明文史叢刊

# 祖國十二詩人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編著



## 祖國十二詩人

每冊定價 8,000 元

32 開本 228 定價頁

---

編著者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 分類 9 書號 6109(詒)

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1—10,000 ■

# 甚麼是中國詩的傳統

王 瑤

## —代 序

中國的詩歌有極其悠久的光榮傳統，我們的歷史上產生過許多為人傳誦的名篇，也有過許多爲人所熟知的偉大的詩人，這些詩和詩人的存在雄辯地證明了我們是一個有悠久文化傳統和有高度創造才能的民族；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也熱愛我們歷史上這些比之任何民族都毫無愧色的偉大的詩人。

這些詩人多少年來爲歷代的人民所景慕，所贊揚，他們的作品爲人民所傳誦，所閱讀，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衷心的愛戴，構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那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我們常常聽見有人說現代的詩人應該學習中國詩的優秀的傳統，應該使今天的詩歌和我們的民族傳統有機地連接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向前發展；這些主張當然都是正確的，但所謂中國詩的優秀傳統究竟是指一些甚麼呢？其中包括哪些主要的特點？這是在學習以前不能不首先解決的問題。這個題目固然很大，可以說也就是一部中國文學史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但我們也不妨另闢蹊徑，從我們歷史上的一些爲大家所熱愛

的，有卓越成就的偉大詩人們的作品中，看他們有哪些共同的特點和精神；歷代的人民是用一種甚麼樣的心情來傳誦和歌頌他們以及他們底作品的；如果我們能在這裏找到一部分答案，那就不只證明了「我們的詩人」的確是偉大的，我們的祖國的確是可愛的，而且也說明了我們究竟應該向他們學習一些甚麼，並發揚他們的哪些方面的積極的精神。

我們的一些偉大的詩人雖然大都是封建社會裏的人物，但我們卻絕不能說他們之爲人稱道和他們的詩之爲人傳誦，是因爲他們滿足了封建統治者的要求，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上的代表；如果是這樣，在提倡的當時也許能夠風靡一時，但他絕不會長久地爲人所稱道傳誦，也就絕不會偉大。文學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東晉的玄言詩，齊梁的宮體詩，在當時何嘗不是倡自帝王貴族，海內效尤，但後來不只沒有人稱贊，連作品也很少流傳了。唐初的上官體，宋初的西崑體，都是倡自帝王臺閣，蔚爲風氣的，不是時過境遷就都煙消雲散了嗎？而爲歷來大家所歌頌喜愛的詩人，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等偉大的名字，卻都是當時非常潦倒的不得意的人物，連他們的作品也幾乎在當時不被人賞識，要經過一個時期以後才被發現，贊揚他們的偉大，而從此就永遠地爲人所傳誦了。白居易曾說過「詩人多蹇」的話，韓愈也說「文窮而後工」，如果我們把這話當作一般的抽象的普遍規律看，那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今天的詩人真不知道有多麼廣濶美好的前途

呢，命運是一點也不「蹇」的。但今天人民自己掌握政權的時代，和過去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都絕不相同的；在封建社會裏，如果他真的是一個「詩人」——詩人，這個尊貴的名字——，他的詩就不能不反映出那個時代的一定的真實面貌，就不能不道出一定的人民的現實要求，這就決定了他和當時掌握實際政權的統治者及其政策方面必然會存在着某種程度的矛盾，而這也就必然地決定了他不可能是當時決定政策或執行政策的當朝顯要；從這種意義講，「詩人多蹇」是當時的歷史的真實，我們歷史上這些偉大詩人的傳記中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因之他們之所以為歷代人民所熱愛，他們的作品之所以為歷代人民所傳誦，就絕不是因為他做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如果他作品中有這種迹象的話，那正是他作品中的消極部分，是使他的作品因之減色的部分，而絕不是那些為人所傳誦的名篇中的主要內容，和詩人自己的主要精神。正因為我們有許多的正視現實和反映當時人民生活要求的詩歌和詩人，才構成了我們民族的偉大優秀的詩的傳統，才真正值得我們驕傲！他們所歌詠的事跡過去了，他們所諷刺的人物過去了，但歷代的人民中間總是有共同的不滿和反抗的要求的，封建時期各個朝代的統治者中間也總是有違背人民利益的政策和剝削階級共同的類似性格的，因此讀者就會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自己所想說的話和所喜歡的思想感情，這就是他們和他們的詩之所以為人民熱愛的根本原因。

這些偉大詩人的事跡和他們的具體作品，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屈原「是一位民族詩人，他看不過國破家亡、百姓流離顛沛的苦況，才悲憤自殺的。他把所有的血淚塗成了偉大的詩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國，與國家共存亡，這是我們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偉大的原因。」（郭沫若「今昔蒲劍：屈原考」）曹子建的「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陶淵明「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都是他們的詩篇之所以爲人喜愛的重要原因。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新唐書」本傳）他做詩是「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古題樂府序」），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他把「因事立題」和「意激而言質」的新樂府稱爲「諷諭詩」（俱見「與元九書」）；這種「善陳時事」的有所爲而作的創作態度，正是他們的詩歌能夠反映了當時社會情況和人民要求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就是他們之所以偉大的主要原因。以後如陸游顧炎武等人的反侵略的愛國精神，黃遵憲詩中的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都是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的真實願望的。我們可以說，凡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如果他真的是偉大的話，他的詩必然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定的現實情況和當時人民的一定的真實要求的；我們歷史上產生了許多這種關心現實的愛祖國愛人民的優秀詩人，這就構成了我們中國詩的一個偉大光榮的傳統。這確實值得我們驕傲；而當我們



向中國詩的傳統學習的時候，當然首先就應該學習這一種精神，學習這一個愛祖國愛人民的光榮傳統。

這些偉大的詩人們在詩的藝術上都是有高度成就的，他們所用的語言和表現形式都是有相當創造性的生動新鮮的東西，這也是構成他們之所以能有偉大成就的原因之一。這我們可以就他們的作品和中國民間文學的聯繫上來考察；我們可以說幾乎所有這些偉大的詩人們都直接（從歌謠）或間接（從保存下來的民間樂府）從民間文學中汲取過豐富健康的營養，而這是和他們的作品在藝術上的光輝成就分割不開的。民間文學的內容極其豐富生動，因為人民的生活和語言本身就是生動豐富的；魯迅先生說：「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七）但民間文學也有它難以避免的缺點；因為封建社會裏的人民還沒有可能掌握文化這一武器，因此民間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自己的機會，所以「里巷歌謠」的發展進步的情形就比較緩慢，藝術就比較粗糙；這些雖然都掩飾不了它那內容上的豐富與光彩，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同上）但這些民間作品的特色一經過詩人們的學習與吸收，給它們以一定的集中與提高，融化在詩人自己的創作裏，就會構成詩人藝術成就中的極其輝煌的部分；像那種生動新鮮的語言

和表現形式。毛主席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產，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拙，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裏清楚地說明了民間文學的寶貴價值，同時也清楚地說明了以民間文學的健康特色為基本內容的加工後的文學作品的價值。而這種情形是完全可以由我們這些偉大詩人們的作品來證明的。

聞一多先生說：「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至於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顯，而為歷來多數的評論家所公認的。」（『人民的詩人——屈原』）曹子建詩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利用民間樂府來敘述時事，這是為後世所艷稱的「建安風骨」的主要內容。陶淵明詩裏像「而無車馬喧」「今日天氣佳」這類近於口語的句子，像「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這類接近歌謠的句子，在那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文心雕龍：明詩』）的時代裏，是非常特殊和突出的。李白最擅長的體製就是樂府歌行，這是和他那「壯浪縱恣，擺去拘束」（元稹語）的豪邁風格分不開的。杜甫固然「讀書破萬卷」，但杜詩之「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新唐書』本傳贊），也同樣是受了樂府和民間語言的很深的影響。他擺脫樂府古題而寫當前社會的如「三更三別」一類詩，

就是發揚了民間樂府的精神的；而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類詩句，也顯然看得出是民間語言的直接運用。白居易的詩更是盛爲「士庶僧徒，孀婦處女」（「與元九書」）等廣大人民所傳誦的，那也就是說他所運用的是爲當時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墨客揮犀」曾記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這是一個爲人傳誦的故事，它正代表着白居易詩的一個重要的特色。以後如關漢卿的「一空依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語）；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的辦法來詠新理新事；都在語言和表現方法上受到當時的民間文學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凡是在詩的語言和表現形式上有新的創造、作品能給人以生動新鮮的感覺的詩人，他們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從民間文學中汲取過豐富的營養。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也是構成中國詩的優秀傳統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其源泉正是由我們民族中多年來人民的豐富生活與豐富語言所產生的。我們要學習中國詩的光榮傳統，也就應該學習這些詩人們的這種精神；向人民生活學習，學習他們的語言，學習他們的自然形態的詩歌形式。

中國文學史上曾經產生過許多種類的詩體和表現形式，這些形式原來都從民間產生的，經過詩人的採用、提煉、集中、提高，才慢慢凝固下來；到後來這些形式被文人們運用得

僵化了，不適宜於表達人民的感情了，那形式也就再沒有人喜歡了，於是就又有新形式的產生。魯迅先生就說過「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的話（「魯迅書簡：致姚克」第十七信），別的各种形式也一樣。而且在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流行也是互相錯綜的，並不是一種僵死了以後才趕快產生第二種；我們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只流行一種唯一的詩體，雖然可以說某一種在當時比較地更為流行。四言盛行的時候就有騷體，有雜言；五言盛行的時候也有六言、七言；律詩昌盛的時候有樂府古風，詞曲昌盛的時候也仍然有各種的詩體。說中國詩的傳統只是五七言體的人，不只忽略了中國詩傳統中的那種最光榮最寶貴的精神，而且僅就字數講也很難說得通。中國的確產生過許多的五七言詩，其中也有許多帶有人民性的好詩，但五七言的形式並不能概括中國詩的傳統的特點。「詩經」大體是四言，「楚辭」是四字或以六字為基礎的長句，樂府的句法很不齊，詞曲更不是五七言所能限制；而上棄「詩」「騷」，下擯詞曲，也不要樂府古辭，還談甚麼中國詩的傳統？把我們的偉大的詩歌傳統限制在字數上去推敲，是永也學習不到我們詩歌的民族特色的。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歌形式既非只有一種，也非一成不變；今天的詩歌要與我們的民族傳統發生聯繫，並求更美好的向前發展，那首先就必須學習我們這些偉大的詩人們的精神；努力向人民生活中發掘，學習民間的語言和民間的自然形態的詩歌形式，然後再來集中和提高，

創造我們的新的民族形式。

這些詩人們還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那種嚴肅的創作態度。屈原的「離騷」，司馬遷以爲「猶離憂也」，那當然不是隨便寫的。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白居易的「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與元九書），都是以一種嚴肅負責的精神從事創作的。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有高度藝術成就的原因之一，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的同人，爲了響應「中國抗美援朝總會」所發出的全國人民增產捐獻的偉大號召，爲了發揚愛國主義的文學教育，也爲了學習批判地接受文學遺產，遂決定集體來寫「祖國十二詩人」這一本書，將所得全部捐獻。我們選擇了由屈原至黃遵憲等十二位詩人，只是爲了配合我們限期寫成的能力，並比較全面地照顧到各個時代和各種詩體的不同風貌，絕不是說我們祖國的詩人中只有這十二人可以肯定，其餘的便都要不得了。自然，我們是着重在選擇那些在歷史上和人民羣衆中發生過較大影響，並在藝術上有高度成就的詩人的；（其中顧炎武並不專以詩著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並不很突出，但他的詩和他的平生行誼是一致的，那種反侵略的愛國精神很值得我們推崇，因此也就選入了。）但這並不是說這些詩人的作品就完全沒有消極的部分，都可以全部肯定；這些人都

是封建社會裏的人物，而且大都還是士大夫階層，那作品中當然是會有一些消極因素的。

不過我們的工作就是區別其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民主性的精華，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就是說要在介紹中同時予以批判，發揚其積極的一面，批判其消極的一面。但這也並不是說我們已完全做到了這一點，這只是我們希望做到的目標，至於實際達到了哪種程度，就很難自信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批判一個歷史人物是一件非常細緻和複雜的工作，我們才開始學習，不恰當的地方一定是很多的，希望讀者和專家們多予指正。又因為書是好些人分頭寫的，中間雖也進行過多次討論，但大家的教學工作都很忙，討論時只能限於內容意見的交換，因此在文筆體例方面就難免有不太統一的地方，尤其是「屈原」和「陶淵明」兩篇，考據稍多，不够通俗，這是要請讀者多多原諒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於北京清華大學

# 目次

甚麼是中國詩的傳統(代序) .....	王 瑤 (iii)
屈 原 .....	浦江清 (一)
曹 植 .....	余冠英 (二元)
陶淵明 .....	王 瑤 (四〇)
李 白 .....	范 寧 (五二)
杜 甫 .....	馮鍾芸 (六六)
白居易 .....	葉兢耕 (九〇)
陸 游 .....	李 易 (一〇五)
辛棄疾 .....	陸容浚 (一二六)
關漢卿 .....	馮鍾芸 (一三三)
孔尚任 .....	范 寧 (一四六)
顧炎武 .....	馬漢麟 (一五五)
黃遵憲 .....	王 瑤 (一八三)

# 屈原（公元前三三九—二八〇？）

浦江清

## 引言

屈原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詩人。他生活在戰國時代的楚國，離開我們有二千三百年了。他好比遙遠的天空裏的一顆巨星，放射出神奇燦爛的、永恆的光輝，光亮了祖國的詩壇。

在屈原以前，我們還有詩的更早的傳統。「詩經」是一部無可比價的古代詩歌的寶庫，收集了從公元前一千年到六百年左右的周文化全盛時期的詩。那裏面有宗教祭歌，有情歌，有政治詩，有農民、戰士的歌唱，內容異常的豐富。祖國文化的悠久，值得我們讚歎，值得我們熱愛。可是幾乎全部都沒有作者姓名。在那個時期，詩是社會的、公共的產物，還沒有個別的大作家興起。

從春秋到戰國，周文化衰落了，結合着禮教和音樂而歌唱的詩也消沈了。在北方中原各國發達了散文。惟獨在原先是文化落後的楚國，突然有幾位詩人起來，他們傳遞了詩歌的火焰。他們都是個別的作家，他們所寫的是長篇巨製稱爲「賦」或「楚辭」的東西，其實就



是楚聲楚調的長詩。其中屈原是開創者，也是最傑出的詩人。

漢水、長江流域的優秀民歌啓發了詩人的創作。楚國特有的宗教、古代神話、神仙傳說、歷史傳說都做了詩人的題材。屈原曾經向中原的經典學習，獲得了運用文字的熟練的技巧，組織進南國的方言，改革了「詩經」的體製，擴大了詩的語彙。他博學多能，有進步的政治觀和歷史觀，有哲學思想，他從楚國原有的宗教詩歌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發展了政治詩和抒情詩。向來不曾爲周民族所征服的荆楚民族，自己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到這時找到了他的代表詩人來宣洩它的文化蓄積。屈原是楚民族文化的優秀代表；他是楚民族的靈魂。

他不但是詩人而且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他生在楚國由極強大走向衰亡的歷史的轉折點上；爲着民族的存亡，他的一生和貴族黨人作了堅強不屈的鬥爭。他被迫害，被放逐而自殺。他的堅貞不屈的人格貫注在詩篇裏，使人興奮，使人嗟歎，使人景仰。我們在二千年以前，有像屈原那樣的一位詩人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爲歷史材料所限制，對於這位詩人的一生，我們也只能知道個大略。後面的敘述是依據司馬遷「史記」裏的「屈原傳」，參照楚國的史料和屈原的可靠的詩篇整理出來的。學者們意見紛歧不會解決的問題很多，這裏所寫大概按照筆者自己的研究和推測，不可避免地

有些是主觀的判斷，留待學者們的指正的。

## 一

屈原姓屈，名平，字原。照古人的習慣，名和字是相應的，高的平地叫做原，所以他名平而字原。「史記」上說，他是楚王的同姓；楚王姓熊，他姓屈，怎樣說是同姓呢？原來屈氏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兒子（或者姪兒），稱爲莫敖王子的，他有一塊封地在屈，屈本來是地名，後來便作爲這一支王族分支的姓氏了。在古代，姓和氏是有分別的，嚴格說來，屈是氏而不是姓，熊也是氏而不是姓，論姓，他們都姓芈（音米）。

史書上說，楚是芈姓之國，意思是統治楚國人民的王族姓芈。歷代相傳的楚王都稱熊氏，熊是王室的氏。在王室周圍有許多王族的分支，對王室有或近或遠的血緣關係，叫做「公族」，屈氏是楚國公族之一。

據古史傳說，芈姓是祝融氏部落的八姓之一，他們的老根據地在河南鄭地，所以原來也是中原的一個氏族。遠在西周以前，這氏族被迫南徙，沿着漢水，到了湖北，他們開發了蠻夷之區，在生活上也同化於蠻夷。這一帶的蠻夷，周人稱之爲荆蠻。楚的開國主熊繹就是荆蠻中間的芈姓君長，據說他曾經受過周成王的冊封，在名義上承認了周的宗主權，其

實是獨立的。當初周人滅商，也只統一了北方中原之地，對於漢水、長江流域，力量有所不及。到周昭王起了侵略野心，大舉南征，曾經引起了荊蠻、徐夷、淮夷這幾個民族的聯合反抗，昭王兵敗，死在漢水。熊繹的後代熊渠，當周夷王時，吞併了江漢間的許多小國，佔有今湖北全省之地。周宣王命召虎南征，楚國又被壓迫，到周室東遷，楚又強大。在春秋初年，楚主熊通稱王，就是楚武王，統治荊蠻民族的全部，建都於郢（今湖北江陵縣）。從春秋到戰國，楚愈來愈強大，削滅了周人在南方所建立的許多國家的統治政權，統一了漢水、長江流域，成爲南方唯一的大國。到屈原時代，楚國已經有七百年的歷史。

莫敖王子死後，歷代的楚王就屈氏門中立一人做莫敖，繼承爵位。打開楚國歷史來看，屈姓的名人很多，如屈重、屈完、屈建、屈蕩、屈巫等，或爲莫敖，或爲大夫，都在春秋時代。直到戰國，屈氏的子孫興盛，和昭氏、景氏並稱公族中的三大姓。

屈原的父親名叫伯庸（見「離騷」詩），他不像有政治地位，家庭也貧窮。因爲屈原自己已在「惜誦」詩裏說過：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我們對於「惜誦」那篇詩，看不出有僞作的成分，所以相信屈原是個貧賤出身的人。有人認爲屈原是貴族，這是把公族和貴族混爲一談。固然多數貴族是公族，楚國的政權向來操在

王子王孫和同姓宗親手裏，但是也還有別姓而有封爵的，所以貴族不等於公族。同時公族也不全是貴族，即以屈族而論，從屈原到屈原有五百年，子孫繁衍，不知道有多少人，其中自然有貴顯的，也有貧賤的。貧是經濟上的貧窮，賤是政治地位的卑微。屈原的父、祖如果曾經服役於王室，可能只在卑微的職司。因此，照我們的判斷，屈原除了他的姓是貴姓，他的家庭出身是同於平民的。至少他是出身於一個沒落了很久的貴族家庭的。因此，我們也可以懂得他在「離騷」詩裏把自己比做傳說、呂望、甯戚那班出身貧賤的賢臣，並非不合於他的身份了。

楚國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在楚悼王時，政治改革家吳起到了楚國，他認為楚國的政治壞在貴族腐朽，官爵太濫，公族的給養費用太大，提出了改革的計劃：「要使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就是說，爵位只給到第三代為止；要「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要「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悼王信任了他，一度實行新政，收到很好的效果。當時還使好些貴族遠徙到地廣人虛的地區去開發生產。結果貴族們痛恨吳起，到悼王一死，便圍攻他，把他殺了。從這裏可以知道，楚國的公族人家由朝廷給予些經濟給養的，而疏遠的曾經一度被汰削。屈原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因此他富於平民思想，他接近人民。同時，他到底是公族子弟，是芈姓子孫，他是要對於王室盡忠忱的。他同楚懷王的關係不過是五百年前

共一家，並不是親近的宗室。他受楚懷王的特殊寵愛，是遭到專權的貴族們的嫉視和抑制的，他堅決和他們作鬥爭。這一切都可以從他的階級成份得到解釋。

屈原約生於公元前三四〇年左右，至今學者之間還沒有定論。本文作者想貢獻一個最近研究的結論，略去詳密的考據和推算，只作簡要的解釋。「離騷」詩的開始說：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這裏兩句啞謎似的句子包含了詩人的生年、月、日。詩人的意思是說：「我生在攝提格之年，孟陬之月，庚寅之日」。「孟陬」是夏曆正月，「攝提格」是歲星紀年的名稱。歲星就是木星，也一名攝提。原來戰國時代，還沒有用于支來紀年的，那時的天文占星家有一種奇特的習慣，他們觀察木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把來做紀年之用。木星在星空中繞行一週，約需十二整年，如果今年在正月和太陽交會，明年便在二月，十二年後又回到正月。他們把木星在正月裏和太陽交會的那一年叫做「攝提格」，我們可以把它翻譯做「正年」，「格」的意義是「正」。所以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庚寅日。根據古代天文和曆法的推算，他應該生在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公元前三三九年陽曆二月二十三日。

木星是行星中間最明亮的一顆，古人把它稱為歲星，並且看做尊貴的天神所憑依，歲星所照臨的地域（分野），五穀豐登，歲星所照臨的月份也是吉月。楚國的宗教是原始巫

教發展提高的，楚王族自認爲顓頊帝和司天文官職的重黎氏之後，所以也最敬重天神。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得天文之正，是吉利的，因而他的父親給他取名叫「平」，平的意義就是「正」。「離騷」：「名余曰正则兮」，說明他父親命名的意義。而屈原一生也把「平正有則」「守正不阿」的精神作爲立身處世的規律。

屈原的出生地點是楚國的都城，郢。西漢的楚辭家東方朔曾說：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七諫」）

「國」指國都，就是郢。屈原也把郢作爲故鄉，他在被放逐離郢時候說，「去故鄉而就遠兮」，「發郢都而去閭兮」，「去終古之所居兮」。在那首「哀郢」詩裏有三個地方指明了這事實，所以許多人認爲他是湖北秭歸縣人，那是不可靠的，是後來的附會（始於北魏時人所作的「水經注」）。我們知道當時公族以屈、景、昭三姓爲盛，稱爲「三閭」，既稱爲閭，必有閭里，他們的居處應該在郢都，或在城裏，或在郊外。以屈原的文學成就來說，他不生長在文化中心，的郢都是難以想像的。屈氏始祖屈瑕的封地屈，不知在什麼地方，不過自從武王、文王經營郢都以後，用情理來推測，那些王族的分支都搬到都城來居住了。

楚國自從春秋時代的成王、莊王開始，和中原交通，吸取中原的文化，已經不是蠻夷之邦了。屈原和孟子、惠施同時，那時候書籍流通，郢都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閭里鄉黨裏

面，應該有宗廟，有教育公族子弟的學校（也許就在宗廟裏面），我們可以想像幼年的屈原就在那裏受教育，獲得文化知識。從他後來的文學表見來看，他在早年必定在語言文字上用過很深的工夫。他的志氣不凡，他也佩服古代特立獨行的賢人：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橘頌」）

他喜歡別致的服色，佩着一柄長劍，戴着一頂高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涉江」）

這佩劍、高冠不像貧賤子弟的服飾，或者是古老的屈族的徽徵，表示莫敖王子的後代，有顯揚祖德的意義吧。

此外，他特別愛好花草。他住過郊外原野的。在郢都附近，靠着長江，有許多湖沼洲渚，「蘭皋」「椒丘」是少年詩人喜歡漫游的地方。後來他爬上政治舞台，到不得意時，還很想回來隱居：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離騷」）

他對於植物的知識非常豐富；蘭花、蕙花、申椒、菌桂、江離、辟芷、木蘭、杜若之類的芳香植物是他特殊愛好的。那些東西在楚人的宗教裏是用來敬獻神明的，他喜歡這些是敬愛它們聖潔的品德。這些南國原澤的特產，在他的詩裏出現得非常之多，結合詩人的愛國熱

情，他歌唱、讚美祖國的草木。

## 二

公族子弟得到王家的特殊教養，原來是要爲王家服務的。尤其像屈原那樣的優秀分子，由於才能的傑出，不久便被選拔了上去。他的才能，第一是「博聞強識」，知道的東西多，記憶力強；第二是「明於治亂」，懂得政治原理，有政治眼光；第三是「嫻於辭令」，擅長文學修辭和外交語言。其時楚懷王熊槐在位，屈原在二十四五歲上，便任了「左徒」之職，位在大夫之列。這是一個高級文官，好像是王室的祕書長。由於懷王的特殊信任，他在內裏起草法令，參議國家大事；出外宣布號令，接待外交賓客。他對於楚王有知遇之感，抱着無比的忠忱，幻想着遠大的政治前途。

當時戰國七雄，爭城掠地，互相侵伐，無間斷地在戰爭漩渦中。北方以齊、秦爲強，南方以楚國爲大。自從威王擊破了越國以後，楚的疆宇，西起長江三峽，東到東海；北邊伸進在陝西、河南、山東的南部，南邊有洞庭、鄱陽兩湖之地。當初周人在南方所封建的許多國家，都已被楚人所覆滅。廣大的人民就是當初強烈反抗大周民族主義的荊蠻、徐夷、淮夷等少數民族和商朝滅亡以後往南逃竄的商朝遺民，經過了六七百年，他們現在芈姓王朝的



統治下，融合成爲一個大楚民族。他們早已從奴隸社會進到了封建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提高。長江流域的土地是肥沃的，物產是豐富的，吳起曾經說過一句話：「楚國地多而民少」，如果統治者沒有侵略的野心，這樣一個國家是可以康樂自足的。當時的國防力量，有「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所以當屈原跑上政治舞台，正是楚國強大，大有可爲之時；他高瞻遠矚，自有一番抱負。

第一，他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他要引導楚王修明內政，任用賢能，效法古代聖王的「王道」政治。他說：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

這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論；雖然和孟子一樣，他是唯心論者，處在凶惡殘暴的混戰混殺的時代裏，勸導國君修德息爭，是符合於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第二，爲了掃除弊政，他主張法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第三，當時秦國最強，尤其有侵略的野心。楚威王曾經加入「合從」聯盟，以阻遏秦

國。到了懷王即位，忽而伐魏、伐齊，忽而做六國盟長，沒有固定的外交策略。秦惠王用張儀爲相，決心要破壞六國聯盟，並且派兵攻下了蜀國，在西邊和北邊兩面威脅楚國。屈原是堅決主張和齊、魏聯好以抵制秦國的；惟有這樣，才可以保障楚國的安全。

這三點都很正大。懷王一朝是楚民族興、亡、成、敗的轉折點，關係重大。可惜屈原空有遠大的政治理想，敏銳的政治眼光，他得到懷王的信任，時期極短。他遭到同僚的嫉妒，貴族黨人的仇視，敵國間諜的離間，終於被迫去職了。

「史記」上記載這樣一件故事：有一位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要奪取他的草稿，屈原不肯給他，他在懷王面前進了讒言，激起懷王的憤怒，把屈原疏遠不用了。事實怕不是這樣簡單的，論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未必就爲了一件事情便站立不住；當時尖銳的鬥爭存在於他和「黨人」之間。他說，「衆女嫉余之娥眉兮」，可知仇視他的不止一人。他要求國王修明法度，任用賢能，必定要和當權的貴族衝突。他所說的「黨人」，就是指當時貪婪專權的貴族和國王左右的佞臣那內外勾結的一黨。當時公族三姓之中，要數楚昭王之後的昭氏，對王室親近，權勢也最盛；在宣王朝有煊赫一世的昭奚恤，在懷王初年總攬軍政大權的是上柱國令尹昭陽，和屈原同朝的有昭睢、昭過、昭鼠等。公族中間的宗派主義是存在着的，照我們推測，排擊屈原最利害的就是昭氏貴黨。到秦國派張儀來楚，施用離間計，昭睢

和張儀密切勾結，對立的形勢更其顯然。張儀來楚，在公元前三一三年，這時屈原年二十七歲，懷王用張儀爲相，決定聯秦，屈原必定不安於位；所以他做左徒，前後不過兩三年。

懷王聽信張儀，說和齊絕交以後，秦國願送給他商於之地六百里，決定斷絕齊國邦交；及至絕齊以後，張儀回到秦國，便翻過臉來不認這筆賬。懷王大怒，興兵伐秦，打了大敗仗，丟失漢中；他不肯罷休，再徵大軍伐秦，深入秦地，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知道楚國空虛，也派兵南侵，趁火打劫，楚軍狼狽退守。這兩個敗仗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力量，從此以後，楚國東西受敵，一蹶不振了。

屈原卸任左徒以後，他還做着「三閭大夫」的官職。三閭大夫是管理公族譜牒、主持宗廟祭祀、兼教育公族子弟的一個閒職。在這時期他開始了詩的創作。首先，他製作了一篇長詩叫做「天問」，在這裏面他表見了對於古代神話和歷史的廣博的知識，也表見了他的懷疑的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次，他寫作了一套祭神的歌曲，叫做「九歌」，那是楚辭文學裏突出的、最優美的傑作。

楚國各地普遍地有祠廟，人們逢年過節，打歌、吹簫、歌唱、跳舞，娛樂鬼神，祈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賽神的歌舞本來是人民的藝術。屈原吸取人民藝術的優秀成分，加工製造出許多篇達到抒情詩極高境界的宗教詩歌。他開始用「楚歌」的調子來寫詩，開始接

近了人民的語言。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湘君」）

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這樣美好的抒情詩句，顯然是從民間的情歌裏吸收來的，充滿着濃摯真切的感情。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

這是描寫湘水女神降臨在洞庭湖邊的情景，這樣靈活、美麗的形象在「詩經」裏面是不容易找到的。縹渺的神仙姿態融合着南國山川的秀麗。我們要問，屈原寫了這許多篇祭祀神仙的歌曲，是零篇應用到許多個祠廟呢？還是集中應用在一個祠廟呢？據說，郢都東郊外有一所東皇太乙祠，乃是祀奉天帝的廟，爲祭祀天帝，有迎送各個神仙的歌舞，包括雲神、太陽神、河神、湘水神之類，整套的節目由女巫或男巫的合唱隊歌唱，配合着繁複的音樂，可能也有扮演在內，好像希臘酒神廟的歌舞，具有戲劇的雛型。東皇太乙廟有春秋兩祭，可能名義上是由楚王主祭的，三閭大夫既然是管祭祀典禮的，他大概奉了楚王之命製作這些祀神的歌曲吧？據漢朝人說，楚懷王大舉伐秦，特別隆重祭祀天神的典禮，所以屈原的「九歌」裏特別有「國殤」一篇，祭祀陣亡將士：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國殤」）

詩人用悲壯的詩句喚起爲國犧牲者的強毅的靈魂！懷王剛愎自用，大舉伐秦，屈原本不贊成，所以我們也可以想見當他寫「國殤」這一篇詩，他的心境是怎樣地沈重了！

### 三

懷王伐秦失敗以後，重新召用屈原，派他到齊國去重訂邦交，這時他年二十九歲。秦國害怕楚齊聯好，願意送還漢中地的一半來講和。懷王不願得地，要求秦國把張儀交出來。張儀居然敢再到楚國，楚王把他囚了。但是他想法買通了楚王的嬖臣靳尚和寵姬鄭袖，替他開釋。等到屈原在齊國順利地辦好外交回來，楚王已把張儀放走了。屈原和懷王爭論幾句，很不愉快。他覺得懷王執迷不悟，反覆無常，沒有辦法引導到善良的政治了，開始有離開郢都的意念。他說：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乎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離騷」）

當時楚國的朝廷被一般貴族黨人所把持，是非黑白不分。大家都在奔競鑽營。由於惡勢力的蔓延，就是好人都都變成了壞人：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澆不厭乎求索。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離騷」）

惟獨屈原，他不肯和他們同流合污，寧可出外流亡而死的：

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離騷」）

他看到國家的危難，曾經有好幾次直諫君王，觸犯懷王的憤怒，他並不懊悔：

汜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

無奈懷王對他情意益疏，同從前重用他的時候，態度完全兩樣。君臣之間，距離愈來愈大，他不能不自求引退了：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騷」）

想到天下之大，九州各國，難道像他那樣的賢才，不能够在外得志嗎？但是，他不忍離開祖國。那末，到邊遠的地方去，或者退而隱居？四面八方的念頭都轉到，在極度的煩悶裏，他寫下了長詩「離騷」，盡情傾吐他內心的苦悶。

「離騷」是哪一年寫的呢？不容易確定。從詩裏面的提示，是在詩人剛到壯年而又憂慮着老的來臨，這樣，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上都還適合。爲了敘述史事的方便，我們假定

屈原在三十歲的正月生辰開始寫作這篇自叙的長詩。這是在公元前的三一〇年。

「離」是離別，「騷」是歌曲的名稱，「離騷」就是「離歌」。以形式而論，還是從巫歌的形式推進加長，成爲長篇的獨白抒情詩。他從自己的家世、生辰講起，說到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鬥爭。有好些部分還保留着宗教詩的色彩，例如由於精神苦悶，在種種矛盾衝突裏，詩人歌唱着上天下地的精神追求，確乎是神祕的。但是，從「九歌」到「離騷」，詩人屈原的發展過程已經是從純粹的宗教詩到政治詩的道路。尤其可寶貴的是他歌唱出人民的苦痛：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我們在上面說過，除了他的姓是貴姓以外，實際上他是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從下層爬上來的。因此他深切了解被壓迫階級的苦痛，而這裏的「民」字也包括他在內的。他抱怨國王不顧人民的意志：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他從歷史觀察天道，凡是不顧民心的統治政權是不能久長的：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兮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他說，天帝是沒有偏袒的，挑選人民中間有德行的幫助他成功。只有聰明睿智的君王能够享有國土。前看往古，後顧將來，總要替人民打算，哪能不義而成功，哪能不善而服人呢？他把這樣激切的言論來警告國王。他這種議論並不單爲楚懷王而發，他要把他的歷史哲學的真理寫在他的不朽的詩篇裏。「離騷」在祖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第一首長詩，也是屈原的代表作。

屈原是信仰宗教的，他信仰天道。他用懷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研究古代的神話和歷史，他重新肯定了天道，他認爲天命是本乎民心的。上帝決不違反人民的意志，違反人民的意志的統治者是違反天帝的意志的。他認爲他所覺悟的道理是極其正確的，極其忠誠的，他所說的，他所做的，是忠誠於天帝，忠誠於國君的。接着「離騷」的製作，他再寫下一篇「惜誦」，重復申明他離開國君、離開郢都的決心，他指着上天來印證他的忠心：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惜誦」）

就在那一年，他離郢都出發，沿漢水而上，到了漢北：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抽思」）

好象飛鳥似的離開了故鄉。他日夜關念着朝廷，寫作「抽思」：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他發揮了沒有耕植沒有收穫的哲理：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抽思」）

這是很可寶貴的至理名言，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反覆誦讀，深刻體驗的。

按照楚國的地理，所謂「漢北」，在鄖陽、浙川一帶，北面正靠着秦國商於之地，是楚的北邊境。那邊正遭遇過兩次兵災，屈原不像是跑去隱居的。而且屈原在王朝是大夫的職位，他的進退也不能完全自由，必須得通過懷王。看來是經過幾次諫諍，懷王不能用他，而且也憎厭了他，有意把他外放。所以屈原的離郢，一半是自願，一半是被迫。大概他是帶着三閭大夫的官銜，到那邊去辦理地方事務，充任縣邑大夫吧。這是屈原在懷王朝的一次遷謫。

屈原離郢以後，楚國的朝政更加混亂了，尤其是由於國防的力量削弱，外交處於被動的地位，沒有遠見的固定的政策。首先，因為秦武王把張儀趕到魏國，昭雎也轉移方向，主張聯齊。秦武王死後，秦昭王立，要求和楚國結好，楚王貪着小利，又違背了對齊的盟好，這樣招來了齊、韓、魏三國聯軍討伐。懷王不得已，派太子到秦國去作質，討救兵來把圍解了。太子在秦國闖下一頭禍事，私自逃回，於是秦國借端開釁，連合齊、韓、魏，聯軍分路進攻。這時昭雎和昭鼠帶領重兵駐在漢北和漢中，他們互相觀望，不肯主動作戰，把在前線

苦戰的唐昧將軍犧牲了。此後三年，秦兵繼續不斷地往南侵略，接連有殘酷的戰爭。懷王沒有辦法，派太子到齊國去作質，乞求盟好。

屈原在漢北住了幾年，在這樣的兵慌馬亂裏，他是不能安居的；而且兵權掌握在他的敵黨昭氏貴族手中，他也無能爲力。在這戰亂中間，他從邊疆上被召回來。公元前二九九年，秦國又出兵攻打楚國，掠奪了北境的八城。秦昭王責備楚懷王背却前盟，一半欺騙一半威脅他，要求他到武關去再開和平談判。其時屈原在郢，他進諫懷王，勸他不要入秦。他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是懷王拿不定主意，懼怕強秦，終於聽了庶子子蘭的慫恿，進到武關。一到武關，秦將把他劫送咸陽。因爲他堅決不肯答應割地的苛刻條件，竟被秦王扣留不放。

這時楚國朝廷無主，一部分臣子要擁戴子蘭，昭雎跑到齊國去把太子弄回來立了，叫做頃襄王。新王即位，請子蘭做令尹，昭雎做相，他們兩人素來和屈原不合，在新王跟前毀謗了他，於是頃襄王決定把屈原放逐到大江以南。

這裏面是有陰謀的。從老王入秦到新王即位這混亂的階段裏，政治鬥爭必定很激烈。子蘭是懷王的寵兒，也許就是寵姬鄭袖所生，他慫恿父親入秦，闖下大禍，先就不利於衆口。屈原也發過激烈正直的言論，中傷了他。昭雎專政多年，忽而聯秦，忽而聯齊，反覆

數次，把楚國弄到這般地步，也爲大眾所不滿。當時朝廷的清議派必定攻擊這兩人。所以楚國雖然無君，子蘭在郢而不得立。昭睢精通權謀策略，知道自己不立一個大功，便站立不穩，所以偷偷地跑到齊國，把太子弄回來了，於是挾君以自重。他辦這個交涉，許了齊國許多好處，他決不肯讓對齊外交的能手屈原跑去的。朝裏有君，貴黨蒙蔽一切，假借王命辦事；朝裏無主，紛紛攘攘，清議派抬頭了，而屈原儼然是清議派的領袖。既然齊國放回太子，對楚有恩，以後對齊的外交成了國家要務，這樣，屈原有被重用的可能；惟其如此，多年來的政敵昭睢不能不想法把他早早弄出去了。這回政治鬥爭的結果，進步力量依舊被貴黨壓了下去。據我們的推測，被放逐的怕也不止屈原一人。

所謂「放逐」，到底是怎樣性質呢？不像後來的「充軍發配」似的；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放外官。例如漢朝的汲黯，漢武帝要他做淮陽太守，他對人說：「這是不用我參議朝政，把我棄逐到外郡了。」屈原放逐到江南以後，他寫過一篇「哀郢」，他說：「信非吾罪而棄逐兮，用的就是「棄逐」兩字。二是合族遷徙，好比移民似的，這是對貴族嚴厲的責罰。例如鄭國破了，鄭襄公出降，他對楚莊王說：「就是君王要把我們遷到江南去，我們敢不聽命嗎？」又如鄭袖對楚懷王說：「你要得罪秦國，先罰我們母子遷到江南去，免得遭秦人魚肉。」所以大江以南，向來是楚國安置移民和遷謫罪臣的地方。上面我們也說過，楚悼王

時，吳起要使有些貴族搬出都城，往地廣人虛的地方去開發生產，這也是移民政策，大概還分配土地給他們的。屈原的放逐屬於哪一種性質，史書上沒有說得明白，我們也難以確定。總之，這一次敵黨給他的迫害遠比懷王朝的遷謫要嚴重。屈原全家搬出郢都，他和大批移民同行。如果他還銜着王朝的使命，那末就是帶領這些移民到大江以南去安置，他辦理着移民事宜。

由於秦兵三次入寇，楚的北境普遍地遭受蹂躪，丟失了許多城市，因而人民紛紛南遷。頃襄王元年（公元前二九八），秦又來攻，漢北有大戰發生，楚軍死亡五萬，析十五城（河南鄧、內鄉縣一帶）同時淪陷，又有大批流亡者沿漢水南下。郢都附近，人口激增。加以打了敗仗以後的橫徵暴斂，人民不勝其苦，因而居民遷動得很多。屈原離開郢都，是和大批移民同行的。他在詩裏寫道：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去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

意思是說，天不佑楚，是國君不修德所致，但是上天震怒的結果，災禍却加在人民頭上了！天啊！你爲什麼責罰人民呢？多少人無家可歸，我也在仲春二月的一個甲日的清晨憂傷地離別國都，往東搬家了。

他坐着船戀戀不捨地回望都城，想到入秦不返的懷王，再不能夠見到了；望見那些高的楸樹，想到從此以後便離別了故鄉，禁不住眼淚像雨點似的掉了下來：

楸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哀郢」）

沿長江往東，到了夏口，暫時停留下來；他登洲眺望，離郢已經很遠。這裏是一片平原，人民安樂，風俗淳美。祖國是這樣的可愛啊，如何能夠讓外族侵凌呢！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哀郢」）

最後，他到達了流放的地點陵陽（在今皖南的青陽、貴池、寧國、績溪一帶），住了下來。這是屈原在頃襄王朝的被放逐，我們假定在頃襄王的元年（公元前二九八），他年四十二歲。

#### 四

屈原在陵陽住着，至少住滿了九年，沒有復官，沒有回郢的希望。他寫作「哀郢」一篇，追叙他出都東遷的情況。此外他還寫過些什麼，我們不能知道。楚懷王悲慘地死在秦國，後來歸葬郢都，有人認為楚辭裏面「大招」一篇也是屈原的作品，招懷王的魂的。此外，還

有「招魂」這一篇，有人也認爲是屈原憂傷成病，寫這篇文章來自己招魂的。這兩篇雖然都是藝術價值極高的長篇傑作，多數學者認爲是景差、宋玉的作品，所以我們不詳細討論了。

屈原的作品必定有散失的，他的生活也留下許多空白。我們知道他離開陵陽，年紀已經五十開外；還佩着那柄長劍，戴着「切雲」高冠，在秋末冬初的西風裏，徘徊眺望於鄂渚（武昌）江邊。受着法令的限制，他不能跨越到江北，也不能回郢。他沿着長江而西，穿過洞庭湖邊，坐船往沅水上游進發；經過辰陽（辰溪），到得溆浦，已經是嚴冬氣候了。就在溆浦山中住了下來，他寫作了一首「涉江」詩，追叙旅途情況。這兒有一段很好的描寫：

入溆浦余儻個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涉江」）

今天的湘西，在二千三百年前，屬於楚國的黔中郡。那邊是稱爲「五溪蠻夷」的少數民族所雜居，在楚悼王時起始開發，設立了幾個縣邑。他到這僻遠的地方，是移居呢，還是有什麼使命，詩裏面沒有說明。黔中郡的北面是巫郡，這兩塊地方，和秦兵所佔領的蜀國相鄰接，好久是秦昭王所垂涎欲得的。當初楚懷王寧死而不肯接受的苛刻條件，就是割讓這兩郡歸秦國。想不到現在懷王的老臣屈原被驅逐到這邊郡來了。

他就在這僻遠的地區住了下來，想到自古以來的忠臣賢士，遇到昏君，沒有不被冤屈

迫害的，他相信自己的正直：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涉江」）

他觀看「刀耕火耨」的勞動人民，想起「民生之多艱」的詩句，他願意和田野父老們生活在一起，從前不是有一位接輿，自己剃光頭髮，有一位子桑伯子脫却衣冠，赤條條地來往嗎？所以他也願意在這裏終老了：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

但是屈原並不能在湘西終老，那個地方很不安定，是敵人所不肯放鬆的。屈原知道這危機，他又有什麼力量呢？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在某一年的孟夏四月，他從湘西出來，經過長沙，再往北走，竟投身到汨羅江裏自殺了。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成就了他早時就懷抱着的「伏清白以死直」的那個堅定的意志。在自殺以前，他寫下一篇「懷沙」詩。有人說，屈原是個衆醉獨醒的人，因爲憤世嫉俗而自殺的，「史記」上說他不願意在渾濁的世界裏偷生，寧可葬身於江魚的腹中，這樣把他自殺的動機完全解釋做脫離羣衆的清高思想，是「涉江」詩裏「固將重昏而終身」的話矛盾的。他的自殺應該有政治原因。照我們的推測，不外乎下面兩層。第一，他和貴族黨人奮鬥一生，有寧死不肯屈服的志節。他在「懷沙」詩裏又提到他們，痛罵他們「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比喻做一羣咬人的瘋狗。雖然他被

放逐在外，他們對他始終不會放鬆。這回他往北走，或者更有迫辱他的命令，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說：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懷沙」）

「愛」就是愛惜生命的意思。第二，當時楚的死敵是秦，但是頃襄王認賊作父，甘心做强秦的尾巴，往齊侵略。楚國的統治階層都只知道苟且偷安，爭權奪利，惟有衆醉獨醒的屈原警惕着這嚴重的局勢。他原先有政治抱負，可以擔當大事，到了此刻，好比一輛載重的大車陷在泥坑裏不能自拔了：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沙」）

他眼看秦兵快要來了，祖國快要淪亡，平民的統治政權且不保暮，而廣大的人民也要遭受更深的苦難，爲了愛祖國、愛人民的灼熱的心腸，悲觀失望而自殺的。

我們考查歷史，在公元前二八〇年，當楚頃襄王的十九年，秦國的司馬錯徵調隴蜀兩地的大軍從西邊攻打楚國，黔中郡的大部分淪陷了。屈原的自殺應該在這一年稍前，或者就在這一年上。那末他死時的年齡也快近六十了。再後兩年，秦將白起從北面攻進楚國，拔取郢都，焚燒楚先王的陵墓，楚國遷都到陳（今河南淮陽縣），這樣大的變故，屈原未必見到了。



屈原是有矛盾的。他是公族出身，對於楚國統治者的宗廟社稷，有保衛的責任感，他和王室休戚相關，他是要維持芈姓統治的。同時他看到這統治政權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他殉身在這矛盾裏。楚國的政治是落後的貴族專政到了腐朽的地步，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來，推進了政治和軍事，也增強了侵略性，楚國命定地要滅亡。他看到這矛盾，他殉身於這政治落後的祖國。他的自殺是芈楚王國的悲劇。

屈原死了以後，芈楚朝廷放棄了它的老根據地，放棄了廣大的荆楚人民，讓他們給強寇蹂躪；遷移到當初是徐夷、淮夷的根據地，做成一個東方國家，但也只延長了五十多年壽命，終於為秦國所滅掉。秦滅楚以後，加深壓迫楚地的人民。楚國的文化被摧殘，大批的文物和史料化為灰燼了。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潛伏着的，秦帝國的專制統治不過十五年，強烈反抗它的是楚地的人民。農民革命的英勇領袖陳勝、吳廣是楚地的人民，爭奪江山的項羽和劉邦也都是楚人，那時候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足見楚人是怎樣仇視秦人，而秦滅楚以後，怎樣對楚人加深壓迫了。到劉邦建立漢朝，楚的文化重新發揚起來，大詩人屈原的作品被湮沒了多年，到這時它重放光明了。

公元前一七六年，漢文帝朝的少年博士賈誼遷謫到長沙，他經過汨羅江，投文弔祭屈原，表示他的景仰和同情心。在漢武帝朝，有淮南王劉安，他住在楚的故都壽春（今安徽省

壽縣)，他熱心收集屈原的詩篇，替「離騷」做了評贊解說，把它比美於「詩經」。大史家司馬遷也到過長沙，到過汨羅，他特地在他的偉大的「史記」裏加入這位詩人和政治家的傳記。許多的文人摹倣屈原的製作。「辭賦」文學在漢朝佔文壇的領導地位。所以，這位偉大的詩人是在他死後一百五十年，才得到他應得的榮譽的。

世俗相傳，屈原死的那個日子是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賽船競渡的風俗是起源於汨羅江邊的人民拯救屈原的，稱爲角黍或糉子那個食品是用來弔祭屈原的。五月五日原是古老的一個節日，和屈原不相干，這些風俗事物的起源借重了這位大詩人的名望得到意義深長的解釋，雖說是無稽之談，也可見三閭大夫的遺愛永久地留在人民心裏了。

(一)屈原的作品，除去顯然是僞作和有可疑之點的，留剩「離騷」「天問」「九歌」和「九章」中的「惜誦」「抽思」「哀郢」「涉江」「橘頌」「懷沙」六篇，沒有問題，本文據以考證他的事蹟。「惜往日」篇雖也被引用，作爲後人敘說屈原的話。

(二)王逸注「離騷」，謂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鄒漢勛、陳瑒、劉師培三家推定他生於公元前三四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戰國時代不用干支紀年，那個戊寅年是後漢人排定甲子年表時所逆推的，和歲星紀年不合，因爲中間有歲星超辰。郭沫若據「呂氏春秋」的一個歲星紀年逆推，並計算超辰，推定他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正月初七日庚寅，也略有差失。庚寅是初八，不是初七。我們據天文學實際推算，公元前三四〇年木星在虛危，不能稱爲攝提格之年。我曾經把戰國秦漢間的歲星紀年作通盤考慮，得出一個結論：西漢年間的攝提

格，木星在「星紀」（斗牛兩宿），戰國年間的攝提格，木星在「娵訾」（室壁兩宿），夏曆正月和太陽同宮。因此推定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三九年陽曆二月二十三日，即顛項曆的正月十四日庚寅。照我的精密推算，那天的木星在室宿十六度，太陽在室宿十二度。

(二)單看「史記」，昭雎爲聯齊派人物，因此近人認爲他和屈原是同派，劉師培甚至有荒謬的意見，認爲他和屈原是一人。本文判斷他是和張儀密切勾結的，從「戰國策」的記載看出。排擠屈原最力的是昭氏貴黨，也從昭雎和屈原同朝而一升一沈的現象上推論出來。

(四)近人對「九歌」有各種紛歧的說法，本文所提示的新意見是根據「漢書·郊祀志」谷永的話啓發出來的。

(五)游國恩解釋「離騷」即「勞商」，通是曲名。我意離是離別，「騷」才是曲名，可能是巫曲的一種。「大招」裏面的「勞商」，「勞」是曲名，參看上下文，「商」怕是動詞，作「清揚其聲」解，不宜連讀。

(六)王夫之解釋「哀郢」首段，認爲是白起攻破郢都，楚國東遷情況。這是在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史事，如果這時屈原還活著，並且又過九年，那末年在七十以上了。這是不可能的。推尋史實，漢北淪陷十數城後，必有人民遷移情況，本文提供此見。

(七)屈原死在夏天，未必是五月五日。五月五日在古代舊有的節日，也有些忌諱和風俗。「史記」說孟嘗君生於這一天，父母以爲不祥可證。

##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

余冠英

曹植的文學創作生活，如果從他十九歲（二一一）做「銅雀台賦」算起，共有二十二年。其初十年正當漢獻帝建安時代的後半，所以他也是「建安詩人」之一。

建安時代是怎樣的時代呢？這時代正當大規模農民起義衝破了舊社會的秩序之後，帝王的威權垮了，地方官吏與豪右各各招兵買馬，乘機擴張勢力，成了軍人割據、「羣雄」逐鹿的局面。曹植「生於亂，長於軍」，但在他能懂事的年紀，中原已經大略安定（曹操消滅他的最大敵人袁紹，開始取得鄴城做根據地的那年曹植正十三歲）。他在有文學氣氛的家庭裏受教養，十歲時已經能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十九歲做「銅雀台賦」，開始顯露他的文學才能。次年受封平原侯。同年跟隨曹操西征馬超，路過洛陽，做了一篇「洛陽賦」（僅存四句）。又有兩首五言詩送他的朋友詩人應瑒，在第一首裏描寫了殘破的洛陽，是他爲時代的災難所留影像之一。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頽墜，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

觀新少年。側足無行逕，荒囿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可以和和這一首對照着看的是「名都篇」，以繁盛時期的洛陽為背景，暴露都市裏貴遊子弟的腐化生活，也是有現實性的作品。至於他個人青年時期的生活却須從「公宴」、「鬥雞」、「侍太子座」等篇去看，這些是所謂「憐風月，狎池苑」的詩，是他在鄴城度過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鄴下詩人集團生活的留影。大約在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之間，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一班幕僚兼朋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阮瑀等人常常聚會，「出則連輿，止則接席，……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他們互相贈答或一題分詠。這種情形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他們最常用的文學形式是五言詩。這是從樂府歌謠發展出來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到漢末三國才開始普遍起來，尤其是鄴下詩人大量採用，曹植用的更多。比起四言詩來，五言是比較進步的形式。他們對於文學語言也有新的要求，深奧典雅和過於質樸的語言都不能滿足這時代的作家了。

正因為五言詩是從民間來的通俗體，當時詩人寫五言詩所用的語言比四言詩通俗得多。曹操、曹丕、王粲都是這樣，曹植也是這樣。不過有些作家，尤其是曹植的詩在語言上

的加工是相當多的。他把通俗的語言再加提鍊。原來這時的詩多少受到辭賦的影響，曹丕「典論論文」說：「詩賦欲麗」，正是當時的標準。不過辭賦對於這時五言詩的影響，比之於樂府的影響，那是微小得多的，前者祇影響聲律、對仗、詞藻，影響的程度也並不很深，而後者却影響詩的精神。因此曹植的詩確如黃侃「詩品疏」所說：「文采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我們可以舉他的「美女篇」來說明：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這一篇被人認爲建安「修詞之章」的代表，如拿來和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較，詞句更加精鍊，但風調氣息還是很相近的。所不同者，「陌上桑」、「羽林郎」是敘事詩，「美女篇」却該算作抒情詩，作者顯然不是以描寫美女爲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樂府本以敘事爲主，建安文人的樂府詩也敘事，但更多的是個人抒情，這在曹植尤爲顯著，更清楚例子是後來的「吁嗟行」、「薤露行」等篇。樂府詩用於個人抒情，實質上和一般的徒詩已經沒有分

別了，這是一個大變化。

建安時代的抒情詩有一個特徵，就是「文心雕龍」所說的「慷慨以任氣」。「慷慨」是這時新興階層文人普遍的感情。曹植說他自己「雅好慷慨」，在他的詩裏也常見「慷慨」這兩個字，慷慨是什麼呢？它一方面是對於社會不平的悲憤，另一方面是立事立功的「壯心」。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無一，念之斷人腸」是慷慨；「碣石篇」：「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是慷慨。曹植有一篇「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險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這詩和上引送應氏詩同為「憂生之嗟」，也是慷慨之音，表現同情疾苦的人道主義，正是建安詩的最可注意的特徵。這首詩和王粲著名的「灞岸之篇」以及曹操、陳琳、阮瑀的一些敘事樂府有共同的精神，都是注目社會，反映現實。

曹植說：「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雜詩」）又說：「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愛？」（「鰕組篇」）認為烈士壯士有一種慷慨之情為流俗所不能理會。烈士壯士的憂悲不全是關係個人的，上述從人道主義出發的是一種，從愛國精神出發的是又一種。曹植的「雜詩」說：「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說：「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白馬篇」說：「長驅蹈

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掛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都是愛國的慷慨之言。他的「薤露行」說：

天地無終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這種恐懼生命短促，恐懼沒世無聞，追求不朽，亟亟於乘時立業的思想，建安詩人大都有之，這正是新興階層文人積極向上的精神，正是他們不同於過去寄生於帝王貴族的倡優式文人的地方。不過其結合愛國憂民的感情或多或少，不盡相同。如陳琳詩「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遊覽」二首之一）還是個人的榮名之想。至於曹操的「不感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就和孔融一樣，是「負其高氣，志在靖亂」了（語見「後漢書孔融傳」）。曹植所謂「戮力上國，流惠下民」（「與楊修書」），也正是同樣的懷抱。

曹植的「慷慨」是積極的、煥發的精神，構成其詩文的「骨氣」。後人推重的「建安風骨」也就是指這種精神。鍾嶸「詩品」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文」就是詞采，「質」就是骨氣。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是建



安詩的特徵，這種特徵表現在曹植的詩裏尤其明顯。

二

曹植的實際政治才能，未經考驗，不曉得究竟怎樣。但曹操認為曹植在他的諸兒之中「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慮立他為太子。後來因為他失掉父親的寵愛和信任，受任大事的機會也就沒有了。二二〇年曹丕受漢禪讓，做了大魏皇帝，對一向被他猜忌的曹植就開始迫害。首先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殺掉一向擁護他的丁儀和丁廙。當時曹植自己也是俎上之肉，當然無法救他的朋友，但希望有別人來援手。這種心情表現在「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鷁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這詩「風波」喻險惡，「利劍」喻權力。「雀」喻被難的朋友，「少年」喻假想的有力來援救的人。當時作者自己也正像羅網裏的黃雀，雖然保全性命，自由却絲毫沒有。被遣就國之後，監國使者天天在旁找他的錯兒，隨時可以得罪。他的「離繳雁賦」所謂：「掛微軀之輕翼，忽頹落而離羣」，「鸚鵡賦」：「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都是比況自己的處境和心情。黃初二年（曹丕即位第二年），監國使者果然控告他「飲酒悖慢，脅劫使者」。曹丕給他

貶爵處分。他的「樂府歌」：「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爲。」表示對於監國使者的怨憤。「當牆欲高行」說得更痛切：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憤憤俗間，不辨僞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黃初四年，曹植和任城王曹彰、白馬王曹彪一同入朝，曹彰到洛陽後不明不白地死了。曹彪回國，曹植希望和他同路東歸（這時他的封地是雍丘），但監國使者不給他這個自由。他十分憤慨，寫了有名的「贈白馬王彪詩」七章。第三章「鴟梟鳴衡輓，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等句，痛罵監國，最爲憤激。第五章「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等句，從曹彰暴死想到自己朝不保夕，又悲又怕，最爲深痛。而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猝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這一章前面的話全是寬慰曹彪，囑他不要悲傷，末後忽然又說要想不悲傷是辦不到的。好像勸人停止啼哭，話還沒說完自己倒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全是真情實感的自然表現。另有

一首失題詩，寫別離的傷感和畏禍的心情，大約也是這時所作：

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旁。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曹丕死後曹叡繼位，曹植的生活並未改善。他這時所感的痛苦，一是再三改封，居處不定；二是兄弟隔絕，不許交通；三是土地貧瘠，衣食不繼；四是閒居坐廢，功業無望。「遷都賦序」說：「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未適於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因為幾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表現在「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鷗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荇連。

這詩用轉蓬自喻。其中「宕宕何依」、「飄飄」、「流轉」的感覺還不是最苦痛的，更深的悲感是「長去本根」。原來明帝不許諸王入朝，曹植苦於「婚媾不通，兄弟永絕……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吳越」（「求通親親表」），骨肉之間生離等於死別，所以本篇末四句說

得那麼沈痛。

文帝和明帝對待諸侯都極其苛薄，對曹植更甚。曹植自述貧困的情形又見於「轉封東阿王謝表」：「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裸露。」他的部曲既少，又多老弱，許多已經是「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的（「諫取諸國視息表」），當然不能有什麼生產。不過比貧窮更難忍受的是生活的孤寂。「閒居賦」說：「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可見其「塊然獨處」的煩悶。「白鶴賦」：「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也正是自喻。他尤其不能甘心的是長此廢棄，使建功立業的希望永遠斷絕。但他還想竭力爭取，太和二年上書給明帝，要求讓他「乘危蹈險，乘舟奮矚，突刃觸矢，身先士卒」，祇要有從軍的機會，「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而不願「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作「圈牢之養物」。但明帝也是疑忌他的，終不肯把他放出圈牢。

明帝的疑忌也不為無因。太和二年明帝幸長安的時候，洛陽竟發生謠言說皇帝死在長安，從駕羣臣迎立曹植（「三國志」注引「魏略」）。足見曹植在當時臣民的心目中還大有威望，這對於曹植是不利的。他自己當然也知道這種關係，所以有一篇「怨詩行」，以周公自比，以周成王比明帝，感歎：「為君誠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而

希望有一天能像周公表明心跡，如「金縢」故事。但這想法是落空了，他只能鬱鬱到死。

曹植在憂讒畏譏的生活中有不少「諷君」之作，「怨詩行」、「七步詩」都是後人所熟悉的。此外如「明月照高樓」、「種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等篇，作怨女棄婦口吻，也都是有所託喻。這一類，在他的作品裏也是藝術性較高的。他又有「遊仙」詩多篇，其中有些也表現作者苦悶的感情，如「遊仙」：「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雲凌紫虛。」「遠遊」：「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都是有激而發，並不是真的歌頌列仙之趣和追求奇幻的境界。曹植在「辨道論」裏罵過方士，在「贈白馬王彪詩」裏又明白的說出「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見他本不是迷信神仙的。

曹植在黃初以後的生活造成其詩歌的「抑揚怨哀」的一面，和他早年那些「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的作品成爲鮮明的對照。

### 三

曹植是好大喜功的人，強烈地追求身後榮名。他的第一志願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立「經國之大業」。其次是在學說上有所貢獻，「成一家之言」，最後才是做一個文學家，「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但究竟還算看得起文學，他相信文學也可以使人不朽。所以他

在王佐事業碰壁以後還是下決心：「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雖然做詩人是他的第三志願，他却是第一個以詩爲事業的人。詩終於使他不朽。

他的文學觀念是進步的，他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他也熟習民間文藝，他曾對邯鄲淳背誦「誹優小說數千言」〔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略」〕，對於樂府民歌的欣賞更不消說。「通俗」是當時新興階層文人的進步傾向，在漢靈帝時已經如此，保守的、屬於舊階層的文人如蔡邕，就反對這種傾向（詳見「後漢書：蔡邕傳」）。這種傾向使曹植重視五言詩，用來做主要的文學形式。

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學——詩、騷、賦、頌——的修養，這對於他提煉詩的語言有所幫助。但他是在樂府民歌的基礎上來提煉，不是把詩騷賦頌移植到詩裏來。所以他發展了樂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他把五言詩從「質木無文」發展到「詞采華茂」是功績，不是罪愆。至於後來陸機、顏延之等人受他的影響而走得太過，却不是他所應該負責的。鍾嶸「詩品」說曹植在文學領域裏的地位「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竟推崇到這麼一個程度，今天看起來，自然過分一些。但是話說回來，他畢竟是奠定五言詩基礎的最大功臣，他的成就畢竟超過同時代的作者。當時文學的進步性在他的詩裏表現得非常鮮明。他確是建安詩人最適當的代表。

## 陶淵明（三六五—四二七）

王 瑤

一

聞一多先生說：「儘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人民的詩人——屈原」）陶淵明自然不是道地的農民，更不是農民的代言人；但正像從宋朝以來的一些名士們把陶詩捧成飄逸淳真的極境一樣，我們從「反感」出發，自然也容易否定的太多了一些。他除過歌頌「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的農村自然景色外，他也歌頌過勞動和勞動人民；「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他自己也是勞動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也不能不說是一般農民的共同感覺。就因為他雖然不是道地的農民，卻的確「躬耕」過，「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他體驗了實際的勞動味道。他自己說他是「聊爲隴畝民」的，說「聊爲」，自然有點不得已或勉强的意思，這就是和一般農民間的距離，他可以「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農民卻沒有那麼達觀。但他也同於當時一般的高門士大夫階層的名士，譬如謝靈運的山水詩，就是在「鑿山浚湖，穿池植榎，出入羣從，結隊驚衆」的情形下寫成的；而且屈柄笠，謝公屐，豪華遠達京都，鄰郡疑爲山賊，

這都不是淵明所能比擬的。在那樣一個晉宋易代的時期，又是那樣一個門閥勢力強固統治的社會，他固然也可以出仕，而且也出仕過四五年，但所能得到的地位也和彭澤令差不多，正像他常來往的朋友是龐參軍、戴主簿、郭主簿、羊長史、張常侍這些人一樣；這雖然也都是些官兒，但和高門鉅族間的距離是很遠的。他是否是陶侃的後裔現在還未論定，作者個人是不相信的；但陶侃也是以武功致貴，並非大族，這並不妨礙我們的論點。他祖父父親都做過太守之類的官（據「命子」詩，他父親「寄跡風雲，冥茲愠喜」，蓋用孔子稱「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去之，無愠色」之典，昔人謂其曾任安城太守之說當有據），和他的身分差不多，在那個門閥統治的社會裏，是一個不容易向上發展的小有產者。到他自己，境況就更窘迫了；家庭人口多，中年屢經喪事，又遭火災，「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生活的確很困苦；這就使他和農民們有了共話桑麻的可能性。「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他和農民的交往中也有一分真實的情感；他詩中固然有許多與農民絕不相干的東西，但這點也是不能否認的。

這情形我們也可以拿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來說明，「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的確是他的寫照。在當時，他的詩簡直沒有人注意。晉末的詩人，大家舉殷仲文、謝混，同時代由晉入宋的詩人，江左並稱顏謝，都不論及淵明。鍾嶸「詩品」列之爲中品，而文學批評的



專著「文心雕龍」，歷評以往各代著名文人，竟無隻句涉及淵明。此外如沈約「宋書」，只把他列在「隱逸傳」，而於「謝靈運傳」後作長論以闡一代文風，其中也沒有說到淵明。「南齊書：文學傳論」，以及晉宋各史傳，都沒有論到陶詩，如果說他在當時還有一點爲人重視，也只是爲了他的行爲，而不是爲了他的詩。「文選」江文通「雜擬詩」三十首中，有擬他的一首，「詩品」列之爲中品，才算開始有人注意他的詩；但一則題爲「田園」，一則評爲「隱逸詩人之宗」，評價都不算高，最多也只承認他一方面有成就。直到梁昭明太子編集作序，採他的詩入「文選」，淵明才在文學史上有了一個較高的地位，但離東晉已經過三個朝代了。然而極端地推崇與賞識陶詩，實在是始自北宋。爲甚麼陶詩在當時這樣不受人重視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微地輕」。在那個重視門閥地位的社會裏，詩文只是「市朝顯達」的專用品，像他這樣一個日漸淪落的小地主階層的人，是不會被人重視的。沈約「宋書」成於齊永明五年（四八七），距淵明卒年（宋元嘉三年，四二七）僅六十載，但傳中對他的名字已有了「或說」的疑問，就可證明他在當代地位身分之寒微了。又因爲文化是掌握在高門大族的手裏，他們的生活和要求都和陶詩的風格不合拍，所以像謝靈運底富豔難蹤的詩體，可以蔚爲風氣；「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彫琢，也可以爲當世所競；而陶詩則認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根本田園生活可以入詩在當時就認爲有點俚俗，那是和高尙隱士們所在

的「山水」有別的。謝靈運說「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這不同就是雅俗的分界，正如現在作五七言律的詩翁們看不起新詩一樣。而且這種農村生活的題材內容也決定了他平淡自然的風格；「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是很難用富艷彫琢的筆調來寫的。像「而無車馬喧」，「今日天氣佳」這類散文化的比較近於口語的句子，像「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這類接近歌謠的句子，在當時都很突出和特殊；所以一般文人認為他的詩也和他的生活一樣，是「枯槁」的。唐朝人仍然是這種看法，杜甫說「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皇甫湜歎其「不文」，都和北齊陽休之「陶集叙錄」說他「辭采未優，棲託仍高」一樣，是傳統的觀點。所以即使向高處評價，也只能把他由「田家語」升到「隱逸詩人之宗」，和詩的正統還是不相干的。這樣，他和詩，以至整個生活，都和當時的一般文人存在着長遠的距離，這是他在當時不受重視的原因，但同時也就是他比較接近農民生活的偉大的地方。從這些地方去理解陶詩，我們就不會把他一筆抹殺了。

## 二

魯迅先生說：「被論客讚賞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

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爲『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後來雖然自說因爲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又說：「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係）「陶集」中像「述酒」「讀山海經」「詠荊軻」這些詩表示着他極重要的一面，我們不再細說；當然可以證明他沒有，也不可能超脫了那個時代；其實即爲一般人所稱贊的另一些詩，也並不是完全靜穆的。後來人多少誇張了，甚至曲解了他的原意，這也說明了爲甚麼宋以後又那樣極端地推崇陶詩的原因。即以「采菊東籬下」一首爲例，這詩的主點當然是在前四句，蘇東坡以前稱贊這詩的人也是稱贊前四句，王安石就說『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心遠」用「莊子：則陽篇」意，陶詩在思想上並沒有超出當時一般的潮流，基本的出發點仍是老莊哲學。詩意當然適合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情趣，又可爲正在從仕的人當作「朝隱」來解嘲，爲人欣賞是可以理解的。「采菊東籬下」二句在全詩中只是即景點染的句子，並不重

要。他采菊是爲了服食，爲了延年，並不是欣賞。「九日閒居」詩序云：「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九」「久」諧音，「九華」言九日之黃華，指菊。「藝文類聚」引魏文帝「九日與鍾繇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至於芳菊紛然獨榮，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所以這詩中說「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說「菊解制頹齡」。「飲酒」詩也說，「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這傳統很早，「離騷」就說「餐秋菊之落英」。「西京雜記」謂：漢人采菊花並莖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飲，謂之菊花酒。「水經」湍水注云：「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水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此自綏養。」可知服菊在當時還是很流行的。陶詩中有許多講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感覺，如「形影神」詩：「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社會動亂時代給人帶來的不自然的死亡，老莊哲學宇宙觀的推釋，都容易產生這種想法。從「古詩十九首」開始，就有了「人生忽如寄」的表現，應付這自然命運的方法就是「服藥求神仙」。服藥是求生命的相對延長，求神仙是求生命的絕對延長，這是魏晉詩人的普遍思想，所以服藥（藥的種類很多，如何晏服五石

散，葛洪服玉屑，淵明服菊，梁武帝服丹等）是當時文人生活中的一個特點。陶淵明在思想上是和當時一般文人差不多的，他樂久生，所以他要服食，這就是「采菊東籬下」的原因。「南山」是用「詩：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壽」的典，因為要服菊，所以想望長壽。揚雄「解嘲」說「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原是長壽的人；「南山」也是詩文中習用的喻壽的詞。謝莊「舞馬賦」：「山有壽兮松有茂。」王融「曲水詩序」：「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梁簡文帝「南郊頌序」：「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張正見「侍宴」詩：「願薦南山壽，明明奉萬年。」都是以南山喻壽考的。「悠然」是邈遠之意；「詩：小雅漸漸之石」：「山川悠遠」，淵明「停雲」詩「良朋悠邈」，意都與悠然相同。「見」字本應作「望」，「想望」之意；今作「見」蓋蘇東坡所臆改。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載「雞肋集」曰：「詩以一字論工拙，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公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俗本作「望」，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山，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在此以前，「文選」「見」字作「望」，白香山「效淵明」詩作「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陶集」李公煥注也引東坡說「今皆作望南山」。在東坡以前，沒有引作「見南山」的，也沒有稱贊這兩句詩的，例如王安石就是稱贊這詩的前四句。蘇東坡既知當時各本皆作「望南山」，而他改「望」爲「見」也並不說出根據，只說「陶集」的本字都是俗本，改了以後比較好。可知原句倒是「望南山」。魏晉詩摘句都很難，更不能

「以」字論工拙」。清何焯評「文選」曾云：「見」字就一句論誠佳，然山氣飛鳥皆望中所有，非復偶然見也。」後來黃侃也說：「望字不誤，不望南山，何由知其佳耶？無故改古以申其謬見，此宋人之病。」都是就文義來說明「望」字較好。稽康「思親詩」云：「望南山兮發哀歎」，也可爲陶詩的佐證。顏延之誄說淵明「心好異書」，是指「六經」「老」「莊」以外的如「山海經」「穆天子傳」「列仙傳」等書，相傳「搜神後記」也是他作的（即使是附會也總有一點可以附會的綫索），這都可以說明他的「服食求神仙」的想法。他一方面有目的地在東籬下采菊，一面又想着悠逸的長壽；南山是壽考的象徵，所以在想望中是佳氣蔥鬱的。「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正說明了「洵是仙居」；而且「日夕佳」也並不是一瞥地就可以偶然「見」到的。這種求長壽的想法儘管俗氣和可笑，但它卻是一種現實的願望，無寧令人覺得真率 and 可愛；而絕不是一種超現實的靜穆，如後來一般名士論客們所讚賞的。蘇東坡說：「見南山者，本是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這就是宋朝以來許多人誇張地曲解地歌頌了陶淵明，而實際只是歌頌了一種超現實的高雅思想的開始。這以後講陶詩的實在太多了，但大抵都是這一類。魯迅先生說：「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裏，僱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爲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係」）一切

誇張地贊賞陶詩飄逸靜穆的人也一樣，和陶詩本身並不像。

### 三

梁昭明太子「陶集序」云：「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飲酒自然是陶詩中的一個重要題材，需要加以說明的。他不滿意當時的政治社會，不滿意一般士人的「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但又無力和不能改變現實，於是只好消極地逃避和退隱了。「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他也是很關懷現實的，但「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飲酒只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可奈何的辦法。文人飲酒的事跡在以前也很多，例如竹林七賢，但陶淵明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詩連了起來，把酒當作詩的重要題材。在這點上，他是文學史上的第一人，對後來的影響很大。即使阮籍，「旨趣遙深，興寄多端」（沈德潛語）的詠懷詩底作者，詩中也沒有關於飲酒的抒寫，酒只和他的生活行爲有了關聯，所以我們看見了任達。但陶淵明卻把酒和詩直接連繫起來了，酒更表現在作品裏，使我們更容易看出他的生活態度。「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這都說明了他飲酒是爲了逃避的，藉酒來韜晦免禍的。即便別人對自己有迫害或勸仕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獨醉，自然彼此無法暢談，只有「發言各不

領」了。這正和鍾會問阮籍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一樣。如果對方發覺有甚麼錯誤的話，「君當恕醉人」，也可請求別人的諒解。從這方面講，他的飲酒是爲了退隱和逃避。「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這是寫飲酒之樂的，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享受和情趣；說得不好聽一點，是一種安於現狀的麻醉。這與他的不滿現實並不衝突，他雖然不滿，卻又無力變革，而且生活上也還「退可以守」；雖然需要一點勞動，但只要「達人解其會」也就可以自慰了。他的不滿只能形成一種消極的潔身自好的退隱和不願合作的逃避，而安於這種自甘寂寞的田園生活的現狀正是逃避的自然結果。在這點上，和他當時的地位思想也都是合拍的。

鍾嶸「詩品」說陶淵明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這也是歷來爲人稱道的。一般地說，隱居是一種「獨善其身」的逃避辦法，逃避自然是對現實不滿，而又無能改革，或不願改革的行爲，所以多半發生在社會不安定的時候。本來當社會情形不能滿人意時，一些知識者羣，除了順從地適應外，也只有兩條路好走：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但行義達道的路不但很難，並且也很危險，而這些封建社會中的士大夫階層，本質上是避難就易，明哲保身的。因此一到社會動亂時隱士就多起來了。隱居的動機雖然只是由個人出發的



逃避，但也都帶有幾分反抗氣，表示着對統治者不滿的抗議，人們也自然敬佩他的氣節。這種隱士歷史上自然有很多，如伯夷叔齊就是。但到大家都以隱爲高的時候，隱逸本身有了他的社會價值，隱士的花樣就多得很了。例如東方朔的朝隱，皇甫希之的充隱（「晉書·桓玄傳」），陶宏景的山中宰相式，盧藏用的終南捷徑式，這些隱士就和我們上邊說的全不相干了，隱逸只成了一種擷取名利的手段。還有一種單純爲隱而隱的人，他並不對現實不滿，甚至並不關懷世務，有的只是個人的矯厲的清高，潔身崇高的招牌，自然多少也許經過一點生活上的不如意，但目前的生活是不成問題的，於是就不與塵俗爲務，就退隱出世了。歷來的隱士有很多是這種人，那極端的例子是「紅樓夢」裏的妙玉。隱逸當然不是一種值得贊美的行爲，但隱士的種類既很多，情形自然也有差別；從陶淵明的事跡和作品看來，他的隱居是有一些對當時統治者不滿的反抗意義的，雖然那也只是一種消極的無力的由個人出發的逃避，但絕不同於「爲隱而隱」和「終南捷徑」的隱士，是中國傳統的重正義尙氣節的比較好的一面的承繼。鍾嶸說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不只「文體省靜」的詩的成就是如此，「每觀其文，想其人德」，行爲的本身也是如此。朱子語錄云：「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但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這也說明了當時高門大族出身的士大夫和陶淵明之間的距離和差別。

在對他所不滿的統治者毅然不合作這一點上，陶淵明也是應該得到較高的評價的。我們並不想把陶淵明講成農民的代言人，但他也絕不同於當時的一般門閥子弟的名士；以一個比較接近農民的日漸淪落的小地主的身分，他的詩也部分地寫出了一些人民感受的真實。把他擺在文學史上和當時別的作家一比較，就可以看出他的突出和卓異。魯迅先生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從歷史的觀點看來，今天我們還可以說他是偉大的。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五日脫稿

##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

范寧

愉快的、熱情的、能生活和愛生活的人，一定是勇敢的。李白以傲岸的豪邁的氣概，與庸俗的沒有出息的達官貴人作了四十餘年長期的鬥爭。雖然他鬥爭的對象只是少數官僚貴族，不是貴族階級，而且鬥爭的出發點還多半是由于自己「不得高官職」；但無疑的，這位「眸子炯然，哆如餓虎」的詩人，獲得了人民普遍的熱愛。的確像E·A·柯斯銘斯基所說，「唐代優秀的詩人，大家認為是李白和杜甫。中國人因他們的名字而驕傲，正如同俄國人因普式庚的名字而驕傲一樣。」

把我們的詩人的神情，復活在想像中，給予一個逼真的描繪，要算詩人的同鄉宋代蘇東坡了。他在詩人的畫像上寫着，「西望太白橫峨嵋，眼高四海空無人。」這，說得很對，李白就是用這樣的姿態對待那些達官貴人，那批終年株守、無大志向的「壁畫蒼鷹」們。●陳藻在讀李翰林詩裏說，「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對於太白詩歌的認識和了解，陳藻比王安石●高明多了。生長在「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的時代裏，詩人是懂得該為誰而歌唱的。

關於詩人的誕生，他的族叔李陽冰說，「驚姜（臨盆）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他自己也說，「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至于他的死呢？王定保說，「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而唐人項斯也說，「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可見我們的詩人，真是「生不同人，死不同鬼」了。這位處處與衆不同的詩人，一生中充滿了傲慢和奇聞。每當我們讀到他給韓朝宗的信上說，「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不禁使我們要問「脫穎而出」的人物，究竟具有怎樣的風貌？

### 一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

少年李白唸過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對於這位同鄉，一代文豪，他大不佩服，說「子虛所言」，「何齷齪之甚也」。言談之下，自然是說他自己所寫的賦，遠超過司馬相如的囉！但據段成式說他「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別、恨賦』」看來，他雖然自稱「作賦凌相如」，實際上總是「時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的。不過山河壯麗的故鄉給詩人的印象却是很深的。他出川以後，在客居淮南時，曾有「寄蜀中趙蕤」詩，說「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前人的遺跡，如此使他戀念和嚮往。大概四川，尤其是詩人的故居紫雲山一

帶，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清漪的溪流，迷離的烟霧，修竹寒林，黃花翠葉。縹渺的山色，回憶起來，那幅「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的山水圖，算是人境中最美的一幅畫。

不過，景緻雖然美，而人物，那些官僚貴吏却點污了這樣一幅畫面。「唐詩紀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說，「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于此，從學士大夫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苦吟云，『二八誰家女，飄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朱。』太白輒應聲繼之云，『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

你看，這個縣長，當自己轄管下的人民投水自盡了，他漠不關心，若無其事，而且還要歌詠和欣賞「翠眉」「朱口」，這成什麼話？如此昏庸，我們的詩人，怎能忍受？他舉起了投槍，狠狠的刺過去。這算是詩人和庸俗的官僚貴族作不調和的鬥爭的開始。也許因為這一回事情吧，蜀中官吏在他的印象中永遠是「磨牙吮血，殺人如麻」的狼虎。

少年李白，在沒有出川以前，曾經到過峨嵋山，到過成都。他在「登錦城散花樓」詩裏說，「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珠箔懸銀鈎。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我們的詩人把祖國錦繡河山，一一寫入詩篇，在「巴國盡所歷」以後，就「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經「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的

長征，出三峽而高歌：「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對於故國河山詩人總是充滿了濃郁的感情，從而歌頌它。他的詩像陸游所說，「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 二 酒隱安陸，蹉跎十年

二十五歲的青年詩人李白離開四川到達襄陽，這時唐朝是在李隆基（唐明皇）的統治之下，開元十三年（七二五）的社會，表面上是富裕的。杜甫曾經歌頌過這個時代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鍾粟。」這一種經濟上的繁榮，歷史上所謂「盛唐」，文學藝術也在這時發達起來，同時也給封建統治階級所慣常享受的驕奢淫佚的腐化生活打下了基礎。「清歌遏流雲，艷舞有餘閒，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本「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剛剛在安陸定居下來的詩人，就在貴族的享樂場合，唱出「誰識臥龍客」的悲愴的調子。

不過詩人並不灰心，仍然「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希望獲得一個「揚眉吐氣，激昂青雲」的機會。但是結果終于不免「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隱居湖北安陸縣的壽山，用「壽山」的名義，給揚州孟少府開玩笑似的寫了一封信，表明他

的做人態度，「不屈己，不干人」。說「昨于山人李白處，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僕以特秀。而盛談三山五岳之美，謂僕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太謬之甚也！吾子豈不聞乎，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假令登封禪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然能損人費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鑿刻金石，使載圖典，亦未足爲貴乎。」的確，詩人雖由于嚮往上層統治階級的生活，也會好奇的求見了一次韓荆州（朝宗），但很快的發現這位爲士流景仰的人物，原來是一個庸俗的官吏。「收名定價」，也「未足爲貴」的。俗士所盛談的「三山五岳之美」，而「損人費物，庖殺致祭」，不過充分的表現了一種趨炎附勢、蒼蠅也似的作風而已。我們的詩人對這些庸俗的貴族們，倒是真的揚了一回眉，說「何太謬之甚也！」並且老老實實的告訴那批俗吏，「白，嶽崎歷落，可笑人也。」「青白其眼，瞽而前行。」樂意不樂意，讓那些庸人俗吏們自己去吧，反正我們的詩人就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在那個「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的社會裏，詩人講述了一個自己的故事：

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日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

這是向一個「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是處，賓朋成市」的俗吏講的。我想這個肝胆照人的故事，一定深深的刺痛了那個酒肉論交的俗吏的心。那個俗吏，那些賓朋，都是詩人所說，「女媧戲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的東西。

周旋于庸俗的官吏之間，詩人的心境是十分孤寂的。「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閒且未去，獨立沙洲傍。」就這樣，他在安陸住了十年。就在這個時候，他學會了飲酒。范傳正說詩人「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那是對的。他飲酒，他唱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離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煞山公醉似泥。

### 三 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

在安陸住得太久了。實在看不慣那些貴族們，「白頭飛羅綺，笑歌無休闕」，他就離開了。漂泊到山東來，最常住的地方是任城（濟寧）。可是山東的士大夫也一樣是平庸的，「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自然，像這樣的貨色，怎末能和詩人李白相處呢？他在「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詩說，「五月梅始黃，蠶凋桑柘空。魯人重織



作，機杼鳴簾櫳。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汝山翁。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终于在這些俗物的誤解和嘲笑聲中，他走了。南下漫遊江蘇、安徽、浙江等地。

這時突然由于吳筠的推薦，酒色之徒的唐明皇，請他到長安去。他接受了邀請，從安徽東南部的南陵起程，十分高興說，「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就這樣「仰天大笑出門去」，洋洋得意進京去。這時詩人已經四十二歲了。

到了長安，自然「出入宮中，恩禮殊厚」。但是他已經看出來了，大唐天子李隆基（明皇）也是庸俗的。只知「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松窗錄」說，「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會花方盛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梨園子弟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持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辭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杆。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sup>⑤</sup> 這時的李白，表面上真可以說「揚眉吐氣」了。想起「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看到于今「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愉悅的笑容裏掩不住腹內的淒涼。他已經感覺到「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發現他和漢代東方朔一樣，給皇帝玩弄了。于是索性放浪形骸，像杜甫所形容的，「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其實他這時已是渴想「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了。

李白進京，事業心本來是很強的。但是這時政府大權是操持在老奸巨滑的李林甫手裏，天真純樸的詩人，自然鬥不過。他看到的統治階級的庸俗的生活是「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鷄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這時像詩人的朋友任華所說，「見說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自然，這樣的生活，不會太久長，「徬徨庭闕下，歎息光陰逝。」「北闕青雲不可攀，東山白首還歸去。」長安已經住不下去了。

## 四 一朝辭京國，十載客梁園

離開了政治中心的長安，詩人又開始了漫遊的生活。這回走動的地區很廣，生活也不安定。住得時間較長久的，勉強可以說是河南的開封（梁園）。這時他對於庸俗的貴族認識得更清楚，說「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這種現象，這種遭遇，只是加強了他對於貴族的鄙視。「勸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爲君子。」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一切都只會增益他的戰鬥的意志。

越感到寂寞的時候，他就越發拚命的喝酒。像「將進酒」中所寫的，「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雖然口裏說作樂，但不愉快的情緒仍舊很嚴重的襲擊着他。他說「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他是如此的不甘寂寞，倔強的性格，對人生永遠也不會消極的。充沛的生命力引導他去征服生活，他在「梁園吟」裏說，「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他和庸俗貴族鬥爭而充滿信心，認爲他一定可以取得勝利的果實。

自然，他沒有得到重回長安的機會。而就在這時，他和大詩人杜甫會面了。他有「魯郡東門寄杜甫」詩，「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的確，他們一見面就喝酒，而且是「醉眠秋共被」的。杜甫在寄李白的詩裏也說，「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爲鄰。」李白比杜甫要大十歲，可是他的形像在後輩的眼中，彩色是那樣的鮮明；熱情，活躍，可愛。無如這樣的聚會不久長，彼此就分手了。在離開公元七四七年杜甫第二次入長安以後的不久時間內，李白已浪遊到了（安徽）宣城。五十多歲的老詩人，「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還得飄流。他從離開長安，到這時已整整十個年頭了。

##### 五 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

當詩人李白遊歷到宣城的時候，「安史之亂」爆發了。戰爭剛一起，由於唐代統治階級的「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沒有人肯出來抵抗。安祿山從七五五年十一月在范陽（現在北京一帶）起兵，第二年六月就攻入了長安。詩人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無限的悲憤，對「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這樣慘痛的事變，他說「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靖胡沙。」就這樣他投到永王璘的幕府裏，「齊心戴朝

恩，不惜微軀捐」了。愛國的熱情迫使他走向抗敵的道路。他高呼「君看帝子浮江日」，「西入長安到日邊」。並且送他的外甥鄭灌從軍，囑咐他，「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充滿激情的李白，遇到戰鬥，是從來就不退避的。

可是這一次，就因為他在「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的氣憤中參加了李璘的事變，他有罪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連累了他。②以五十八歲的蒼髯老翁，拋妻別子，走向流竄的長途。這時只有他的最好的朋友杜甫十分的同情他，也是最能了解他的一個人。在他所寫「夢李白」詩裏說，「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這是十分沈痛的感慨，當我們談到李白的詩句，「君子變猿鶴，小人爲蟲沙」時，我們是能夠領略到的；同樣的參加事變的人，並不是同樣的得到了處罰。

樂觀的人永遠是樂觀的。當統治階級對這位年老的詩人「愛惜」起來，赦免了他的愛國罪行。而我們的詩人馬上「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恢復了高談縱飲的生活。當他從三峽折回潯陽時，他望着廬山瀑布唱，「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也許他還希望進京，然而腐化的統治者畢竟「使此人名

六 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迫害越發兇狠，反抗也愈激烈。李白從來不向流俗低頭，「安能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並且進一步要破壞一切；「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我搗却鸚鵡洲！」人是一天老似一天，而反抗的精神却一天強似一天。

伴隨詩人這類反抗的心，是天上一顆最大而光耀的星，那高懸在我們頭頂上的明月。鄭谷「讀李白集」說，「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着人間伴月明。」似乎鄭谷早發現我們的詩人和月亮的緣分。的確，從少年時代在四川時就歌唱「峨眉山月」起，此後詩歌中總常常提到月，而且有像「把酒問月」「月下獨酌」「靜夜思」等專門寫月的作品。月在他的作品中是一種「高潔」的象徵。也是詩人所追求的「鵲的」。「欲上青天攬明月」和「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詩人雖然會感到孤寂，但是皎潔得可愛。傳說詩人在六十二歲時，泛舟「捉月而死」，這是最美的故事，我想也是比真實還要真實的故事。

誰放下武器，誰就退出了戰鬥。李白是從不肯放下武器的人。他晚年來往歷陽宣城

間，對於那個假名士王歷陽的庸俗作風，還要嘲弄，不肯放過。在「下涇縣陽溪至澁灘」詩裏他更說，「澁灘鳴嘈嘈，兩山足猿獠。白波若卷雪，側石不容舸。漁子與舟人，撐折萬張篙。」詠的雖是舟子，然而在險惡的社會中，「撐折萬張篙」的正是詩人自己。

暮年的李白，似乎于他自己所隸屬的那個庸俗貴族的社會外，在勞動人民身上找到了他所要找尋的那個叫做皎潔純樸的東西。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詩中，「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春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淪。」這個荀媪和他往年所接觸的那些官僚貴族們完全不一樣，他第一次在人面前感到慚愧。尤其是當他遊涇縣桃花潭時，「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他深深的感覺到不同，真的不同，這些生命豐富的人物，完全異乎和他交戰的敵手。然而恃才傲物的李白這時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人，年華耗盡，他只是爲了個人地位把全部的精力，和庸俗的無望的高官厚祿的貴族戰鬥了一生。不能對「上元（李亨年號）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的現實，作更多的揭發。

① 李白有「壁畫蒼鷹讚」，末云，「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自注云，「讚主（一作士）人。」

② 「冷齋夜話」謂王安石說，「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識見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老學庵

筆記）謂「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

樂史「李翰林別集序」中，亦述及此事。近人頗有疑「清平調」非太白作品者，然無確證。

④ 王碑登「李翰林分體全集序」云，「予怪夫宗李者畫虎難成，妄加訾議。指永王璘之事爲從逆。嗟乎，祿山篡亂，翠華西幸，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于累卵。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倡忠烈，恢復神器，不使未央井中墜，落羣凶手……夫璘非逆而從璘者乃爲逆乎？」王氏代永王璘洗冤，辨正舊說，確具創見。其實誰正誰逆，本李唐家事耳。



## 杜 甫（七一二—七七〇）

馮鍾芸

杜甫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這五十幾年間，正是唐帝國由太平盛世轉入分崩離析的時代。先有安史之亂，後有吐蕃入侵，其他如刺史邊將叛變多不勝舉，終造成中唐藩鎮割據的局面。安史之亂是歷史的轉捩點。在這以前，國內昇平，經濟富足，大唐帝國的聲威，遠揚國外。文化藝術也得到高度發展，當時日本、新羅、百濟、高昌、吐蕃各國，都派了留學生來唐學習。但帝國的統治者在豐富的賦稅和貢納中腐化了。這個帝國因對外侵略，擴張軍費，宮廷及貴族的窮奢極欲，貪官污吏的搜括，以致財政凋蔽，民不聊生了。更加上宰相李林甫、楊國忠的專橫跋扈，排斥異己，勾結胡人以培植個人的實力，給安祿山叛變以機會。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十五載夏天陷長安。玄宗同貴妃、楊國忠等倉皇出奔，太子肅宗即位於靈武。此後國內戰爭連綿，賦稅加重，人民衣食空乏，流離失所。至德二載（七五七）安祿山被安慶緒殺死，郭子儀等帥領義軍及回紇援軍共十五萬人，打敗了安慶緒，收復長安。安祿山舊部史思明殺安慶緒，與李光弼相峙於洛陽。代宗廣

德元年（七六三），史思明爲子朝義所殺，唐借回紇兵克服洛陽。不久李懷仙殺史朝義請降，這場大亂，才告一結束。

安史之亂前後共八年，如前面所說，本來是李林甫欲借重外族力量穩固自己政權的。但是這時，統治者已充分暴露了他們的昏庸無能，國內的階級矛盾已十分尖銳，農民革命的火藥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恰好這時安祿山首先發難。本來應當由階級鬥爭的方式來推翻李氏王朝的，現在却以民族鬥爭的方式來打垮李氏王朝的統治。在這種民族鬥爭的激流中，沖淡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力量。這一戰爭所包含的內容變得複雜錯綜了。當時唐朝的統治者早爲人民所唾棄，人民受不了那種敲骨吸髓的剝削。而異族入侵的危機又喚起了人民的民族意識——愛國、忠君。那時大多數人民陷於這個矛盾中，杜甫自己也陷於這個矛盾中。在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時，人人以爲愛國是首要的任務。所以當時人民義軍紛起勤王，搖搖欲墜的唐室，在人民的愛國熱情的支持下，得以暫時維持殘局，這就是所謂肅宗「中興」。

### 一 歷史的使命

初唐的文學，還是承襲了南朝的綺麗柔弱的作風，重形式而內容相當空洞。這時的作

品不是充滿了山林隱逸的清高思想，就是充滿着一些追求富貴、追求享樂的庸俗的思想。也就是說唐初正統派的文學思潮的主流，還未脫離六朝門閥士族的殘餘勢力的支配。在這種潮流中，惟獨有陳子昂提出了復古的口號，主張在詩中有興寄，有骨肉，有作者個人的真實的生命與情感。他是結束初唐的齊梁詩風，下開盛唐的浪漫詩派的。但初唐詩的共同點，就是詩人只在抒「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與人民大眾的苦樂相結合的。它的特點是個人的。這種情形，直到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安祿山起兵才開始轉變。

安史之亂摧毀了六朝以來的門閥士族，也間接打擊了門閥士族思想意識的文學作風。我們的詩人杜甫在詩歌方面反映了這個時代的要求，完成了他的劃時代的歷史任務。

杜甫是我們的詩人中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在風格上、技巧上、學力上以及著作的分量上都是空前的。但是他的偉大，並不在於這些。這是一個成功的詩人的必要的條件，而不是主要的條件。杜甫的偉大，在於他的除舊佈新，他結束了過去具有門閥氣息的享樂主義的作風，而開闢了比較接近人民的詩歌的道路。他雖然沒有完全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但在他的作品中有極多數量的作品是為廣大農民呼籲的。他憎恨那些吃人的剝削者。杜甫的取材，是政治的興衰，社會的離亂，飢餓的痛苦，戰爭徭役的罪惡，他的作品變成了歷

史，變成了時代生活的鏡子。

杜甫並不像韓愈那樣系統地反對六朝以來的文體，提出「文體」的改革主張，他也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系統地提出了對於詩歌的主張，但是他用他的詩，用實際創作的範例給當時的文壇開闢了一條寬廣的道路。韓愈、白居易等人是毫無疑問地受了他的啓示的。從此，山林文學、廟堂文學、以及頹廢派的享樂主義文學，代表個人的抒情文學，退出了領導地位，後人稱杜甫的詩是：

言奪蘇（武）李（陵），氣吞曹（植）劉（楨），掩顏（延之）謝（靈運）之孤高，雜徐（陵）庾（信）之流麗。  
（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

只從技巧上來稱揚杜甫，是不够的，也是不正確的。杜甫自己是「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要「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他要暴露那些「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赴奉先縣詠懷」）的不合理的現象。儘管他因階級的局限使他不能整個站到人民一邊來，但是他以詩人的資格，自覺地爲人民歌唱，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在當時也是最進步的。他反映了當時人民的要求，他用實際行動指出了文學的方向。至於他在詩的格律上、技巧上的創造，都有承先啓後的意義，當然也是重要的。

## 二 家庭與少年時代的生活

杜甫字子美，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死於唐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他的遠祖杜預是晉朝的文史家。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大詩人，與沈佺期、宋之問齊名。他的父親杜閑是一個一生不得志的讀書人，雖然曾作過一個時期的小官，但沒有什麼名氣和地位。杜甫很小的時候，就沒有了母親，是跟着他的姑母長大的。他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都是繼母所生。杜甫約在三十歲時結婚，他的妻子姓楊，從杜甫的詩裏，可以看出她跟杜甫共同逃難、過窮日子，陪他入四川、下湖南，一直都在照料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生活，除了常常陷於飢餓窮困，此外是很好的。他有兩個兒子，宗文、宗武，和兩個女兒，還有一個小兒子很小就餓死了。

杜甫出身於地主官僚的家庭，他所受的思想教育也是儒家正統的思想教育，但是他過的並不是腐敗墮落養尊處優的生活，他經常與貧困打交道，加上經歷了亂離的生活，深切地知道人民的痛苦。

杜甫七歲就有詠鳳凰的詩，十五歲時身健如牛犢，「一日上樹能千回」（「壯遊」）。同時，杜甫已是「出遊翰墨場」（「壯遊」），洛陽名士如崔尚、魏啓心等，都認為是班固、揚雄的

再生。就是李邕、王翰，也認爲他是極有天才、極有前途的年青人，願意與他做朋友，做鄰居。

杜甫二十歲後，開始了漫遊的生活，他到過山西郇瑕（在今山西猗氏一帶），又到吳越（在今江蘇浙江一帶），遊歷了三四年。他在遊歷當中，認識了祖國的美麗的山川，看見了歷史記載上最熟悉的古蹟，他到過蘇州、錢塘、江寧。他二十四歲時從吳越歸來，就專心應試，這是唐朝的讀書人唯一的上進的道路。可是，這位年少氣盛的詩人，這次考試並不會考取。試場失意後，他又開始漫遊於齊趙之間（在今山東、河北、山西一帶），因爲他父親在山東作官，他的遊踪也以山東爲主。這時期他不僅善騎馬，還長於射獵。在他的追記詩裏，還可以想見詩人當年騎獵的雄姿的。他的「登兗州城樓」和「望嶽」詩，都是這時期的作品。僅僅這些詩篇，已可以列入唐代名作家之林而無愧（杜甫二十四歲以前，我們相信他作了很多的詩，但現在不存，可能爲他自己所刪）。這些成就，對於我們的詩人來說，只是一個開始，真正天才的發揮還在以後。用他自己的話總結這一時代的思想情況就是：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茫。（「壯遊」）

從這些詩句看來，少年時代的杜甫是狂放不羈的。

## 三 壯年時代及其交遊

杜甫三十三歲，與李白相見。這時，李白已成爲舉世矚目的大詩人，杜甫只是剛剛成名。李杜能互相傾佩，成爲知己，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在詩歌創作的道路上有某些程度的相似之處。李白是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的詩人，這一點杜甫與他並不相同。其相同的是李白的詩代表了一種新興的作風，這種新興的作風，打擊了當時號稱「綺麗」的正統派。像王、楊、盧、駱「初唐四傑」以及沈佺期、宋之問的初唐體，都還不脫柔靡纖弱的南朝的風格，李白的豪邁不羈，在當時正是一服對症的良藥。杜甫欽佩李白處也正在此。

另外李白的遊俠作風，是對當時不合理的政治的一種反抗行動，李白的修仙學道是對當時的高貴功名的輕視。三十歲以前的杜甫是以放蕩與清狂來鄙視人世的庸俗的。恰好李白這兩點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與杜甫起了共鳴。但李白在思想意識上還不免有些南朝文人遺留下來的「超俗」的舊作風。杜甫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未嘗不着眼於此。

杜甫從李白那裏得到新的啓示，使他堅定了他自己對詩的看法。對於李白的求仙、學道、遊俠，杜甫並不十分熱心。倒是李白的「戰城南」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對於杜甫來說，却

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杜甫中年又結識了岑參、高適、王維、賈至、鄭虔、嚴武諸詩人。這些作家並不見得在學問見解上與杜甫完全相同，但是，這些唱和的詩友，互相督促、討論，甚至用同一題目來競賽作詩。並且他們在反侵略戰爭、反權貴、作風樸實、不堆砌詞藻的這些地方，是與杜甫的創作方向一致的。杜甫的詩與當時李、王、高、岑等人的詩，都代表一種新趨向。杜甫的交遊對他的詩有過一定的積極影響也是可以肯定的。

以杜甫詩的成就來說，這還是準備時期。

#### 四 開始向人民靠攏

杜甫的父親由兗州司馬調爲關中奉天（即今陝西乾縣）縣令，後來死在任上。杜甫於三十五歲（七四六）來到了長安，接觸到唐代政治的心臟，也因此看清了唐代政治及當時權貴生活的豪奢淫佚，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富有浪漫思想。他走向人道主義的現實主義，他清醒了。

那時的長安是一堆貪官污吏橫行霸道的地方，也是上層的統治者驕奢淫佚的生活集中表現的地方。唐玄宗開始信用李林甫。李林甫在長安用特務鉗制了言論的自由，把較



有正義感的、敢說話的大臣貶逐排擠，使他們不安於位。玄宗只在深宮裏縱情聲色，帶着一羣梨園子弟，天天以玩樂打發日子，對人民的剝削是日漸加重，而對人民的疾苦是不問不聞。

這時杜甫的生活也發生了困難。他成爲貴人堂前乞討爲生的賓客。騎不起馬，每日只好騎着一匹驢子到處求人；「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窮人與富人打交道，當然是一件極痛苦的事。有時主人高興了，要他作詩，他爲了生活，也不得不應付。他曾向玄宗進「三大禮賦」，頗蒙玄宗的稱讚。本來可以博得一官半職的，但因皇帝昏聩，宦官權臣作祟，使他的希望又落了空。因此他感嘆「儒冠多誤身」。他在這種走頭無路憤恨的情況中度過了五年。這件事對他來說誠然是不幸，也正因爲這種「不幸」，才使他正視現實，成爲人民的詩人。

四十歲以後，杜甫身體開始衰弱了，從一個善於騎射的放蕩壯健的青年變成了衰老多病的中年人了，他得了肺病，又染上沈重的瘧疾（這兩種病一直纏到他死），從此以後，他的身體一直走下坡路。

後來楊國忠代李林甫爲相，楊氏姊妹封爲夫人，出入宮禁，煥赫一時。杜甫的「麗人行」就是用諷刺的手法來寫的一篇長詩。這在杜甫的創作過程中是新階段的開始，他用極

深刻的諷刺口吻來描寫楊氏家族的勢燄。這種諷刺詩寫出他對當時權貴的憎恨。他又寫了「兵車行」「前出塞」，這是他對政府的無端對外用兵、增加人民負擔的正面的抗議，是民衆苦於戰禍徭役的叫喊。他詩裏所說的，也是當時廣大農民所要說的，他所咒罵的開邊、黷武，也正是當時廣大農民所要咒罵的。他自己身經窮困，因而深深地體會到什麼是貧困、飢餓。他自己飽經憂患，受盡了豪門權貴的氣，也更清楚的認識了當時統治集團的腐敗。他對於當時天寶盛世的內幕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些活生生的教訓刺激他，壓迫他，鞭撻他，使他脫離以前的玄想，而走向實際。我們的詩人開始向人民靠攏了。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以後，杜甫開始定居在長安城東南角的「杜陵」旁的「少陵」地方，他因此自稱爲「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這是人稱他爲「杜少陵」的由來。因爲關中水旱連年，京城的物價昂貴，杜甫無力擔負全家的生活，不得不把妻子送到奉先（今陝西蒲城）寄居。這時他四十四歲。

同年冬天，他接受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後，杜甫由長安赴奉先看望妻子，這是他親身體驗農村生活的好機會。這些年他久住在長安，飽經城市的貧困生活的痛苦。這次旅行，雖只有幾百里，可是眼界因之擴大了，他的思想也更加深刻了，他的同情農民生活的心也更加明確了。「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這首詩就充分地說明這些。他還是當時中

中央政府的小官吏，他的家庭生活已不能維持。「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他的小兒子正是他到家以前剛剛餓死的。他在詩裏無情地揭發了統治者的荒淫無度，老百姓的無以為活，他以沈痛的忿怒的心情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上）當時的社會情況是；統治者窮奢極欲，老百姓要活不得。「彤庭所分帛，本自貧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同上）皇帝賞賜的綢子，是用鞭子強逼着貧苦的婦女們織成的，可是交到政府手裏，只供皇帝無限度的揮霍！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安祿山即使不起兵，難道唐朝天下會維持得長久嗎？

在「詩經」以後，杜甫以前，詩人們很少以人民的痛苦生活作主題的。詩裏最多的是個人的牢騷，所說的憂患也是個人的。把個人的憂患與人民的憂患結合起來，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的，這不得不推杜甫為第一人。人稱杜甫為「詩聖」，其真正的原因也在此。他不單憂己，更憂國憂民。他的文學作品正說明他是反映真實人生，而不是只講個人的超脫，只講個人的享受，追求富貴功名的。這是他的進步的地方。如「兵車行」「醉時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都是這一期的代表作品，確定了他寫實主義的作風，在浪漫的個人抒情為主的文學潮流中開闢了社會文學的新天地。

## 五 戰亂生活與他的創作

安史之亂，始於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一月，次年六月唐玄宗同貴妃等倉皇出奔，兩京陷落，到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一共經過了八年。被禍的地方，波及陝、豫、山、冀、魯一帶，是唐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事變。其間唐肅宗雖然靠了郭子儀等及回紇兵光復了兩京，但兩京外圍的殘敵並未肅清，且造成回紇勢力侵入中國的開端。

從此唐朝走向分裂的局面。安史之亂表面上是政治鬥爭，實質上是民族鬥爭。這是非漢族對於漢族的侵略。這一慘酷的戰爭使中國人民減少了一半（戶口轉移、逃亡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雖不盡由於戰爭死亡，但死於戰爭與飢餓的當不在少數。我們的詩人杜甫，也成了攜家逃亡的難民，他從白水避難到鄜州的羌村。有「彭衙行」記當時狼狽的情況。「痴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嘖，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次年八月，杜甫聽說肅宗即位於靈武，自己就起身趕赴靈武。中途被安祿山軍隊俘虜，禁在長安。時長安已陷落多日，在玄宗倉皇出奔時，未及逃出的王孫貴族，大半被安祿山軍殺戮，幸免於難的也是「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哀王孫）。杜甫原來痛恨當時貴族的驕奢淫佚，此時激於民族仇恨，對這

些落難王孫寄與深厚的同情。寫成了「哀王孫」，報導了長安淪陷後王孫生活的慘狀。杜甫困居城中大半年，這時他的詩篇充滿了愛祖國、愛人民、愛自由的熱情，幾乎每一首詩都是有血有肉的不朽之作。如「悲陳陶」寫他在長安敵人後方所看見的敵人得勝後的驕恣，官兵戰敗的慘狀，以及長安市民盼望官軍趕快打回長安來的心情；「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月夜更望官軍至。」如「悲青坂」中殷勤囑咐官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千萬不可再打沒有把握的仗，在「春望」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長安城中更見荒涼，亭臺寂寞，處處荒烟蔓草，長安已是一座沒有活人氣息的死城。國破家亡，長期的憂國念家，使他變得更加憔悴了。這幾年，一切痛苦的經驗他嘗過，一切殘酷的現象他看過，於是他的社會詩的題材更加豐富，寫實的藝術更加進步了。

不久，杜甫再也不能容忍胡人的困鎖，他下決心投奔在鳳翔（今陝西鳳翔）的肅宗，冒了生命的危險步行到鳳翔，肅宗任命他爲「左拾遺」。他當時有「喜達行在」詩三首，敘述他從賊中逃出的情形和心境，又真實又哀痛，讀他的「生還今日事，同道暫時人」，「死去憑誰恨，歸來始自憐」，這些句子，便可體會到他的悲哀了。腐敗的唐朝流亡政府還是一套舊作風，貪污、麻痺。我們的詩人偏要不識時務，他要認真地執行他的「拾遺」的職權。極言敢

諫，因此得罪了皇帝左右的一些人。

秋八月，皇帝肅宗實在嫌他在左右聒噪，命他回鄜州看妻子。在這次旅行後，他創作了他的不朽的長詩「北征」及「羌村」。「北征」裏，開始寫離開鳳翔依依不捨的心情，次寫路上所見兵亂後到處瘡痍的慘狀：

鷓鴣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最後寫他的妻女、鄰人對他生還的驚喜和安慰。詩中所寫的每一個短的對話，每一個小的動作中，都反映了他所處的整個時代。他寫出農村的生產力的破壞，他寫出人民朝不保夕的生活。他的人道主義現實主義的作風，得到最完美的發揮，也達到極高的成就。如寫他回到家裏的情形：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北征」）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羌村」）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歎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羌村」）

這是何等樸素而又生動的描寫！

十一月裏，官軍收復兩京（長安、洛陽），肅宗回到長安，杜甫也回到長安，仍作左拾遺官。次年（七五八）六月，杜甫貶爲華州司戶參軍。他從此離開了當年曾經十分熟悉的長安。冬末，因事到洛陽。乾元二年春（七五九）由洛陽返華州，途中作「三吏」「三別」。三吏是「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是「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六首詩是杜詩中代表人民性最強的詩。這些作品中不只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也深刻地表達出作者內心的矛盾。杜甫一方面覺得人民的負擔不能再增加了，現有的負擔已經遠遠超過人民的負荷能力。他愛人民，同情人民，因爲他身受過人民所受的痛苦，所以他有濃厚的反戰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剝削者雖然可惡，但是國家所遭受的是民族的苦難，要解除這一民族的苦難，免於異族的壓迫，只有拿出全力來擁護李家朝廷。可是這個朝廷的官吏、將軍完全不爲人民的利益着想，一味的剝削，土地越小，人民越少，剝削面減少，因而剝削量也加重。幾乎把一切可能搜羅到的男子都抓了去當兵，甚至連一個老太婆也不免捉去爲軍隊煮飯。這個戰爭是爲人民抵禦胡人呢，還是幫胡人殘害自己的百姓呢？這使他心中感觸萬端。但一想到保衛民族，抵抗胡人的亂殺亂搶，是人民的責任，他又覺得人人應該當兵。他在路上看見新婚的夫婦，丈夫被送出征，新婦勸勉他的丈夫說：「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別」）他看見一個從軍隊中僥倖生還的士兵回到家裏來，但見田園生滿了藜

蒿，同里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沒有消息。就在這時，縣吏知道他回來了，不待他休息，又叫他去服役。

「石壕吏」中老婦人淚泣着對深夜來捉人服役的官吏說：

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這首詩雖然是客觀的敘述，但詩人同情人民的感情躍於紙上。也只有對人民有深厚同情的作家，才會寫出這種千古傳誦的詩篇。

## 六 晚年生活與作品

杜甫四十八歲（七五九）棄華州司戶參軍。這時關內旱災繼兵患而至。杜甫聽說秦州有雨，秋禾有收，而他的從姪杜佑在秦州，他便攜家小去秦州就食。秦州是漢人與少數民族雜居的邊塞，杜甫在這裏住了四個月，所聽到的是胡笳和羌笛；所見到的是關山和烽煙，蕭蕭的白草，漠漠的黃雲；所感到的是漢羌兩民族雜居的輓啞不安的前途；所思念的是故友，故鄉，祖國政局的安危。他越是身居塞上邊城，越容易引起他在感情上強烈的激盪。在空間上他好像隔離了一向所熟悉的人與事物，而形骸上的孤獨更使他很痛苦。他愛祖



國，愛祖國的山川，愛與祖國山川相關聯的親戚故舊。我們的詩人是在祖國多難的環境裏長成的，他一刻也離不開所熟悉的苦難中共同生活的人民。所以這時他的念舊的詩，他的歌詠祖國山川的詩，他在關心國家安危百年大計的心情下寫成的詩非常的多。他尤其關心祖國與吐蕃民族、回紇民族關係的發展前途。他在「秦州雜詩」及「留花門」中均一再要祖國的人民提高警惕。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花門既須留，

原野轉蕭瑟。（「留花門」）

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秦州雜詩」）

正因爲他親身經歷過，他就特別認識到這一危機的嚴重性。在前一期「北征」詩中就提到回紇兵雖強，但以少用爲宜。當然，那些目光如鼠、只顧眼前利害、慣會伸手向人民要東西的統治者是無法了解這些的。

在這樣複雜沈重的感情煎迫、刺激下，我們的詩人身體更衰弱了。貧困近二十年來成爲他的影子，從未離開他一步。他也會靠採藥製藥的工作來維持生活；在飢寒交迫中，他的瘡病復發了。同時他也不甘心這樣衰病下去，一事無成。他有偉大的志願，他還要做些事情。在「秦州雜詩」裏他藉一匹老馬來說明他的力不從心的矛盾心情：

西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驢驪；哀鳴思戰鬥，迴迴向蒼蒼。

在秦州活不下去，又聽說同谷謀食容易，在這一年天寒歲暮時他又遷居到同谷。在旅途中經過無數的危險困難，這些困難一一都要他僅能支持的衰弱而頑強的體力來克服。他的「寓同谷縣七歌」：「中原無書歸未得，手脚凍皴皮肉死」，「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他雖受不了那種貧困的折磨，但他畢竟用最大的勇氣面對這些折磨。他在大雪中用鐵鑿在山中尋掘黃獨，他整日聽着兒女們迫於飢寒而發出的哭叫，他在山裏工作時，只有毒蛇、狐狸相伴出沒。

這是他生活中最艱苦的一段時期，也是他在詩的創作上最光輝最有成就的時期。

在他四十九歲那一年，離開了同谷到成都。得到朋友的幫助，定居於浣花溪旁的草堂，他東拼西湊地把幾間茅屋修了起來。不料秋八月裏，茅屋又爲秋風所破，他爲此寫成「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在這首詩中，他從自己的茅屋聯想到天下沒有屋子住的一些貧苦人民。杜甫不僅在這首

詩裏表現了他博愛襟懷的寬大，他在其他的詩如「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解憂」），「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縛雞行」），「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半荒田半得耕」（「蠶穀行」），同樣表達出豐富的同情心。無論對於人民，對於家室兒女，對於朋友路人，以至於草木蟲魚，都是如此。

浣花溪旁定居的這段時期，在他的晚年生活中畢竟是平靜的，安適的，比起他在同谷、秦州及在賊中好得多了。「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客至」）。這些詩句可看出他生活的情致。這時，先後有他的好友高適與嚴武照顧他。他五十三歲時，嚴武保荐他做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是後人稱「杜工部」的由來。他在嚴武的幕下做了六個月的參謀，即辭歸草堂，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嚴武死後，他無依靠，就離開成都逐漸東移。到渝州（今重慶）、忠州、雲安。五十五歲又自雲安到夔州，在夔州住了三年之久。

他的詩的內容在這個時期可分爲四個方面：

一是寫景詠物的，一是懷戀古人的，一是追悼亡友的，一是回憶童年生活的。他的詩雖然大約可分爲這四類，其實每一類都與他當前的生活感情密切結合在一起。如他詠一匹畫上的馬時，他想到對於時局要有所盡力；如他看到西蜀的櫻桃，也想到他所處的亂離

的時代；如他看到一棵生病的橘樹，他也會想到安史亂前由四川送荔枝給楊貴妃，勞民傷財的事；如他看到庭前的亂草，他想到小人的應當及時剷除；他聽到花敬定的歌舞，就想到軍閥割據所帶給人民的災難；他的「詠懷古蹟」，歌詠時事，幼年生活的回憶，都使他對當前的黑暗發出嚴正的責難。

有人以為杜甫在蜀中的詩退步了，不再有「北征」「赴奉先詠懷」「前後出塞」那種大氣磅礴濃烈熾人的感情。多少有些「逃避」了。其實這個時期的杜甫並沒有消沈，我們的詩人從來沒有消沈過。自從他經過戰亂，認識到人民的痛苦並接近人民以後，他就堅持了這一信念，並且隨時結合這一信念發揮了他的創造的才能。

他自己說「晚節漸於詩律細」，「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又說「漫學陰何苦用心」（「解悶」），「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這都表示他對藝術創作的責任感加強了。他並非忽視內容，只在形式上刻意雕琢，咬文嚼字。他對於詩，不是從字句上來用功而是從生活體會上用功的。他在這個時期學會了採用民間的口語，把詩與自然的歌唱密切聯系起來。它平淡，自然，接近民間的形式，所以特別親切感人。如「絕句漫興」等作品：「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絕句漫興」），「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老妻畫紙爲

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江村）。

其次，他在這一時期寫的七律詩特別多，他發展了這一新興的詩體並將它鞏固下來。在杜甫以前還有人以為律詩不是詩的主要形式，以為絕句更古些，五言比七言更古些，越古越好。杜甫更多更成功地採用七言律詩的詩體，甚至七言律詩。使詩的表現形式多樣化，杜甫以後七言律詩成爲近體詩的主流。因爲七律的音樂性强，組織嚴密，可以比五言詩的音調更曲折縈迴。七律的造詣在杜甫此時達到空前的高度。如「閣夜」，如「登高」，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詠懷古蹟」，「諸將」，都是千古絕唱。

在這一時期，杜甫比較有空閒來觀察自然，了解自然，所以這時有些詩簡直是有價值的「科學小品」。花草的生長，昆蟲禽魚的活動，山巒的歸雲，江邊的落照，都被我們的詩人攝入詩篇，擴大了詩的領域。如：「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鸕鶿對沈浮」（卜居），「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南鄰），「銜泥燕子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絕句漫寄）。

還有些回憶詩，使後人從詩裏認識到他的童年的生活，既有文學價值，又有歷史意義，成爲後人研究杜甫生活所不可少的直接材料。

老年的杜甫已放下了士大夫的架子，以田父野老的身分與當地的勞動人民，他的左鄰

右舍，交朋友。他住在鄉下，有更多的機會來認識勞動人民，所以不知不覺地對於勞動人民發生了感情。不但熟悉他們的形象，並且熟悉了他們高貴的品質。比如夔州有些女子爲了生活措鹽來賣，終日勞動，以致四五十歲年老貌醜不能結婚，有些人倒果爲因，說她們粗醜，才嫁不出去。杜甫爲她們分辯說，假如說夔州的女人粗醜，何以能產生昭君那樣絕代佳人呢？

杜甫的西鄰有一位貧婦人，她常懷着恐懼來到杜甫屋前的棗樹旁打棗吃，杜甫從來不干涉她。後來杜甫把這座屋子讓給吳某居住，還寫了首詩勞他照顧這位西鄰，千萬不要阻擋她來打棗。「堂前撲棗住西鄰，無食無衣一婦人，不爲困貧寧爲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 七 詩人生命的終結

杜甫在四川九年，由於氣候、水土不服，他除了瘧疾、肺病以外，又添了風痺、糖尿症。這些病時發時好，他的健康從來沒有完全恢復過，他於五十七歲時（七六八）出川，到了荊州依靠他的同宗弟弟杜位，已經是「右臂偏枯耳半聾」了。生活無法維持，於是又到公安縣。從公安轉岳州，沿湘江上溯潭州、衡州，他本想回北方，而北方兵亂去不成。他又想東下江南，而江南的一些親朋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陽

樓）他只好以船爲家，在湘江上漂泊。有時只靠就江岸採些野菜煮湯來度命。潭州兵亂，他又逃回衡州，想到郴縣尋舅父崔偉，走到耒陽縣境，江水大漲，停泊在方田驛，幾天沒有吃到東西。耒陽縣令知道了趕忙派人送來酒肉。水退後，尋不見杜甫的船，耒陽令以爲他淹死了，便修了一座空墳紀念他。其實杜甫從未陽折回舊路打算回長安去。不過因貧病交加，未能實現他的計劃。百病交纏，半飢半飽的生活，使他的身體再也無法支持了。他的根本病源是飢餓與貧困，是放不下憂時憂國的深情。他有時尋點草藥來吃，藥吃下去便出虛汗，他自知不起，寫出了他的生命中最後的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即使在這一首詩裏，他沒有忘了國家的局勢，他還是關心着戰爭帶給人民的痛苦。

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的冬天，我們的偉大的詩人死了，他的靈柩停厝在岳州，直到他的孫子杜嗣業才把他的靈柩運回首陽山下杜家祖墳裏安葬。這時已在杜甫死後四十三年。

## 八 結束語

杜甫是天才詩人，但是他的遭遇是不幸的，他一生在貧困中，在亂離中。正因爲這些原因，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廣大的人羣，不再孤獨地躲在書房中創作。他的創作態度是博

學、苦修、不模擬、不隨便作、推陳出新。隨時想到人民的痛苦、國家的災難。

他一生只有短短的五十九年，現存的作品有一千四百餘首。他的作品和南朝以來的綺靡柔弱的文體絕然不同。其中很多作品在思想上是自覺的，爲人民歌唱的。後來的大詩人如韓愈、白居易、元稹，都很受他的影響。

杜甫現存的詩都是在二十四歲以後寫成的，從二十四歲到他死，三十五年間創作量如此之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杜甫也許自己不自覺到他的詩何以晚年比早年好，他以爲「讀書破萬卷」，就能寫出好詩來。但是我們今天可以替他回答這一問題，就是「讀書破萬卷」是他的詩成功的條件之一，重要的是靠近人民以後，他的詩才有了飛躍的進步。所謂技巧、風格，都是以思想性爲基礎的，而思想性的基礎就是生活。杜甫中年以後，特別是在長安兵亂之後，他直接參加了難民的行列，飽受了飢寒顛沛，因而人民的苦難杜甫是完全懂得的，並且也會分擔過他們的苦難。這就使我們的詩人眼界擴大了，情感豐富了，與廣大人民休戚相關了，所以他才會有那種不朽的成就。他並不是勞動人民，而他却寫出了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唱出了勞動人民的迫切的願望，這是值得我們今日特別重視的。



#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

葉兢耕

## 一 詩人的一生

第九世紀在中國唐代詩壇上出現了一位熱愛人民的大詩人白居易。他在大曆七年（七七二）生，會昌六年（八四六）卒，一共活了七十五年。他生活的時代——主要是建中、元和、長慶時期（七八一——八二四），已經不是我們所熟悉的美麗而偉大的唐代盛世了。這是一個極端苦難動盪的時代。他少小時家庭離散，避難到江南。他極沈痛地敘述當時的情況：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這時候北方連年用兵，又遇着旱荒，人民的生活貧苦已極。這給少年時代的白居易留下一個慘痛的印象。他後來一再做詩，追念這段生活。

他在六七歲時就對於文字發生興趣，學習做詩。到得十六歲進入京城長安，拿了自己的作品去拜見名士顧況。顧況起初看到這位陌生少年的名字，很談諧的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讀到第一首「賦得古原草送別」詩：「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才發現這真是一個少見的天才呀！立刻對他說：「你能做出這樣好的詩，居亦何難！剛才同你開玩笑罷了。」因此，白居易的詩名大振。他十七歲時做的一首傳誦的詩：「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却似畫圖中。」（「王昭君之一」）可以見出這位少年詩人的才氣洋溢了。

白居易二十歲後，準備進士考試，苦節讀書，努力學做詞賦，「口舌成瘡，手肘成胝。」二十八歲那年住在宣城哥哥家裏，才爲宣城守所貢進士。那時候地方的人才，也像各地的土產一樣，每年進貢到中央政府。貞元十六年（八〇〇）考試中第。三十二歲參加朝廷拔萃科的考試，入甲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在長安城裏住了下來。白居易少年時飽經憂患，深知民間疾苦，到了繁華的都城，見到朝廷粉飾太平，人人日夜忙碌於爭名逐利。這樣的生計使詩人發生厭惡之感。他一再地說：「帝都名利場，鷄鳴無安居。」「長安十萬人，出門各有營。」有一天早晨白居易送朋友去考試，自以爲東方還沒有發白，出門太早了。那裏知道街道上車馬成行，到處高高低低的火光影子，夾着一聲二聲的街鼓。這些人中有的已經是得勢的早朝者。詩人極感慨地說：「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羣動互營營。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因此，促使詩人想到自己官滿後，有「歸山」之意。這充分表現出生活在封建社會裏一個比較有良心的讀書人的苦悶心理。

這時候的讀書人，既脫離了勞動，就祇有一步一步爬上政治舞臺，參加到統治集團裏去，才是唯一的出路。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八〇六）和元稹將應制舉，兩人「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

這一次考試他們都成功了。白居易因為說話太直，不能做諫官，入四等，授盩厔尉（陝西盩厔縣）。他在盩厔做了一首有名的故事詩「長恨歌」，寫成後立刻傳唱開去。元和二年（八〇七）授翰林學士，三年做了左拾遺諫官。他懷着滿腔熱情，走上政治舞臺。他做了諫官，很能盡職。這時候朝廷有兩件錯誤的措施，白居易都大膽地加以批評。第一，朝廷委任宦官掌握國家軍政大權。憲宗要派得寵宦官吐突承璀做制將統領。白居易反對最激烈。他當面對憲宗說明宦官做統帥的利害關係。憲宗無可奈何，心裏却很不滿意他，對宰相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耐！」第二，是請求朝廷不能再對河北藩鎮用兵，人民受苦太深了。他懇切上書，憲宗不得不聽。當時一般舊官僚一味爲着討好憲宗，不顧人民利益，勾結宦官，主張用兵，擴大內戰。國家和人民都受到很大的損害。

元和三年中央的考試發生了很大的爭執。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參加了這一次考試，他們的對策很急切地指出時政的缺失，言辭鯁直，無所迴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李

益等把這三人都錄取了。舊官僚眼見這批人加入中央統治集團裏來，就大起恐慌。宰相李吉甫是舊官僚的領袖，立刻上訴憲宗，指斥考官的舞弊，說他們互相勾結一氣，使落選的人感到很不公平。憲宗不得已，把考官楊於陵以下都貶了官，給予嚴重的處分。白居易當時也是制策考官，他冒着危險出來說話了。他懇切上疏，詳論李宗閔等敢於直言是對於朝廷有利的。憲宗這樣的處理是閉塞了輿論。這一事件說明了很重要的社會背景。中唐時代的士大夫階級分化為兩個陣營。從進士科出身的是新興的士人階級，多數是出身於比較卑賤的小地主階層，社會地位不鞏固。他們要奪得政治實權，就必須依靠同科同門同年等關係，結成嚴密的進士集團。這樣就和另一部分從承襲六朝以來舊門第的大地主貴族形成了對立的地位。科舉出身的士人常常為貴族士人所輕視。到了憲宗朝在政治上漸漸發展成爲兩個敵對的政黨。這一次考試的爭執，就是兩個集團鬥爭的一次集中而尖銳的具體表現。白居易雖然升朝較早，沒有捲入漩渦。可是，他的出身屬於新興的進士階級，也就不得不爲自己的集團說話了。

白居易在這時期配合了政治活動，努力寫作諷諭詩。

元和五年（八一〇）元稹貶官到江陵。白居易上疏救他的朋友，沒有成功。自己也輪到改官，以奉養母親爲理由，請求做京兆戶曹參軍。明年母親死了，他退居長安郊外渭

村。近三年的農村生活給詩人深切的體驗。當時農村經濟瀕於破產，農民痛苦的生活時時激發他深切的反省。他在重陽節登高野宴，做了一首詩說：「請看原下邨，邨人死不歇。一邨四十家，哭喪無虛月。」他又有「聞哭者」詩說：「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四鄰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他在鄉村裏住着，深愧自己坐享祿位，飽食終日，一點也不勞動，那和一隻被人養衛的仙鶴又有什麼區別呢？他常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自己相比。在「村居苦寒」詩裏說：「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絕被，坐臥有餘溫。幸免飢凍苦，又無隴畝勤。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詩人具有着何等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他在閒居生活中，不斷地關心人民的生活，愛人民的熱情時時起伏在心頭。他在渭上偶釣或隱几沈思時，往往不能忘懷自己做的樂府詩。他說：「我有樂府詩，成來人未聞。今宵醉有興，狂詠驚四鄰。獨賞猶復爾，何況有交親。」樂府詩是表現他平生「兼濟天下」的抱負的詩。因此，哪怕自己在迷惘沈醉中，仍壓不住要「狂吟驚四鄰」了。

元和九年（八一四）重返朝廷，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宮官）。白居易因為做了許多諷刺達官貴人的詩，平素得罪了人。因此，一般舊官僚也找了機會來誹謗他。執政者正好討厭他，下一年秋天就把他貶為江州司馬。

那一年秋後他貶官到九江做一個郡吏。接到元稹寄給他的一封長信（見「元氏長慶集：敘詩寄樂天書」），他在歲暮也就回覆一信。他寫這封信時情緒異常激動：朋友的信給了他許多觸發；自己四十多年在現實人生中的鍛練；種種榮辱得失給予他的感染。他把這一切都向他的朋友傾訴了。

白居易在江州住了三年多。元和十一年（八一六）秋天在潯陽江頭送客，遇到一位已嫁作商人婦的長安歌伎，是彈琵琶的能手。白居易聽了她的演奏，有所感動，寫成「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寄託很深的身世之感。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春天，因為調赴忠州（四川忠縣）做刺史，自潯陽沿江而上三峽。三月船到夷陵，遇見元稹，置酒賦詩，歡聚三日而別。元和十五年（八二〇）正月，內廷宦官殺了憲宗，穆宗依靠宦官的擁立，承繼了皇位。這時候元稹利用宦官，得到穆宗的賞識，召回朝廷，為祠部郎中知制誥。白居易在這一年冬天也自忠州召還，和元稹同做制誥大臣。穆宗初即位，元稹很得勢，做了宰相。四月又開了一次考試案件。主考官錢徽錄取了十四名進士，其中有李宗閔的女婿在內。李德裕、李紳、元稹等上奏控告他們考試舞弊。穆宗下詔讓白居易、王起重試。這時候兩李（李宗閔、李德裕）各分黨派，互相傾軋。此後延續了四十年的鬥爭。白居易的太太是楊穎士的小姑，而楊穎士與李宗閔同屬一黨。白居易

不願捲入黨爭漩渦，只有周旋兩黨之間，是十分苦悶的。長慶二年（八二二）河朔藩鎮又作亂了，朝廷政局更混亂不堪。白居易屢次上疏討論時事，發表意見，都不見採納。他見到元稹擠上了宰相的位子，很快又被擠了下來。他對政治冷淡極了。於是下決心脫離朝廷，求做外任官，到了杭州。在杭州做了不到三年的刺史，却爲人民辦了兩件大事：把錢塘湖築起堤壩水閘來，便於蓄水，放水，灌溉了一千多頃田畝。他對於政治真冷淡了嗎？決不是的。他實在一心想在政治上實現他的「兼濟天下」的抱負。因此只要有機會就做一些對於人民有利的事。在杭州十一月的大寒天，他做了一首詩。他感到老百姓在這「北風吹沙雪紛紛」的時候，連粗布襖袴都穿不上身，而自己却「重衣複衾有餘溫」，不能不「此時太守自慚愧」了。於是詩人大發狂想：「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繪亦非帛，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製未畢，出亦不能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他處處表現出人道主義的仁者心腸。所以他臨去杭州的時候，百姓紛紛餞送，甚至有遮欄歸路，流眼淚的。

他離杭後又做了一任蘇州刺史，也曾召回朝廷。朝廷政局與黨派的鬥爭也愈來愈尖銳，皇位的繼承全由宦官決定。敬宗爲宦官所殺，文宗即位。士大夫的黨爭更加尖銳複雜。文宗對黨爭很厭惡，但也無可奈何。他曾對侍臣說：「去河北藩鎮賊非難，去此朋黨實

難！」士大夫黨爭有長期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而且到了中唐又密切地與內廷宦官的鬥爭勾結一氣。宦官的勢力不能拔掉，而士大夫的黨爭既是宦官的附屬品，又怎能消滅呢？

白居易在這個時代，要想免去黨禍，就祇有稱病不出了。以後連做了幾任閒官。從五十八歲起將近二十年的晚年生活，大抵過着一種退隱的官僚生活。平日飲酒賦詩，聽歌伎唱歌，治理亭園花草，兼亦煉丹燒藥。這完全是一種名士的生活方式。大和五年（八三三）他六十歲，元稹死了，很悲痛的哭自己的朋友。六十七歲那年得風疾，把心愛的馬賣了，把歌伎放了。七十一歲退休，晚年的詩友劉夢得死去。他祇有結交些老年人和和尚，消磨風燭殘年。

白居易在一個充滿了苦難與矛盾的時代裏生活了七十五年，這是一個漫長的歲月。他的一生充滿了對人民的熱愛，他留給了後世很豐富的詩歌遺產。

## 二 詩論與創作

白居易元和十年（八一五）貶官到江州，臘月裏寫了一封長信給元稹。這封信通常稱爲「與元九書」。全文收在「舊唐書」的本傳裏，是一篇極重要的詩歌文學理論文字。他寫這封信時充滿了熱情與戰鬥氣息，也是一篇古典散文的傑構。



在這封信裏他總結自己的政治的和創作的生涯，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嶄新的文學主張。他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寫文章做詩歌要反映現實，反映人生。他提出了這樣鮮明的文學主張，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學理論上是一件大事，必須大書特書的。白居易有意識地舉起了一面文學改革的大旗。他一心想貫徹這樣的創作主張。在古典文學中，他非常重視「三百篇」與歌謠，因爲從這些作品中間，可以聽到人民的聲音，可以了解輿情，輔助政教。他也檢討了唐以前和他自己時代的詩歌，他發現文學的寫實的傳統快要中斷了。詩從漢魏以後，漸漸成爲文人的娛樂品。齊梁以來，專從文學形式上用工夫，詞句雕琢得很華美，內容却貧乏得可憐。他認爲這種文學，祇是「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他很痛惜「詩道崩壞」，有心要來挽救這衰敗的文風。因此，他在創作實踐上，配合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努力寫作諷諭詩。

他在元和十年以前，一共寫了一百五十首諷諭詩。到長慶四年（八二四）元稹替他編輯詩集時諷諭詩一類收了一百七十二首。相隔十年光景，不過增加了二十二首。以後詩人決心退隱了，就放棄了這類詩的創作。諷諭詩的創作是和他的政治生活配合的。這類詩在形式上又分爲兩類。一類是關於「美刺興比」者，稱爲諷諭古調詩。其中以「秦中吟」十首爲代表作，都是用五言古體，承襲了五言樂府的傳統。一類是「因事立題」者，稱爲新樂府，這是白居易有意創作的樂府新體詩，一共寫了五十首。這五十首新樂府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鉅製。

我們拿「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來分析一下。這六十首詩的內容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這些詩的題材大多是詩人親身所遇所感。這六十首詩是詩人有計劃有組織地揭露當時政治的黑暗。每一首詩是中唐現實社會的一幅解剖圖。他用律動的樂府調子，對統治者控訴人民所遭遇到的悲慘命運。他猛烈地攻擊橫征暴斂的貪污官吏。當時國家稅收制度的混亂，達到極頂。舊稅法已不能再行。德宗命令宰相楊炎改用兩稅法。這兩稅法每年分兩次收稅，祇顧政府需要，不顧人民是否能負擔。兩稅外，許多苛捐雜稅仍舊存在。實際上人民的負擔要比以前增加了三倍。白居易寫了「重賦」一詩，又叫「無名稅」，赤裸裸地寫出農民怎樣受到政府超額的剝削。他用一個受苦的農民自己的口氣說：

織絹未成疋，纁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覓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風，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覩官庫門。糴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這是對於貪吏多麼尖銳的攻擊啊！新樂府中有名的「賣炭翁」，是描寫宦官欺凌人民和「宮市」的盜賊行爲。「折臂翁」寫一個老翁追述少年時因爲逃避兵役，用大石槌臂。老翁說：「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說得如此地沈痛！詩人暴露了黑暗統治，替人民向反動統治者控訴。

那時候政府的貪吏，也就是皇帝的奴才，他們明知連年災荒，禾麥旱死。然而故意不向上申報，反而加緊催徵，使得農民典桑賣地，交納官租。白居易痛罵這批無人心的貪吏說：「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這是農民只有咬緊牙關痛恨而無處訴說的話，而詩人替他們大聲疾呼地喊了出來。

對於朝廷的豪門和近臣權貴那種黑暗腐爛的生活，詩人同樣地用他那支鋒利的筆給予無盡的暴露和諷刺。「秦中吟」中有「輕肥」「歌舞」兩首短歌，寫出了封建統治者手下吸

血鬼似的官吏，怎樣輕裘肥馬，狂歌歡舞，過着荒淫無恥的寄生蟲生活；而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却比牛馬還不如。那時候江南久旱，而賦稅特別重，衢州（今浙江省地）竟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閩縣（今河南省地）獄中的囚犯——大多是欠租欠稅的勞動人民，多半凍死了，又有誰顧得！對於這些黑暗現象，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而白居易不但做詩來諷刺，還公開上疏抨擊了這種不合理的事實。人民需要他出來說話，再也顧不得那些握軍政大權者的切齒痛恨了。

新樂府中的「紅線毯」，諷刺宣州進貢朝廷的絲織地毯是勞民傷財的奢侈品。詩中說：「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繚綾」歌裏說：「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線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紅線毯和繚綾都是勞動人民辛勤創造的工藝品，勞動人民流着血汗創造成功了，却變作宮中任意「曳土踢泥無惜心」的奢侈品。詩人又憤憤不平地替老百姓說話了。

瞿秋白曾引近代偉大的政治思想家的話：「吃人經濟的存在，剝削的存在，永遠要產生反對這種制度的理想，在被剝削的羣衆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謂知識階層的個別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見「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白居易在一個被黑暗勢力統治着的封建社會

裏，他既出身於小官僚的家庭，也就使他努力擠進統治集團裏去。可是詩人與其他封建社會的文士不同，他要用他愛國愛民的熱情，驅使他創造出偉大的社會詩篇。這些詩篇真正爲人民做了勞苦的工作，反映了勞動人民真實生活與真實的歷史。這些詩篇才真正是詩人突破了自己的階級限制，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在封建時代的文學中光輝地表現了民主主義的進步傾向。

其次，白居易的諷諭詩在形式上的創造，也具備了一套完整的創作論。第一、這類詩是承繼了歷史的傳統。新樂府在體製上直接承襲了「詩經」三百篇的體例。總序說：「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篇之義也。」新樂府五十首有總序，是摹倣毛詩的大序，每首詩又有序，是相當於毛詩的小序。而每首詩都以首句當作題目，也是做「關雎」爲篇名的例。這是他在形式上找到了古典文學的傳統根據。第二、在寫作技巧上，他又找到了前輩大詩人杜甫。杜甫的社會詩的現實內容不但感動了白居易，而且杜甫的「即事命題」的樂府寫作技巧，如「兵車行」等，成爲新樂府具體的範本。「秦中吟」的「一吟悲一事」的寫作方法，直接模倣了杜甫的「三更」「三別」，是毫無疑問的。第三、創作新樂府的另一個源泉是吸取了當時的民間文學的優良成分。在新樂府總序裏說：「篇無定句，句無定字。」他採用比較自由的散文化的形式。我們隨手舉一些例子來看。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胡旋女」）  
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爲一身。君之不來兮爲萬人。（「驪宮高」）

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繡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盃盤冷。肉堆潭岸石，酒澆廟前  
艸。（「黑龍潭」）

他經常把三、五、七言的句法錯綜變化起來，既靈活自然，音節又諧和。大體上他是採用當時的民間歌謠俗曲的形式。白居易也喜歡做一些小曲子，如「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他在新樂府的創作實踐上，要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甫的社會新體樂府來改進當時的民間流行的歌謠。這是白居易創作新樂府的偉大成就。而從文學的社會效果看來，他把新樂府做到「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讓美妙的形式與音樂相結合，使文學發揮了更大的宣傳作用。

在封建社會的文學理論中很少有人能像白居易這樣提出了完整的創作論。

不過，他在諷諭詩之外還寫了許多「閑適詩」。閑適詩的內容是從自己的生活出發，說明老莊哲學在現實人生中的運用。「獨善其身」的要點就在能守住「窮」，對於現實才能知足。這些詩的內容赤裸裸地解剖了一個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矛盾思想的另一面。

這是階級條件對詩人的限制。

白居易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是一位產量最豐富的詩人——全集裏收了將近三千首詩。他用全生命做詩，愛惜自己的詩和詩的聲名有過於他的政治地位。他的詩可以稱爲「生活的詩」，他幾乎把詩當作第二生命。晚年把自己的詩集鈔寫了幾部，分放在佛寺裏，當作佛書雜傳一樣的流傳人間。古今來的文學家中再沒有像白居易這樣的看重自己的作品的詩人了。他忠實於詩歌藝術的創作，認真的做詩。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給廣大的人羣讀。他的詩歌勞動是屬於人民的寶貴的文學遺產。

##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二〇）

李易

陸放翁（游）是一位優秀的詩人。的確像他自己常在他的詩文裏所希望的一樣，他繼承了以屈原、杜甫爲首的優良的思想與藝術的傳統；並且在宋代現實基礎上，充實以新的內容。陸放翁從十二三歲起就會作詩，辛勤地作到八十五六歲，寫下了大量的詩篇。在現在保留下來的九千多首詩裏（這數目在我們能看到的詩人的作品中是最多的），有不少的詩充滿着可貴的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 and 情感。

陸放翁所處的時代——一一二五至一二二〇年，正是我們民族和人民遭受並積極抗拒金人無理侵略的年代。堅決反對民族侵略，積極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成爲了陸放翁詩的重要主題。

在南宋這時候，廣大的北中國的疆土淪於金人，千千萬萬的人民遭受到外族極其殘暴的統治與劫掠，生產力受了極大的破壞。陸放翁寫道：

……羣胡本無政，剽奪常自如，民窮訴蒼天，日夜思來蘇。……——「感興」之二

淪陷區人民不但掀起了多次壯烈的武裝起義，反對金人壓迫者，不但是消極地盼望着收復



失地的軍隊（「遺民忍死望恢復」），還積極地給南宋軍隊以各種的援助：

憶昨王師戍隴回，遺民日夜望行臺，不論夾道壘漿滿，洛筍河魴次第來。——「追憶征西幕中舊事」之三

這是多麼熱情的慰問和支援！

關輔遺民意可傷，蠟封三寸絹書黃，亦知虜法如秦酷，列聖恩深不忍忘。——同上之四

這又是如何英勇的行爲！冒着生命的危險把金人的秘密情報獻給南宋的軍隊。

在這種形勢下，要是南宋統治集團能够信賴人民，發動人民的力量；要是南宋執政者能够採納像陸放翁所始終主張的「救民之貧」，「節用裕民」，「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徵稅之事，宜覈大商」；能够「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以上見「上殿劄子」），並且把政治中心從偏安一隅的杭州移到南京以顯示收復中原的決心（見「上二府論都邑劄子」及「登賞心亭」）；要是南宋統治者能够實施這一聯串的開明政策和措施，那麼，收復失地並不是件不可能的事，誠然像陸放翁所指出的那樣，是「機會無時無」的。但南宋統治集團却不考慮這些。他們始終地基本上執行着那以「氣焰熏天」的「誤國」的秦檜（「追感往事」）爲代表的對侵略民族妥協投降的政策。而人民，是堅決地反對這種政策。在這個關乎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上，陸放翁堅持了民族的立場：

……漢家方和親，將軍濡陵老；何時詔下北擊胡，却起將軍遠征討。……——「山頭鹿」

現實的情形是：一面，淪陷地區人民倍受着外族的侵略與壓迫：「豺虎厭人肉」；一面，大批人民財富被南宋統治者奪來貢奉侵略者：「輦金輸虜庭」（「聞虜亂次前輩韻」）。這是多麼令人傷心和憤慨的事情！「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同上），我們的詩人說的一點也不錯，這真是我們民族最痛心的一樁事。

在這種妥協投降政策下，無數英武的男兒找不到為國家民族而戰鬥的機會：

……男兒墮地志四方，裹屍馬革固其常，生逢和親最可傷，歲輦金絮輸胡羌，報國欲死無戰場！

——「隴頭水」

陸放翁時常這樣哀嘆着：

……諸公尙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感憤」

數不清的有志之士——優秀的中華兒女們，包括無時無刻不想和侵略者作最尖銳鬥爭的陸放翁在內，都極可惋惜地被南宋封建統治集團的妥協投降政策所扼阻，而沒能及早達到驅逐侵略者的抱負和理想。

陸放翁於是提出了這樣嚴正的質問：

……向來酣鬥時，人情願少歇，及今數十秋，復謂須歲月，諸將爾何心，安坐望旌節！——「客從

## 城中來

情形原來是這樣的：「和戎詔下十五年……朱門沈沈按歌舞。」（「關山月」）封建統治集團並沒有認真的考慮到要和民族侵略者作堅強的鬥爭，對他們最重要的是歌舞玩樂吃喝享受。

與卑視和反對妥協投降同時，陸放翁時時想念着那些爲國家民族而戰鬥的英雄們：

……君不見昔時東都宗大尹，意感百萬虎與狼，疾危尙念起擊賊，大呼過河身已僵。——「感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羶實未聞，巨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書憤」

岳飛、宗澤、一切英勇抵抗侵略的將士們以及千百萬武裝起義抗敵的民族兒女們的不朽業績深深地印在我們人民心坎裏。陸放翁以優美的詩的語句表達了人民對自己的英雄的尊崇與慕愛。雖然，由於歷史的限制，陸放翁還沒能認識到人民自己是決定歷史的力量，還不免錯誤地把起義抗金的人民稱爲「虎」「狼」甚至「巨盜」，但他至少是承認了人民力量在抵抗金人侵略中所起的偉大的作用，這自然是和一切失敗投降主義者、一切死硬地誣蔑、敵視人民武裝力量的人的荒謬的論點大不相同的。

侵略者雖然暫時還沒有被驅逐，但這却不能絲毫損毀或動搖我們民族的高貴的自尊心與自信心。陸放翁時時所憶念着的「神禹」「神農」——無數的勞動人民所開拓和耕殖的

土地是天經地義的應該由我們來收復的。「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金錯刀行」）也就是表現了我們民族相信自己的高貴品質和英雄氣概的優美的詩的語言。陸放翁以他的獨特的藝術宣示了這麼一條莊嚴的定理：我們民族是不允許任何民族來侮辱或侵略的。

陸放翁在臨死前寫下一首悲憤的、沈痛的、但滿懷着樂觀希望的「示兒」詩：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實在可以說，我們的詩人在他臨終了的時候還頑強地唱出了我們民族衷心的憤恨和鬥爭的目標。又經過約百五十年的艱苦鬥爭，我們民族和人民勝利地實現了我們詩人的理想。外族侵略者——從金人到元人都被驅逐出去了。人民的力量——雖然不是什麼王師，使歷史轉進到另一個朝代。

在贊揚陸放翁愛祖國愛民族思想的時候，我們必須避免一種偏向，必須防止把他的思想歪曲為含有大民族主義或民族侵略主義的因素的偏向。他在好幾個地方申述着這樣的  
思想：

……不須絕漠追敗亡，亦勿分兵取河湟，但令中夏歌時康，千年萬年無餽糧。——「觀運糧圖」  
……盡誅非無名，不足煩戈鋌。還汝以舊職，牧羊遼海邊。——「長歌行」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陸放翁關於民族問題的理想和主張是相當準確而深刻地反映了

這個歷史的真實——我們中國人民是一貫地堅決反對民族侵略並又嚴正主張各民族和平共居的。

一個真正愛祖國、愛民族的詩人就不能不同時是一個愛人民的詩人。真正的愛國詩人不但反對民族間的侵略，並且還一定爲了揭穿勞動人民所受內部封建統治集團的剝削與壓迫而歌唱，爲了希圖減去與解除勞動人民的疾苦而歌唱。陸放翁就是這樣的詩人。

陸放翁一生都關懷着人民。他說：「少小遇喪亂，妄意憂元元。」（「感興」）「元元」就是指的被統治的人民。在他自己的不幸和災難中，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到他中年和老年，繼續不斷地受到統治者的壓迫和冷淡，過着「今年澈底貧」「一年貧一年」「蔬食……亦不足」（見「蔬食」及「山園雜賦」之三）的生活，他就更進一步地體味到勞動人民所受的災難，更深一層地理解了勞動人民所受的痛苦。（雖然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頭裏，似乎有點孤高超遠的作風，但他本質上還是熱愛人民的。）他反覆着這樣的句子：「惟有餘忠窮未替，尙餘一念在元元。」（「舟中作」）「一念在元元」——時時刻刻記着老百姓，這是他最真誠的自白。

我們現在聽聽我們的詩人告訴我們，他所關懷着的人民——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在

他的時代是怎樣生活着呢？

……布穀布穀天未明，架犁架犁人起耕。——「禽聲」

吳農耕澤澤，吳牛耳溼溼。農功何崇崇，農事常汲汲；冬休築陂防，丁壯皆雲集；春耕人在野，農具已山立，房櫓鳴機杼，煙雨暗蓑笠。……——「農家」

有山皆種麥，有水皆種秫，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農家歎」

陸

這是多麼辛勤偉大的動人的勞動場面。但是，結果呢？

魚陂車水人竭作，麥壩翻泥牛盡力，碓舂玉粒恰輸租，籃挈黃雞還作債。歸來糠粃常不饜，終歲辛勤亦何得？……——「記老農語」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生產者不能享受生產的物品？為什麼勞動者得不到勞動的果實？

陸放翁給了個很明確的回答：

……有司或苛取，兼併亦豪奪，正如橫江網，一舉孰能脫！……——「書歎」

這不是一針見血的詩句嗎？多麼精煉明豁逼人的形象——地主、豪紳、官僚、封建統治主們不是真真實實地織成了一面剝削勞動人民壓迫勞動人民的天羅地網嗎？全部封建社會的秘密都在這裏了。

再看統治者是用怎樣殘酷的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吧。

……常年徵科煩箠楚，縣家血涇庭前土。……—「秋賽」

……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榜，人孰不懼死，自計無由生。……—「農家歎」

……縣吏亭長如餓狼，婦女弔死兒童僵。……—「秋穫歌」

在另一個地方陸放翁更深刻地透視了這種令人憤慨的悲慘的現象：「凡嫁禍平人，誘罪僮奴者，皆有司爲之……貧者惟守田畝……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桎械被體者，皆貧民也。」（「上殿劄子」）

掠奪的結果使階級對立的情況更加顯然。統治階層只管驕奢淫樂，勞苦大眾無奈轉死溝壑。

……富商豪吏多厚積，宜其棄金如瓦礫，貧民妻子半菽食，一饑轉作溝中瘠。……—「僧廬」

……富豪役千奴，貧老無寸帛。……—「歲暮感懷以餘年諒無幾休日愴已迫爲韻」之十

……明朝雪惡凍復餓，兒啼頰皴翁噤臥，九重巍巍那得知，閣門催班百官賀。——「癸丑十一月下旬溫煥如春晦日忽大風作雪」

人民大眾的困苦災難還不止此：

入夏久不雨，旱勢已汲汲，……何由白水滿，但守青秧泣。……—「喜雨」

風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豈惟漲溝谿，勢已卷平陸。辛勤栽宿麥，所望明年熟，一飽正自難，五窮故相逐。南鄰更可念，布被多未贖，明朝甌復空，母子相持哭。——「十月二十八日夜風雨大作」

登場已嘆禾生耳，出戶仍愁泥沒膝，……父老相看出無策，攬涕頓頰號扮社。……——「紹熙辛亥九月四日雨後白龍挂西北方復雨三日作長句記之」

入春十日九日陰，積雪未解雨復霽，西家船漏湖水漲，東家驢病街泥深。去秋宿麥不入土，今年米貴如黃金。老嫗哭子那可聽，僵死不覆黔婁衾。……——「首春連陰」

而豪家還獨霸了勞動人民所修築的水利工程的利益，破壞了農業生產，加深了農民的災難，如像：

……水旱適繼作，斗米幾千錢。鏡湖決已久，造禍初非天，孰能求其故？遺跡猶隱然。……——

「鏡湖」

這明明是富豪們官吏們做的壞事，陸放翁嘆息道：

……甲申畏雨古亦然，湖之未廢常豐年。小人那知古來事，不怨豪家惟怨天！——「甲申雨」

還有，少地無地的窮苦農民們交不滿貪婪的官家和地主的租稅，迫於災難和飢餓，有的冒着極嚴厲的「保甲法」制裁的危險，逃亡而去：

……嘉穰連雲無水旱，齊民轉壑自酸辛，室廬封鐻多逋戶，市邑蕭條少醉人。……——「過鄰家」



北陌東阡有故墟，辛勤見汝苦營居，豪吞暗蝕皆逃去，關戶無人草滿廬。——「太息」之三

我們看一看，這是多麼鮮明、豐富、真切動人的詩篇。透過這些質樸而深刻的藝術的刻繪，活生生的宋代的社會情況就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彷彿真的看到：千千萬萬的被統治的農民從早上忙到天黑，再到深夜；隨後地主官僚們搶去了一切；掠奪的鞭子黏黏地露在農民的背上，滴滴打打流在地上的是鮮紅的血。那邊老農婦很悲哀地在哭着餓死的孩子，死人的身上光光地挺在一旁，連蓋屍體的一小塊布都沒有。而田地頭上的破屋子裏長滿了荒草，它們善良的主人又能跑到那裏去呢！——要說這樣的詩不但有着高度的思想與藝術的價值，而且有着深博的社會與歷史的價值，該不算過分吧。

陸放翁不但如此深刻地理解了農民的痛苦和剝削與被剝削對立的情況（像我們上面所述說的），他還有着他自己的理想和見解。當「政本在養民」（「書歎」），「救民之貧」（「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徵稅之事，宜覈大商」（我們上面已經講到），「所願在仕者，努力蘇元元」（「秋夜感遇十首」之二），這些善良的理想和願望（雖然他還不能設想到根本推倒統治階級）落空以後，他還幻想着回到「無甚貧富」差別的「三代」「井地」「古制」（見「歲暮感懷之十」及「兩廡」）去。自然，這只是不可能達到的幻想。但這却又一次地顯示給我們：陸放翁是厭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醜惡制度，並且時時抱着改善人民生活的理想，無時無刻的

不充滿着對於人民的關懷和熱愛。他的善意的願望和理想也透露出不少的人民的情感和思想。

總結起來，我們說陸放翁——這位愛祖國、愛民族、愛人民的詩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最傑出、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是很適當的吧。

一九五一年，三，于清華園

##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

陸容浚

公元一一二七年，由於趙宋王朝一貫的淫靡腐化和無能，對於北方金民族的南侵，一次次地妥協退讓，終於把當時的首都汴京淪陷了。以堂堂帝后之尊，也被擄北去，造成了「靖康之難」，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的屈辱，也給中國社會上帶來了長期的混亂。以康王趙構為首領的新統治王朝，雖然可以輾轉退避，最後才得建都臨安；但東起淮水西至大散關以北的廣大土地，完全淪在敵人手裏，千百萬的人民羣衆，在敵人的鐵蹄踐踏下，國破家亡，妻離子散，賦稅重，勞役苦，一天天過着數不清也說不完的淒慘的奴隸生活。我們偉大的詩人辛棄疾就是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社會裏成長起來的人物。他是山東濟南人，名棄疾，字幼安，號稼軒，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後於「靖康之難」十三年，即公元一一四〇年。

「靖康之難」，這個晴天的霹靂，對於趙宋王朝的統治階級，的確起了不少發聾震聵的作用。他們回憶北宋百多年來的享樂生活，目睹過去都市的富麗繁榮，一旦都被毀滅了，不禁也有些國破家亡之慟。可惜這些傷痛，只是一時的傷痛罷了，在敵人長期的蹂躪下，

傷痛不但沒有化爲力量；相反的，由於權奸和主和派的策劃陰謀，屈辱求和，甘心向敵人稱臣納貢。他們誇耀着「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康與之「瑞鶴仙」）。過去那些「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糜爛生活，早又舊夢重溫了。然而這只是社會的一方面。除了趙宋王朝出賣祖國的漢奸集團，和一般毫無民族意識的主和派在強敵壓境的期間，忍心沈迷在酣歌醉舞的淫侈生活中之外，儘管漢奸集團可以殘害或貶斥在朝的那些奮勇殺敵的民族英雄，促成和議，以便鞏固自己的地位；但廣大的人民羣衆，因爲國破家亡後的淒慘生活時時在煎熬着他們，北方各地抗敵禦侮的民氣却一直旺盛着，民族意識一天天地高漲。人民都鄙視金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各地紛紛組織起武裝——忠義人馬，採用了游擊戰術，隨時打擊敵人。山東海州等地的人馬，就是抵抗金人的游擊隊大本營。

宿遷人魏勝，起兵收復海州。「宋史」本傳說：「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塵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耿京在山東活動，他本來是濟南府的一個老百姓，怨恨金人征賦的騷擾，民不聊生，於是也揭竿而起，組織羣衆，抵抗金人。這個舉動是符合廣大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愛國要求的，因此羣起響應，立刻就組織起一支數十萬武裝的隊伍。「中興小紀」說：「先是京東忠義軍耿京等，以佔東平府，遣使來奏。己丑，以京爲天平軍節度，就加東平府，仍節制東京河北忠

義軍。」可見當時聲勢的浩大。

他們都是南宋的民族英雄，他們的部隊都成爲當時在金人重壓下北方人民的代表，也是淪陷區人民鬥爭力量與愛國意識的具體標幟。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金主亮發女真、契丹、奚三部正副兵二十四萬，中原漢兒（遼金稱漢人爲漢兒）及渤海兵十五萬，分二十七軍大舉伐宋。開始宋高宗還不敢言戰，金主亮遣使見他，當面厲聲侮辱，他只得逃到屏風後掩面哭泣。可是最後他也同意抗戰了，就在本年冬十月並發出詔書說：

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勦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陵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九三）

這固然由於當時主和派的首領奸賊秦檜早在五年前死了（死在紹興二十五年），主戰派稍稍抬頭，朝廷上下，敵愾同仇，有以促成他抗戰的決心；但這也正是反映了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是以「詔書未頒，歡聲四起」，足見人民是響應這樣的號召的。我們的詩人辛棄疾，就是在山東各地忠義人馬紛紛成立的時候，投進了以耿京爲首領的人民的行列中。

這時辛棄疾才二十二歲，他的家鄉是早已淪在敵人手中了。他的出身，本來是一個官家子弟。祖父辛贊，曾被封爲隴西郡開國男，父辛文郁，贈中散大夫。所以他很有機會同他少年時代的同學党懷英一樣，留在金人那裏作官，以文章顯於一時。「續通鑑」一五三

說：「金主好文學，嘗嘆文士無及党懷英者。」可是我們的詩人，在少年時代就受有優良的家庭教育，愛國意志很堅定，他不肯喪失自己的民族立場，甘聽敵人驅遣，作外族的奴隸。因此，他堅決地拋棄了自己的平靜生活，投身到極艱苦極危險的人民鬥爭的隊伍中，反抗敵人的侵略。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英勇行爲，同時也是他愛祖國愛民族的熱情的集中表現。

辛棄疾的加入山東忠義人馬，並不是一件盲目的毫無理想的英雄浪漫行爲。他在「美芹十論」裏已有說明：

粵辛已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蠶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

原來他在參加耿京的忠義人馬以前，自己就聚有一部分二千多人的隊伍，豎起了抗敵的大旗。爲了「與圖恢復」的共同目的，他參加在耿京的部隊裏，自己爲掌書記。同樣的道理，我們便不難理解他參加了耿京的部隊後，爲什麼馬上勸耿京歸宋。「宋史」本傳說：「棄疾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足見耿京歸宋，就是他的主張。在「詳戰論」裏他指出山東的忠義人馬，爲什麼沒有很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忠義人馬都是農民，激於愛國熱誠，揭竿而起，但未經訓練，若不與正規軍（弓兵、黥卒）配合作戰，是不能持久的。第二，

忠義人馬起自田畝阡陌間，沒有統帥，互不相下，必須有國家軍隊加入領導，才能發揮力量。他相信朝廷是有領導力量的，要圖恢復，必須加強團結，由朝廷統一領導才行，所以他勸耿京歸宋。自然，他把希望完全寄託在當時的朝廷上，僅僅肯定了領導政權的重要，而沒有認識到人民就是決定歷史的方向和動力，還是容易落空的。

他在耿京的部隊裏，不僅是決定策劃，盡了他掌書記應盡的職務，他那富有正義精神的英勇故事，也是十分感動人的。義端是一個喜歡談兵的和尙，在民族意識日漸高漲的當兒，他也居然聚得千餘人馬。辛棄疾說服他隸屬在耿京部下，大家共同抗戰。不料義端陽奉陰違，一天晚上，他竟竊去印信，私自逃亡。當時耿京大怒，想殺棄疾。棄疾說：「句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他揣想義端一定是去投降敵人，報告這邊的虛實，於是他急急追獲了義端。義端當時還要求他說：「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也不理他，終於把他殺了。這樣英勇的行爲，更加取得了耿京的信任。還有一次，那就是擒斬叛賊張安國的事。紹興三十二年，耿京決計歸宋，使辛棄疾同賈瑞奉表渡江進見。宋高宗當即勞師建康，並授耿京爲天平軍節度使，耿京以下也都封了官。辛棄疾的「鷓鴣天」詞說：「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妮銀胡鞞，漢箭朝飛金僕姑……」就是他後來追述當年的事。那知剛在他們渡江北返的途中，耿京內部起了變亂，張安國等殺了

耿京投降金人。辛棄疾於是跑回海州，立刻糾集了一部分忠義人馬，殺奔金營。這時張安國正和金將酣飲，他當場就把張安國捉住，帶回朝廷殺了。洪邁是他同時代的人，記載這件事尤其動人，他說棄疾「赤手領五十騎縛取（安國）於五萬衆中，如挾鷄兔……壯聲英概，儒士爲之興起。」辛棄疾這時才是二十三歲的一個文人，而能作出這樣不平常的事，實在使人感動。他不但打擊了敵人，同時也增強了當時朝廷上下一般畏懦妥協的主和派的志氣。

## 二

辛棄疾二十三歲回到祖國的懷抱以後，宋高宗封他爲右承務郎，後任江陰簽判。他的官職雖小，但愛國熱情甚高。他不顧一切，曾把自己從實際鬥爭中帶來的人民的希望和鬥爭經驗，先後寫成了有名的「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疏」，「議練民兵守淮疏」，及「美芹十論」等論時局的文章。就當時敵我雙方情況，他作了一個很詳細的分析和精密的軍事估計；有政治家的風度，也有軍事家的氣概。雖然由於歷史條件和他的階級限制，他還不能清楚地指出人民自己的方向，他的理論還是建築在舊制度的基礎上。但在這些文章裏，他是貫穿着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中原可以收復，而且必須收復。他深信金人不足怕，和議不足



恃，堅持他的主戰論，反對過去像秦檜那樣的投降政策。

他在「審勢論」裏對於敵人的形勢，詳細地加以分析。他認為金人「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以必勝。」因此他提出了金人有「三不足慮」之說；而且他認為金人內部民怨沸騰，矛盾甚多，其勢必亡，打破了當時朝廷上下一般畏敵如虎的心理。接着他爲了要鼓勵朝廷上下的戰鬥意志和樹立勝利的信心，在「觀覺論」裏他又特別指出我方情形，恰與敵人相反，北方人民在敵人長期的蹂躪下，早已怨怒不安，「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可比。他說：

曩者習於治而不知兵，自亂離以來，心安於斬伐，而力閑於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爲之援，民心益堅矣。

當時他的朋友如陸游、朱熹、陳亮等，都和他是一致的主張：如果政府肯把首都從杭州遷到金陵，給人民表示抗戰的決心，人民就會羣起響應，收復中原絕對不是一件難事。在「自治論」裏，他提出同樣的論調，力闢當時主和派的人認為「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的謬論。他鼓勵宋孝宗「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直到後來他給虞允文上「九議」，還重複着說：「恢復之道，甚簡且易，不爲則已，爲之必成。」關鍵都在朝廷上，如果朝廷有決心，人民沒有問題，一定會響應政府的號召奮起抗戰。

最後，他在「詳戰論」裏，提出更爲具體的戰略來。

他的戰略，是充分備戰的理論，所謂「藏戰於守，未戰而常爲必戰之待」（「察情論」）。他認爲山東是一個重要據點，在「詳戰論」裏，他特別加以分析。大意說：「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他整個的戰略，主張由四川攻關隴，由襄陽攻洛陽，由淮西攻汴京，而集中兵力攻取戰略據點——山東。其餘幾路只用佯攻，對山東則用主力戰。因爲山東一則離河北近，二則地勢無險阻，三則敵人無重兵。若兵出流陽（在今宿遷東），直指山東，中原失地，必可依次收復。可惜像這樣有遠見的軍事戰略，結果是「以講和方定，議不行。」（「宋史」本傳）宋孝宗號稱英明之主，銳意恢復，但像這樣對於時局的寶貴言論，都不能採納，侈談恢復，有什麼用呢？

### 三

隆興二年（一一六四）宋金又一次的和議告成以後，南宋朝廷上作爲統治集團的一般士大夫階級，繼續安於小朝廷的局面，數十年間，主和派佔着絕對的優勢。辛棄疾雖稱「文墨議論，英偉磊落」，也不得不在現實的環境下低頭。他由江陰簽判，歷官至建康府通判、

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江西提點刑獄、京西轉運判官及湖北湖南轉運副使、湖南江西安撫使等職，給地方人民造過不少福利；但這些「碌碌錢穀」之事，那裏是他揚眉吐氣的機會。在這中間，他有一次被宋孝宗「召對延和殿」，他對虞允文上過「九議」，葉衡曾荐他「慷慨有大略」，也都無補於事，在當時那樣的環境裏，他是永遠不會被重用的。在一般主和派的壓力下，他幾乎連話都不敢說。他的朋友周孚大概是一個喜歡隨意發表言論的人，他就勸過周孚說：「且痛忍滅否。」在他四十歲時給宋孝宗的「論盜賊劄子」裏說的尤其明白：「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爲，殺身不顧……但臣生平則剛拙自信，年來不爲衆人所容，恐言未出口，而禍不旋踵。」抗敵禦侮收復失地的宏願，什麼時候才得實現？一腔忠憤，無處發洩，只有託諸歌詞，聊爲「陶寫之具」。這是他開始寫作的動機。我們看：

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水龍吟》）

倦客新豐，貂裘敝，征塵滿目。彈短鋏，青蛇三尺，浩歌誰續。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翻沈陸……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酬黃犢。甚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滿江紅》）

我們的詩人在建康府通判任時，唱出了這樣羈旅落拓英雄不遇的沈摯憤悶的調子。他覺

得沒有人能够瞭解他的心事：大好河山，半在敵人手中，自己空有報國之心，而無用武之地，怎能令人不興懷感慨呢！

國家的失地未復，民族的屈辱未伸，這幅沈痛的圖景，永遠烙印在他的記憶中。據「鶴林玉露」說：宋南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辛棄疾路過這裏時，撫今追昔，便哀傷地唱出了這樣的詞句：

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菩薩蠻）

雖然金人追的是隆祐太后個人，但在辛棄疾的時代，這是國家的恥辱呀！他「送張仲固帥興元」時，也有同樣的調子：

漢中開漢業，問此地，是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追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木蘭花慢）

好一個「西風塞馬空肥」，包括了多麼他對於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未能洗雪的遺憾啊！

他鼓勵祝賀着他的親友和兄弟及時奔走國事，立取功名：

擲地劉郎玉斗，掛帆西子扁舟。千古風流今在此，萬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陣子；爲范南伯壽）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這不僅是氣宇軒昂志行磊落的說話，也是愛祖國愛民族的熱情的自我流露。

辛棄疾同其他具有愛國思想的作家一樣，富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肯定宋金的和議決不足恃。淳熙七年（一一八〇），爲了實現他「藏戰於守」戰略的一致理論，他堅決地執行着朝廷所允許他的建議，創置了湖南的「飛虎營」。他招兵買馬，起蓋砦柵。因「經度費鉅萬計」，當時有很多人反對他，甚至「議者以聚斂聞」，朝廷下令教他停工，他都不理；繼續刻苦經營，終抵於成，爲當時「江上諸軍之冠」。這種偉大魄力和英勇精神，是他熱愛祖國的又一次行動的表現。

我們最覺得惋惜的是淳熙二年他執行着朝廷的命令，打平了所謂「茶寇賴文政」等起義的民兵。依然由於歷史和階級的限制，畢竟他還不能認清什麼是人民的方向和歷史的動力。他不但替統治階級打擊了人民的力量，同時他還歌頌着像他一樣打擊人民力量的同僚說：「破敵金城雷過耳，談兵玉帳冰生頰。」把人民又看成是敵人了。不過話雖如此，辛棄疾是有其內心矛盾的痛苦的。在打擊了賴文政等人民的力量之後，我們知道，他給宋孝宗會上過「論盜賊劄子」。他分析年來所以盜賊蠡起，「誅不勝誅」，無非是國家制度不

良，法令不行，以致養成一般「貪濁之吏，迫民爲盜」。他說：「民者國之根本，……今年勦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接着他建議朝廷先申勅各州縣「自今以始，洗心革面，皆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棄法度貪冒無厭者，使諸司各揚其職。」他反對辦理貪污事件「徒取小吏按舉，以應故事」。當然，他不可能想到如何從根本上剷除這個腐朽不堪的統治制度，但他是在表示極端不滿它的許多不合理的腐敗現象，不是很明顯的嗎？

## 四

辛棄疾從四十二歲起，直到宋寧宗開禧三年（一二〇七），六十八歲死於江西鉛山時，二十餘年間，曾經兩次被劾落職。第一次被台臣王蘭以「姦貪凶暴」論列落職。第二次五十五歲，被諫官黃艾以「殘酷貪饕，姦賊狼藉」論列落職。當然這些罪名，在一般主和派的壓力下，任意構陷是不難想像的，我們可以不必置辯。辛棄疾兩次落職，家居江西上饒和鉛山兩處，共十八年之久，這對於一個富有愛祖國愛民族思想的人，當是如何的寂寞啊！在這些時日裏，我們的作家時常提到陶淵明，他說：「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覺參差。」（「水龍吟」）又說：「陶縣令，是吾師。」（「最高樓」）他讚美陶淵明的詩：「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鷓鴣天」）在這種熱烈的傾倒下，他的作風，自然不能不受陶淵明一些影響。

例如：「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賀新郎」）又如：「自東籬搖落，問淵明歲晚，心賞何如。」（「漢宮春」）他的心情，寂寞而閒澹。但有時他又像憤世嫉俗，覺得「人無同處面如心」，總是好人少壞人多。他說：

至性由來稟太和，善人何少惡人多！君看瀉水着平地，正作方圓有幾何？（「偶作」）

總之，他的心情很複雜；但無論如何，他絕沒有消極下去。顧炎武說：「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日知錄」十三）這話是不太正確的。「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拄杖倚牆東。老境竟何似，只與少年同。」（「水調歌頭」）這是他的自白，他真的會消極下去嗎？他在「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一詞裏也說：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沈陸，幾會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雪奔走。綠野風烟，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水龍吟」）

關心國事，如此殷切；對於韓元吉寄予這樣大的希望，我們能說這是他的「淪落之感」嗎？他在落職家居的時期，「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空負他一片愛國的熱心，牢騷語誠然有之。但我們看他爲陳亮賦「破陣子」一詞說：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多麼壯闊的胸襟，熱烈的情感！雖然在他那時候，他只能把天下事看成是君王一家的事情，「可憐白髮生」，不過感慨言之罷了。他的「鷓鴣天」詞說：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這是同一的情調，也不是「淪落之感」。不但如此，辛棄疾晚年雖然時常提到陶淵明，在上饒家居時更以「稼軒」自號，生活也有些近似陶淵明，但他畢竟沒有陶淵明那樣自甘寂寞的平淡生活。他是一個「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人，他如何能够老死田園，一有機會，熱愛祖國民族的情感，便會迫他出來。對於客觀現實的「抑揚摧伏」或別人的「讒擯」與否，他都不理。他的朋友陳亮說他「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稼軒畫像贊」）。我們覺得這話是不錯的。我們看宋光宗起用他作福建提點刑獄兼管帥事時，他馬上奏「論經界鈔鹽」事，分析情況，說明利害；他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時，本傳說他：「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謗曰『備安庫』」，以至引起仇視他的人誣爲貪污。爲了這件事他還特地到朝廷上自己辯明一番。寧宗起用他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時，他上疏奏「州縣害農六事」、「罷省稅官」等，處處都能積極爲國家人民利益打算；同時，他對於抵抗北方金民族的



侵略，也沒有「一日忘懷」。宋寧宗嘉泰四年（一一一四），召他「言鹽法」，並討論起敵國的問題。他主張「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之計」（《宋史：韓侂胄傳》）。他絕不肯把自己的生命，讓光陰白白地帶走。可惜他的主張，又給一般主和派的人一個口實——誣他是韓侂胄一黨，「迎合開邊政策」。在他死後一年，倪思還把他彈劾了一下，爵秩是免了，從官卹典，也都被奪。其實以辛棄疾這樣熱衷於祖國民族的「一世之雄」，他會迎合嗎？《宋史》本傳說的好：「稼軒持論勁直，不爲迎合。」爲什麼獨會迎合韓侂胄呢？

是的，辛棄疾的年紀雖然漸老，但他志切恢復之望，却「愈老彌堅」，絕沒有「淪落之感」。嘉泰四年，他已六十五歲，讀「宋高宗親征詔草」時還說：「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初，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本傳）聲淚俱下，一片誠摯而熱烈的愛國情感，與壯年時代的辛棄疾有什麼兩樣？但我們認識辛棄疾僅停止在這一點上是不够的，他對於祖國民族的熱愛，早年是有一套具體計劃的，如上文談到的「美芹十論」等；直到晚年，依然有他熱愛祖國民族的具體行爲。他晚年經常以重資遣諜到金人那裏刺取動息，凡金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名」（程秘「丙子輪對劄子」）等等，都有詳細紀錄，「以備不時之需」。由此可見辛棄疾的爲人，他是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反抗外族的侵略的。可恨當時趙宋王朝的統治集團，「佞諛滿

前」，只知「苟求富貴」，那裏還有什麼國家民族的觀念，終於使辛棄疾「一生不得行其志」。話到這裏，真正教人痛心！

## 五

最後讓我們談談辛棄疾的作品。

他的作品，也同他一生在事業上的表現一樣，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造詣的作家，而主要的創作，是配合當時流行的「詞」。因為詞的句法長短不齊，與語言接近，抒情寫意，較之五七言詩更爲靈活便利；加以他有英勇的氣魄，愛國的熱情和豐富的生活。因此，他那河山之慟、故國之思和權奸當路之憤，就都能在他那圓熟流走的筆觸下，創造出許多沈着悲壯的燦爛篇章來。

從他詞的作風上看，當然他同蘇軾一樣，他們都打破了過去「詞爲豔科」和「詞以清切婉約爲宗」的限制；但蘇軾一派的詞，到了他才達到最高的成就。他和蘇軾比較，「宋四家詞論」裏有很好的評語：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調，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着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

這話是很正確的。他的詞現存六百多首，其中有許多首都是「激揚奮厲」的作品，可以鼓舞人的愛國熱情，如上面所引。就是那些和一般作者題材相同的詞，也寫得嫵媚清幽，遠過別人。

他在創作藝術上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寫景、敘事、說理、論政，都能各盡其妙，有深刻的感人力量。他能驅使通常各種散見的材料和字句，融化在他的作品中，而表現得生動真切，清新自然；沒有輕薄和生硬的痕跡，也沒有倚聲填詞限字限句的拘束。雖然有時不免「掉書袋」，用事太多，但也並不過分勉強。有時他用散文入句，也仍富有濃厚的詩意。

總之，辛棄疾的詞，無論內容或形式，都表示出了他的優越的創作才能。由於他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多樣的生活經驗，所以他的作品表現出了一種雄渾豪放的風格，由此也開拓了詞的境界，豐富了詞的生命。劉克莊說：「公所作，大聲鏗鞳，小聲鏗澗，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濃豔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辛稼軒集序」）我們覺得這不是過譽的話。他是南宋詞壇上傑出的領袖，也是我們文學史上偉大的作家之一。

# 關漢卿（二二四—一三〇七）

馮鍾芸

## 一 雜劇的產生

元雜劇是元代文學的代表，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新文體。這種新的文體是經了元代劇作家、演員的努力而豐富了的。

中國自北宋以來，城市經濟已相當發達。元代蒙古族打通了歐亞大陸，國際交通四通八達，中國商業資本空前發展，都市經濟更臻於繁榮。北方的大都是一個國際的商業都市。據「馬哥孛羅遊記」所載：

每日商旅及外僑往來者，難以計數。此間所用的珍奇寶貨爲世界其他城市所無，商品交易亦至繁多。……每日所到之絲何止千車，並製金絲呢絨及絲織品等……

在這一個商業繁榮的都市裏，官僚統治階級、外僑、商人以及都市市民閑暇時是一定要求娛樂的。過去簡單的說唱，以及各種雜技已不能滿足市民的要求了。他們沒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對於傳統的古典文學沒有興趣，他們要求一種通俗化、形象化的文學。戲劇正適合他們的需要。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他們把國內各民族的政治地位分爲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西域及歐洲各國的藩屬），（三）漢人（契丹、女真人及中國黃河流域的人），（四）南人（宋人）。又把人的社會地位分爲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儒者（書生）的社會地位竟在倡妓之下，僅高於乞丐，這是儒者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遭受過的卑視和「壓迫」。這些儒者的民族成分，不用說，自然是「漢族」了。在這種種族歧視下，也就減低了儒家的社會地位。儒與倡優的社會地位相近，自然也容易合作。

當時書會的組織普遍存在，書會是文人與倡優合作編製戲劇的一種組織，在南宋人的雜記裏，就有關於書會的記載。書會曾採取民間流行的故事傳說，用人民大眾所喜好的形式，編成戲劇演出，如無名氏作南戲「小屠孫」、「宦門子弟錯立身」、「張協狀元」，都題有某某書會編撰的字樣。到了元朝，因社會上大量的需要，內容更要求多樣化，書會成了戲劇改進所或是戲劇的編纂處。書會編纂新劇本以供劇場演出的需要。如元初雜劇作家馬致遠、關漢卿、蕭德祥、李時中等都與書會有關係，戲劇因文人的參加改革編撰而豐富了內容，雜劇也由純娛樂的性質而漸變爲完整的文學新形式。同時，這種新穎的創作更提高了觀衆的興趣，觀衆也要求更多的與內容更深入的劇本。這種相互推動的作用，也是促成戲

劇興盛的力量。

這種民間戲劇的形式後來竟傳入宮廷。明周憲王「元宮詞」裏說：

初調音律是關卿，伊尹扶湯雜劇呈，傳入禁垣宮裏悅，一時咸聽唱新聲。

楊維禎「元宮詞」中說：

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各路都叫唱此詞。

宮廷所好，也能影響到雜劇的發展。

## 二 雜劇的形式

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一百多年間是雜劇的黃金時代，雜劇的總數至少有五六百種。雜劇的產生，也和其他的文學的產生一樣，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兩個天才創造的，而是具有長期複雜的醞釀過程。是宋金近三百年間民間文藝的綜合，不管在內容上、形式上、以及樂曲上都是如此。元雜曲直接受宋官本雜劇、金院本、及諸宮調的影響，尤其是諸宮調的創作，加速了元雜劇的形成。間接受小說、話本、宋大曲、鼓子詞、賺詞、佛曲、以及宋之雜戲如傀儡戲、影戲、打三教、打訝鼓、隊舞等等的影響。元雜劇接受了前代豐富的遺產，又加以改造，才有了真正戲劇的規模。雜劇受諸宮調的刺激，改過去院本敘事體爲代

言體，純粹扮演故事而不再雜以其他與戲劇無關的戲謔（丑角偶有一二句），這是自覺的革命。

元劇的組成有「科」、「白」、「曲」三部分，「科」是動作，「白」是對話，「曲」是唱辭。它的結構的特點是：（一）劇有四折，外有楔子，楔子普通用於折首，作為序幕；也有放在兩折之間，相當今日劇中的過場，以補充四折之不足。（二）每折一調一韻。（三）全劇一人獨唱，由男主角或女主角擔任，其他演員入場只要說白而不唱曲（也偶有丑角唱幾句的）。（四）每劇終了，必有「題目」、「正名」，概括說明全劇大意。

### 三 關漢卿及其雜劇

元代雜劇最初以大都（北京）為中心，以後漸移至杭州。元劇初期出色的作家都是北方人，這些作家中以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為最重要。

關漢卿，號己齋叟，他的生平歷史都沒有詳細的記載。他大約生於金哀宗正太年間（一二二四），卒於元大德十一年（一二三〇七），活了八十四歲。與他同時的友人有王和卿、楊顯之、梁退之、費君祥等。王和卿按年齡說可能與關是忘年交（王死於中統初一二六〇），楊顯之與關漢卿是莫逆交。有人說關漢卿在金會仕「太醫院尹」，但從他生年至金亡

(一二三四)不過十年，十歲的孩子當然不可能做官。關漢卿也許在元初曾做過太醫院的小吏，不久即辭去。南宋亡後(一二七六)曾到過杭州(他的曲子中有「詠杭州景」)，以後或定居於杭州，晚年可能是職業的劇作家。

關漢卿的鄉里，在今河北安國，舊稱蒲縣，宋屬祁州，元屬中書省。中書省所屬，即可稱大都，故一般人總說關漢卿是大都人。

關漢卿不僅會編劇本而且通曉音律，長於歌唱，甚至是「躬踐排場，面敷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見明臧晉叔的「元曲選序」)的名票。劇本創作，不是個人在案上讀的，更重要的是舞台上演出效果好的劇本才算真好。因此曲有名家、有行家之別。名家可以出入樂府，文采爛然；行家必須理論與演出實踐密切結合，懂音律，懂舞台技術，劇本切合羣衆心理，重視演出效果。任訥說：

在文字之外，復身任聲容，成爲我家生活。可見曲之爲藝，果欲盡之，非兼事文聲容三端如漢卿者，不足爲第一流曲家。

明賈仲明「挽關漢卿詞」，稱他爲：

……梨園領袖，……雜劇班頭。

從前人對關漢卿的論述，我們知道關漢卿是一個「當行」的劇作家。



#### 四 關漢卿雜劇的特點

(甲) 劇情內容多樣化 關漢卿是戲壇的通才，他有極豐富的生活經驗，舞台經驗，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有歷史英雄人物的描寫如「單刀會」「西蜀夢」，有公案劇如「蝴蝶夢」「緝衣夢」「魯齋郎」等，有義俠劇如「救風塵」等，也有社會家庭的悲喜劇，喜劇如「拜月亭」「調風月」等，悲劇如「竇娥冤」。這些劇本，除了少數歷史劇外，都是取材於當時社會的。他有現實主義的作風，雖然他沒有，也不可能透過所描繪的現象而發掘出問題的本質。他熟悉城市灰色小人物的性格，他也同情他們那些可悲可喜的遭遇。關漢卿的社會地位被排在倡與丐之間，他的生活的接觸面也局限於此。正因為他靠近他們，才能了解他們，熟悉他們，同情他們。這些倡優「小人物」的遭遇，在異族封建統治之下，總是被欺侮、被損害的。「小人物」的不幸，也正由於統治者所造成的。關漢卿能忠實無保留地暴露，也等於反抗了統治者，雖然是不自覺的這樣做了。

(乙) 富有反抗精神 關漢卿敢於忠實的暴露社會現象，因此顯現出他的愛與憎，他是比較接近下層人民的作家，所以他寫出的劇中人物常帶有反抗精神。他固然也有妥協的一面，但在同時代的劇作家中，他是最積極的一位。他從各種角度暴露當時社會的陰暗

面，如「調風月」是弱女子對封建社會的控訴；「救風塵」暴露了市井流氓的無賴，與妓女可悲的命運。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暴露當時社會政治的黑暗的「竇娥冤」，真成人間的大悲劇。今天京戲的「六月雪」「金鎖記」，仍以關氏的「竇娥冤」為母題發展來的。直到現在還不失為暴露舊社會黑暗的好戲。

(丙)善於創造典型人物 關劇中所創造的主人公，除了極少數的英雄型人物外，多數是我們最常見的都市女性的典型。這些女子各有其不同的性格與遭遇：有肯犧牲自己的慈母如「蝴蝶夢」之王氏；有遠見有魄力，出智救友的俠妓如「救風塵」中的趙盼兒；美麗活潑、嬌憨任性的少女如「調風月」中的燕燕；負志不屈，含冤莫訴的烈女如「竇娥冤」中的竇娥。其他如聰明溫柔的謝天香，感情強烈的杜蕊娘，從容急智的譚記兒等。關漢卿能用各種不同的筆調表現主人翁的性格與身份。儘管題材是很通俗的，他都能把它寫得生動逼真，最不易寫得好的公案戲，在關漢卿的筆下，也變得生動活潑。我們今日讀來，仍覺深刻透澈。想像當年在劇場上，該怎樣動人了。

(丁)切合舞台需要 淺近通俗，是他在當時成功的條件之一。關漢卿文章自然樸素，他不孤立地注重詞藻文采的雕琢，他的劇本是為了舞台，為了觀眾，而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才華」。他的客觀現實主義的思想，使他忠實於戲劇的藝術。一些「文人」批評家，故意

貶低了他的創作地位，如朱權的「太和正音譜」說：「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這是文人在案頭脫離戲劇的實際而專論「文章」，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就當時戲劇界的地位與影響來說，關漢卿的雜劇是更富有生命力的，應是元初最重要的劇作家是毫無問題的。因為戲劇不是在案上讀的，而一定是要在舞台上扮演的，戲劇要求淺近通俗，當行出色，所以王國維稱他為：

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宋元戲曲史）  
並非過譽。

（戊）運用活的語言 元劇作家一般說來，都能運用新文學新語言，而運用活的語言最成功的，是關漢卿。劇中人物的「唱」「白」都能適合劇中人的身份。

## 五 作品舉例

關漢卿雖然也寫了些小令和套曲（小令四十首，套曲十一套，見任訥「元四家散曲」），但是他的主要力量放在戲劇的創作上。所作雜劇有六十七種。現存十七種，殘卷二種。我們現在只舉其中「救風塵」「調風月」「竇娥冤」三劇爲例，來認識關漢卿的貢獻所在。

（甲）「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救風塵」主角是智勇兼備的俠伎趙盼兒，她是個有遠見、

有魄力、心腸俠義而急智練達的漂亮女子。趙盼兒出身雖是不爲人所重視的妓女，但她有完整的人格，她看穿浮華子弟的行徑，憎恨市井流氓的卑鄙行爲，本劇寫她出智救友人宋行章於風塵之中的始末。劇中對於浮華子弟的虛脾、荒淫與無恥以及那種喜新厭舊、玩弄婦女的無賴性格暴露無遺，並對無知女子的崇尚虛榮，軟弱無能，作了有力的批判。關漢卿正面表揚了趙盼兒的行爲，並對宋行章寄予深厚的同情。這個劇本暴露商業都市裏最典型的社會問題。對流氓周舍的處罰是大快人心的。第一折趙盼兒勸宋行章的話：

（勝葫蘆）你道這子弟情腸甜似蜜，但娶到他家裏，多無半載週年相棄擲。早努牙突嘴，拳推脚踢，打的你哭哭啼啼。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了子弟，那做子弟的他影兒裏會虛脾，那做丈夫的太老實。……那厮雖穿着幾件蛇娘皮，人偷事曉得甚的。

這些說話異常透澈明白。劇中也表現了妓女的生活與心理的矛盾苦痛：

（油葫蘆）姻緣簿全憑我共你，誰不待揀個稱意的。他每都揀來揀去百千回，待嫁一個老實的，又怕盡世兒見難成對；待嫁一個聰俊的，又怕半路輕拋棄。遮莫向狗溺處藏，遮莫向牛屎裏堆，忽地便喫了一個合撲地，那時節睜着眼怨他誰。

從上面所引，我們可以看見關漢卿語言運用，是淺近通俗，具體形象化，是切合於劇中人的

身份的。「救風塵」全劇情節的佈置，故事的結構也很見作者細心經營。它是個充滿趣味的喜劇，但中間却蘊藏着妓女們精神上沈重的苦悶和悲哀。

(乙)「詐妮子調風月」「調風月」算是喜劇，喜劇的背後埋藏着被壓迫的婢女的悲哀。劇中主角燕燕，是個年青、活潑、嬌憨、任性的婢女，眼看着她的情人快和自己侍候的小姐訂婚，老夫人偏要她到小姐跟前說親。她真妒忌得發狂，巴不得這婚事不成，不料小姐却一口應允下來。到了小姐結婚的日子，燕燕還要為小姐上裝打扮，燕燕思前想後，十分苦痛。劇中寫她一邊咒罵，一邊調笑，一面却不能不奉命。這是如何矛盾的心境啊。關漢卿將這個滿心理怨咒罵的女孩子寫得真切活潑，個性刻劃得很明確。舊社會裏，我們看慣了「西廂記」裏紅娘式的婢女，却從不會看見像燕燕這個具有真實血肉與靈魂的少女。這種大胆的描寫，在封建社會裏是有其反抗意義的。燕燕是個婢女，她的階級地位限制了她的境中長大，而且也要這樣生活下去。

(拙魯連)終身無簾箕星，指雲中鴈做羹。時下且口口聲聲，戰戰兢兢，裊裊停停，坐坐行行。有一日孤孤另另，冷冷清清，咽咽哽哽，鬪着你個拖漢精。(尾)大剛來主人有福牙推勝，不似這調風月媒人背斤。說得他美甘甘枕頭兒上變成，閃得我薄設設被窩兒裏冷。

關漢卿寫這一婢子的反抗精神和倔強的個性是異常成功的。燕燕雖然是多重壓迫下的婢女，但她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全劇曲子完整，惜「賓」「白」存留較少。

(內)「感天動地竇娥冤」——「竇娥冤」是個社會悲劇。竇娥自幼失母，父親爲了進京應試無旅費，將她賣給蔡婆爲媳。不久丈夫死了，婆媳二人相依爲生。某日，蔡婆到盧醫家中討債，盧付不出，引她到郊外，想用繩子勒死她，恰爲惡漢張驢兒父子救起。張氏父子便藉此威脅蔡婆婆媳二人嫁張氏父子，並想霸佔她們的家產。竇娥執意不肯，張驢兒藉蔡婆臥病，向盧醫討了些毒藥，企圖藥死蔡婆，以便強逼竇娥。不料藥被他自己父親吃下，中毒身死。驢兒便告官誣賴竇娥。州官便問了毒死公公大逆不道的死罪。竇娥臨刑前對她婆婆說：

(鮑老兒)念竇娥伏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盃涼漿奠。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烈些紙錢，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卜兒哭科云)孩兒放心，這個老身都記得。天那，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煩煩惱惱，怨氣冲天，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時沒運，不明不闇，負屈銜冤。

(劊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後，時辰到了也！……(正旦唱)耍孩兒)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等他四下裏皆瞧見……

(二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繖；免着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寶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後，着這楚州亢旱三年。(監斬官云)打嘴！那有這等說話。(正旦唱)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爲東海曾經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寶娥死後，她的三願都應驗了。最後，寶娥把夢給她多年不見的父親——現任廉訪使，替她昭雪。

元劇中多喜劇和悲喜劇，像「寶娥冤」這樣真正的悲劇結構是不多見的。作者在這戲劇裏，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用深刻的同情，描劃出當時社會的陰暗，同時也攻擊了官吏政治的腐敗。在舊社會裏，善良的人民總是孤苦無援的。他們永遠在惡霸與貪官的爪牙下，或者活着受罪，或者含冤死去。社會上到處是這一類的問題，使人覺得平常，不值得寫。爲了迎合一般市民的趣味，很少有劇作家肯寫出這類不團圓的劇本的。客觀現實主義的關漢卿偏要正視這個「不團圓」的現實問題。用一枝沈痛的筆寫出寶娥的冤死。戲劇的最後一折，穿插了一些神鬼的情節，在善惡報應的傳統思想統治着人心的社會裏，在那官吏專

橫有口難言的時代裏，只能借鬼神的出現，才能給官吏以懲戒，給百姓以安慰。在這一方面來說，仍有其積極意義。

這些劇本中，曲辭都淺近如口語，對白純用口語，人物所說的詞兒及其語氣都適合於劇中的身份，不做作，也不鄙俗。

另外關漢卿的散曲，在元明散曲作家二百多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大胆的採用了民歌的形式來歌唱男女戀愛。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是生動清新的詩篇。但是這些成就，對於關漢卿的全部作品來說，不過只是大海中的小小漚波，我們不在這裏談它了。



## 孔尙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

范寧

二百多年前，詩人孔尙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生在山東曲阜縣城。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唸過書，講氣節，是貴族紳士型的人物，和一般貴族子弟一樣，企圖通過考選走上仕途。他在曲阜縣鄉下石門山中，「誅茅疊石，結廬其中有年」，整個青年時代在「青燈黃卷」中消逝了。不知道他出山趕過考沒有，是沒有考取還是不曾考。直到三十六歲的中年，至聖先師孔仲尼的合法繼承人孔毓圻，請他主修「家譜」和「闕里志」時，才離開石門山那條「鹿柴鶴徑」。

滿清統治者爲了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方面，迫使漢族不再想翻身，乃玩弄花樣，裝腔作勢，崇拜起封建社會裏的文化偶像孔子來。「康熙皇帝」親自跑到曲阜，焚香頂禮，欺世盜名，演了一幕可笑的戲。而孔毓圻呢，受寵若驚，不讓這位欲傳道統的孔尙任回山，留下叫他制禮作樂，準備接待這位「貴賓」。這回他被這位有所爲而來的「貴賓」看中了，吩咐手下奴才，說孔尙任書講得不錯，可以「不拘定例，額外試用」。這樣他走上仕途了。

本來，孔尙任在石門山裏唸書時候就有兩件心事。一件是要接受並發揚孔老聖人傳

下的「禮樂」，另一件是「會恨紅箋銜燕子」，要寫一部更能影響廣大羣衆、可歌可泣的悲劇「桃花扇」。前者是幻想提高散居在長白山黑龍江一帶地方女真部落，入關建立的新朝的文化；後者則是對於不能團結一致，抵抗侵略的弘光一朝君臣，作了沈痛的控訴。看來是兩件事，實在是彼此牽連着的。

一六八五年，抱了這兩個心事的孔尙任跑到北京，做了國子監博士。不久又跟孫在豐離開北京到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口，疏濬水道。因為當時這一帶發生水災，但官吏並不把人民生命財產放在心上。孔尙任初出茅廬，看不慣這一套，對這批「俗物」的作風，不滿意，有意見。他在「淮上有感」這首詩中說：

皇華亭下使臣舟，冠蓋逢迎羨壯遊。簫鼓欲沈淮市月，帆檣直蔽海門秋。九重圖畫籌難定，七邑耕桑戶未收！爲問瓊筵諸水部，金尊倒盡可消愁？

農民在火熱水深的死亡線上掙扎，而這批官吏成天飲酒取樂，真是氣壞了詩人，但是他只是一個詩人，他除開做詩外，就只有「拗斷吟鞭蒙被臥，今年不看吉開花」了。這時候，他「扁舟孤棹，暮海朝湖」，忙碌的工作着，親眼看到人民的飢餓和死亡，熱淚滿眶，心事重重。尤其是當他過往揚州時，想起當年野蠻的清兵在揚州連續十天慘無人道的屠殺；<sup>②</sup>想起當年死守危城的史可法，一位忠心耿耿的將軍形象，馬上湧向心頭。這明末遺恨，又一

次觸發了他寫作「桃花扇」的心願。他一定要把這位民族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

一六九〇年，他四十三歲時，才仍舊回到國子監工作。這時他似乎倦於爲吏了。他說：

重隨劍佩趨新步，乍入班行認舊僚。事事生疏資笑柄，向人難折病時腰。<sup>⑤</sup>

此後六年「冷曹博士」生活，使他深深感覺到實現「制禮作樂」的政治理想，不太可能了。漸漸他心裏明白了過來，明白了「康熙皇帝」的騙局。一天，他在國子博士廳上題了一首詩，表現十分消沈。那首詩是：

雀噪新槐吏散衙，十年氈破二毛加。不知城外春深淺，博士廳前老薺花。

眼巴巴的看着理想日漸落空。十年博士，只是「踏穿門巷」這個唯一的成就。他開始有點氣憤，說出了：

乾兒義子，都爲大僚；高人傑士，浮沈散曹。<sup>⑥</sup>

這回鬧情緒，「皇帝」知道了，雖然心裏不滿，可是爲了維持孔家店那塊紅招牌繼續欺世，所以並沒有加以處罰，而是相反的，對他作進一步地收買，把他提升了一級。因此調他做政府的監鑄官，參與財政金融部門工作。但這何曾是詩人的心願囉，只弄得他情緒更低落，精神更苦悶。他說：

官廚一飯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

這位一心一意要施行仁義道德的書生，現在却得到一個看守金銀財寶的職業，不僅是事與願違，實在是一個諷刺。真的，他這時的心境一如他的詩句所說：

孤燈照眼銷紅淚，涼雨當窗滴女蘿。

看到自己的懷抱不能實現，看到當時的北京，「王孫攬轡相逢處，只問豐台芍藥花」，這些王孫們，那個肯接受禮樂？他於是放棄制禮作樂的宏願，決心要把那一本構想已久的悲劇「桃花扇」寫出來。

「桃花扇」是一本描寫南明亡國慘痛的歌舞劇。全劇共四十齣（場），首叙金陵歌舞之盛，繼寫北京破滅（一六四四），臣民南逃，弘光（朱由崧）在金陵做起皇帝來。他的手下馬士英阮大鍼等人，作威作福，加上駐守各地將官，彼此又不和睦，所以等到清兵南侵，金陵很快的就淪陷了，叛將田雄背負弘光降了清兵（一六四五）。末以清人徵求隱逸作結。劇中人物，各具個性。但作者所表揚的只是李香君、史可法、張瑤星、蔡益所、藍瑛、卞玉京、丁繼之、柳敬亭和蘇崑生等幾個人物。而以李香君一生事跡，貫穿全劇。劇中對於「燕子箋」的作者奸臣阮大鍼，恨入骨髓，唾罵備至。作者在其劇作中將勇敢、勤勞與偷安、享樂兩種人物對照寫來，辨明忠奸，主題是十分明確的。

一七一〇年這個劇本第一次上演時，使得許多「故臣遺老」「掩袂獨坐」，甚至「唏噓而

散」。自然這是由於它的描寫深刻性所得到的結果。它不僅是把李香君這個人物，描寫得靈活生動，使這個女性的聲音笑貌，一舉一動，都活躍在紙上；而且通過女性的貞節表現了作者「胸中一段極大感慨」，在藝術上達到了極大的成功。作者在寫史可法「誓師」時說：

闌珊殘局，剩俺支撐。奈人心俱瓦崩，協力少良朋，同心無弟兄。都想逃生，漫不關情，這江山倒像設着筵席請。哭聲祖宗，哭聲百姓。

又借張道士之口說道：

阿叵！兩個痴蟲，你看君在那裏？家在那裏？父在那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

這唱詞，這道白，怎能不刺痛「故臣遺老」的心，尤其是像下面的對話：

〔副淨〕三位不知麼？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

〔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個老贊禮，那裏去得！

〔丑淨〕我兩個是說書唱曲的朋友，今做了漁翁樵子，益發不中了。

〔副淨〕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sup>⑤</sup>

這裏雖然無一語涉及清人，但表彰守節的妓女和清客，用之去羞愧那些「知書識禮」的士大夫，在文字獄的恐怖氛圍中，是具有反抗意義的。由於這樣強烈的政治性，他成功了，他勝利了，他使得單純的描寫你恩我愛的「燕子箋」為之減色。的確，「桃花扇」假如只是停留在

秦淮歌妓李香君和名士侯方域的愛戀上，是不會被譽爲「臨川笠翁，皆非敵手」的。重要的在通過這個故事，顯示了當時的社會風俗和尖銳的政治鬥爭。「徵求隱逸，乃朝廷盛典」，而我們的詩人，借「漁樵閒話」，作公開的譏諷，這是十分勇敢的行爲。雖然他對於錢謙益左夢庚之流，降敵事仇，沒有直接的貶謫，但他說過，他這個劇本是「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蓋兩三分」的。意在言外，在惡劣的環境之下，不得不含糊一點。

不過含糊也是有限度的，對於「三百年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歇於何地？」還是要清楚的指出來。對於「相公祇受錢，皇帝但吃酒」<sup>①</sup>，「笙歌裙屐」，「夜夜春情」<sup>②</sup>，「不報冤讐不掙家」的金粉南朝的腐化政治，還是如實的描繪出來。他愈暴露出弘光一朝人物的腐化和無能，他的心情就愈沈痛。

出現在詩人筆下的馬士英、阮大鍼、田雄，這批姦佞之徒的面貌是：

忝卿僚，填詞辨過，備供奉，談諧風雅。恨不能腮描粉墨，也情願懷抱琵琶，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顧，舞袖邊，受寸賞，御酒龍茶。三生饒倖，萬世榮華，這便是爲臣經濟，報主功闕。<sup>③</sup>

朝廷上，用逆臣，公然棄妃囚嗣君，報讐翻案紛紛，正士皆逃遁。尋冶容，教艷品，賣官爵，筆難盡。<sup>④</sup>

文官如此，再看武將如何？

一個眼睜睜同室操戈盾，一個怒冲冲平地起波濤，沒見陣上逞威風，早已窩裏相爭鬧。<sup>①</sup>

這樣一來，就弄得史可法「將難調，『賊』易討」的無限傷心。處在一個外族統治下的悲劇時代，寫前一代的悲劇，孔尙任十分沈痛的揭穿了南明的統治階級的內鬩和昏聩。但久蓄在心的愛憎，雖有一個發洩的機會，還是不能不加以抑制；不能够不「含糊」和「遮蓋」，不得不使柳敬亭的「漢書」，欲說還休；不得不使史可法的被殺變成沈江，「避免直接描述清兵的罪行」。<sup>②</sup>雖然，「殘山夢最真」，但環境只允許他講「私怨難消」，不讓他說「國仇未報」，只好把弘光時代一段悲劇的歷史譜成一本歷史的悲劇。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劇本的關係，他被迫棄職，回到石門山的老家。這點，我們從孔傳鐸一首「喜家東塘戶部歸」詩，說他「詞壇聲價與雲齊，名滿京華被謫宜」，得到一些消息。

但他也曾希望再出來工作過的。一七〇二年他同朋友張子鼎飲酒時，曾慨歎說，「換符門戶卑如舊，投刺冠裳冷似前」，「投刺」這種努力失敗了。此後他就「徧遊天下名山大川，詩興亦豪」，已經是：

薄酒堪嘗纔返魯，晚花可採莫思京。<sup>③</sup>  
不遊帝里投名刺，或臥江村把釣竿。<sup>④</sup>

重度着平淡的家居生活，不再想做官了。只是「年華浪耗初心悔，胸臆難行老面羞」。少年

抱負，已付諸流水。這時發現當年閉門讀書錯了，他後悔了，他說「何曾世事依書本」，老祖宗傳下來的一套法寶不中用了。但對於他的傑作中的女主角李香君，還存有希望，希望發現一個活着的李香君。在沈思、在驚疑、在尋覓：

馬踏街西一路塵，紛紛紅袖澆青春。老夫判斷烟花久，不信香君有後身。<sup>⑭</sup>

希望有香君這樣的人物出現，這完全是「崇尚氣節」的幼年教育的迴光反照。但由於他的階級出身的限制，看不到真實的人民力量，他對康熙存有幻想，因之也看不見真正的民族氣節；只是徒然的懷着「悔恨」和「希望」，以七十一歲的古稀之年，<sup>⑮</sup>離開了人間。

① 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卷三小傳云：「尙任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稱云亭山人。」

② 參看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③ 「長留集」：庚午二月自淮南還朝。

④ 「小忽雷平章薦士」（此劇多出其友顧天石手，然經孔氏審定無疑）。

⑤ 「桃花扇」：餘韻。

⑥ 「南明野史」。

⑦ 「桃花扇」：眠香。

⑧ 「桃花扇」：劫寶。

⑨ 「桃花扇」：選優。



⑩ 「桃花扇：爭位」。

⑪ 方震光校點「桃花扇」新序。

⑫ 「長留集：自壽」。

⑬ 「長留集：武昌幕府喜遇裘股玉稿多填詞」。

⑭ 「長留集：街西三絕劉生索賦」。

⑮ 「兗州府志續編」卷十六。

##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馬漢麟

## 一

明末清初，是黃梨洲所謂的「天崩地解」的動盪混亂的時代。晚明的政治腐朽和連年災荒，造成了農民普遍破產，因而激起了聲勢壯闊的席卷天下的農民大革命，推翻了大明王朝的反動黑暗統治。但是由於農民革命軍的政治短見，由於喪失民族立場的漢奸們甘心賣國與降敵，造成了滿清統治階級入主中國壓迫中國人民的機會。

我國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優秀的學者和詩人顧炎武就經歷了這個「天崩地解」的動盪的時代。他生於一六一三年，死於一六八二年，江蘇崑山人。祖父以上三代都是進士，做過明朝的大官，他本人在科場上並不得意，崇禎末參加過復社。初名絳，明亡以後改名炎武，字寧人，又曾名圭年，學者稱他為亭林先生。蔣山傭是他明亡後一度用過的化名。

顧炎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分析他的詩歌所反映的愛國思想之前，我們必須指出：由於歷史條件和階級立場的限制，他的愛國思想內容是有着相當程度的狹隘性的，他在

「日知錄」裏所說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的說法，在今天看來顯然並不正確，但在當時對於一般抱有狹隘忠君觀念的士大夫說來，是可以激發他們反抗滿清統治階級的同仇敵愾的。特別是他所倡導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理論，當民族矛盾特別尖銳的時候，很能號召廣大人民團結奮起爲反抗外來侵略而鬥爭。因此在顧炎武以後中國人民迭次的反侵略愛國運動中，這個口號一直是形成了極其廣泛的積極影響的。明清遞嬗，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民族矛盾，歷史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基於這樣的理解來看顧炎武的詩，那麼他的大量作品浸透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感情，仍然應該受到我們很高的評價和崇敬。

## 二

大明封建王朝的顛覆不是偶然的。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農民革命領袖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思宗朱由檢在煤山自殺，不過是這個封建王朝顛覆的集中表現。顧炎武看出了這個封建政權的黑暗腐朽，作爲亭林編年詩集的第一首「大行哀詩」已經指出：

世值頹風運，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碩鼠，馭將失飢鷹。

那時整個社會腐化貪污已經成爲風氣，「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顧炎武十分中肯地、十分深刻地剖析了這個腐朽政權必遭顛覆的根本原因。因此，當他在江南遙聞祖

國北方的壯麗河山被滿清的部隊佔領了的時候，他沈痛地唱道：

清蹕郊宮寂，春遊苑籞荒。陵邊屯牧馬，闕下駐賢王。紫塞連元菟，黃河界白羊。輿圖猶在眼，涕淚已霑裳。（「感事」）

他的悲憤正是當時南方人民一般的悲憤。差不多與滿清多爾袞進駐北京同時，晚明鳳陽總督馬士英和閣黨阮大鍼等擁立以昏淫出名的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形成「南明」小朝廷局面。馬阮一派邪人互相勾結，一面藉口籌措軍餉，大肆搜括民財，賣官開捐，不問人品；一面殺逐當時在朝的正人，那時兵部尚書史可法就是被排斥的一個。「明史」說史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兼味，夏不簟，冬不裘，寢不解衣」，一心想報國仇雪國恥。他在當時是頗能號召南方人民和滿清部隊戰鬥的，所以當他督師揚州，顧炎武就對這位民族英雄寄予了無窮的希望和熱烈的歌頌：

上宰承天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日氣生元甲，雲祥下赤幢。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

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六雙歸落雁，千里射蛟虯。河上三軍合，神京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

大將臨江日，中原望捷時。兩河通詔旨，三輔急王師。轉戰收銅馬，還兵飲月支，從軍無限樂，早

賦仲宣詩。（「感事」）

這是何等濃烈的樂觀主義精神！這是何等軒昂的英雄氣概！顧炎武就是透過這些優美的豪壯的詩篇，傳達了他對於自己的愛國英雄無比的信任尊崇與愛慕，自然也體現了顧炎武自己的偉大抱負。

和在江淮前線領導軍民向滿清部隊英勇戰鬥的史可法相反，馬士英阮大鍼在南京擅權內鬩，江北四鎮的悍將又驕橫跋扈，互相爭鬥，史可法雖有堅持抗戰的計劃與決心，可是「兵頓餉竭」，沒有支援。揚州破後，清兵在城內進行了殘酷的十日大屠殺，南京小朝廷也就跟隨着覆滅！南明政府崩潰以後，滿清佔領了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江浙淪陷區人民，包括顧炎武在內，爲了反對薙髮易服，爲了反對清官清兵的貪暴，掀起了頑強的反清愛國鬥爭，遭到了滿清統治者殘酷的血腥鎮壓。這些可歌可泣的堅苦壯烈的鬥爭事蹟是數不清也寫不完的！江陰、嘉定、崑山人民奮起反抗而遭到的屠殺與掠奪尤其慘烈！顧炎武和他的許多親友參加了這種光榮的鬥爭，經歷了這種恐怖的屠殺與野蠻的掠奪，而他僅以身免。後來顧炎武在「寄弟紓及友人江南」一詩裏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自昔構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坑，獨此一人活。

關於上述三縣人民英勇的反清愛國鬥爭，在顧炎武題名「秋山」的兩首詩裏有直接的反映：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徧岡巒。

這是何等劇烈的戰鬥場面！在敵我力量懸殊的對比下，漢族人民的反清愛國鬥爭遭到了嚴重的挫敗！城破之後，與恐怖的屠殺同時，滿清部隊進行了野蠻的掠奪：

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

但是，儘管城市淪陷，中國人民是不甘心向敵人妥協投降的，他們寧可被敵人殺頭，但是堅決不肯向敵人低頭：

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荆杞。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

這裏我們彷彿看見以侯峒齋、閻應元爲首的無數英雄的形象屹立在我們面前，他們光輝的英雄業蹟，永垂人間不朽！崑山淪陷，顧炎武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他的兩個弟弟也遭到屠殺。常熟淪陷，他的嗣母絕食殉難，遺言炎武：「無爲異國臣子！」顧炎武對於江南人民這種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是從這樣的高度來估計的——

楚人固焚樂，庶幾歆舊祀！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

是的！我們的祖先爲了爭取祖國的獨立自由和幸福，爲了這樣的壯麗事業，是寧願付出極大的代價的。這是何等磅礴的戰鬥氣魄！這是何等堅定的勝利信心！不可征服的中華民

族的百折不撓的戰鬥傳統；又一次在顧炎武的詩裏得到了深刻的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滿清統治勢力自一六四五年起達到了江南，但是與江浙人民奮起反抗滿清同時，江浙義士分別擁立了晚明宗室潞王、唐王、魯王，在東南沿海地區繼續進行了反清的鬥爭。顧炎武曾與這些反滿力量發生過密切的聯系。唐王在福建就曾遙授炎武以兵部職方主事，他的「延平使至」一詩也證實了他與這支抗滿力量的關係。他的若干首哭弔友人的詩篇，幾乎全是為直接間接參加這些鬥爭而殉難的烈士作控訴，他的若干首述懷性質的詩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鬥爭實際，體現了顧炎武自己的懷抱。可是這些反滿力量沒有能夠統一起來，團結起來，以致終於失敗。為此，顧炎武在題名「海上」的四首詩裏唱出了他的沈痛的感慨：

……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旛海上來。

……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

而顧炎武在「精衛」一詩裏所說的——

……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死。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則是他當時心情的真實描述。這樣的心情，變成了顧炎武此後一生堅持反清愛國鬥爭的

動力！

## 三

正因為顧炎武在江南和當時的反清力量有過密切的聯繫，並曾參加了一些實際的鬥爭，所以他的故鄉的無恥的怨家便想藉此陷害他，企圖從而消滅顧氏全族。他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詩裏說過「丈夫志四方」，現在既然「故鄉不可宿」，便該「飄然去其宇」，「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餓虎」。因此在「吳會間」「流轉」了幾年之後，「浩然思中原」了。這是因爲他覺得：第一「海內不乏賢」，希望遇些「異人」「力士」；其次他「願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像東漢馬援似的，在祖國的西北高原上蓄積力量，作開展政治活動的物質準備。所以他對於當時漢族人民反清愛國鬥爭的一時失敗是絲毫也不悲觀的。相反，他只有更加積極，更加堅定！「贈朱監紀四輔」詩說：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七日圍。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征衣！東京朱祐年猶少，莫向尊前歎式微！

這首詩裏含有多少痛心的回憶，但是含有更多的反清愛國鬥爭的勝利信心。是的，我們的詩人是不甘對敵人表示軟弱，對鬥爭表示消極的，你讀他的自白：



僕本吳趨士，雅志凌秋霜……戮力事神州，斯言固難忘，我寧爲桎囚？流涕空霧裳！（「王徵君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

意志是這樣堅定，感情是這樣強烈，鬥爭目標是這樣明確！「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惟有方寸心，不與元鬢變！」這就說明了顧炎武反清愛國鬥爭的堅持性！

然而單說顧炎武是個大節未淪的遺民那是不能概括顧炎武的全貌的。明末清初三個思想家王船山、黃梨洲、顧炎武都曾有過鮮明的民族思想，但是到了晚年，他們三家的行動便完全不同了：王船山隱居在湖南徭洞裏著書立說，黃梨洲根本不敢渡江，顧炎武和他們比較起來就顯得積極多了。他不但沒有進入徭洞，而且還橫渡大江來到了北方。和顧炎武結交二十五年的同學，同在崑山起兵反清的戰友，被人們視爲「歸奇顧怪」的歸莊，在顧炎武四十五歲的年代（一六五七）離家北上之前，寫了一篇序文爲他送行說：

……今且登陟名山大川，歷聘六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

江南戰友對於顧炎武這次渡江北上的企圖是估計很高的。從這一年起，直到他死亡（一六八二），在這二十五年當中，他「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與潘次耕」），就是這樣很少停息地在山東、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各省往來奔波，結識了一些明朝的遺民、退職的官吏

以及一些關係可以利用的地方官員，祕密地進行了一些反清愛國的鬥爭活動，具體的跡象在他的詩歌和文章裏當然很少直接的反映，但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一六八一）寫的「與蕝門當事書」裏說：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

因此，當我們讀到下面的動人的詩句：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顧此暮年心，尙未甘蹉跎。

便知道他——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

……尙冀異州賢，山川恣搜尋

的目的了。全祖望寫的「亭林先生神道表」裏說：「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言外之意是不難理解的。而他在這二十五年當中希望遇到的「異州賢」又都是些知名的反清愛國志士，徐夜、張爾岐、傅山、李顥、李因篤、孫奇逢、王宏撰、朱彝尊等都和炎武有過親密同志般的友誼，在顧炎武的詩文集裏有的是和他們酬唱的詩篇和往來的書札，試舉顧炎武和傅山唱和的詩篇爲例，傅山「晤言寧人先生還村途中歎息有詩」：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葉黃塵載五車。方外不爛新世界，眼中偏認舊年家。乍驚白羽丹楊策，徐領雕胡玉樹花。詩詠十朋江萬里，閑吾僖筆似枯槎。

蒼涼悲壯的調子唱出了一位遁跡黃冠的遺民的慨歎；顧炎武「又酬傅處士次韻」：

愁聽關塞偏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戶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啓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待得漢廷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

慷慨激昂的調子唱出了一位志在四方的戰士的信心。——的確的，垂老的顧炎武真是日暮還能行雨的蒼龍，春深還能開花的老樹。

#### 四

新的形勢來到了。

「三藩之亂」發生後，吳三桂的軍隊攻下了長沙，派遣部將王屏藩到陝西活動，陝西提督吳三桂的義子王輔臣舉兵響應，西北震動，動搖了滿清政府的統治。顧炎武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移家到西北來（一六七七年秋九月移居到陝西華山下王宏撰家）。「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一詩記載旅途行色說：

重尋荒徑一衝泥，谷口牆東路不迷。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淒淒。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蕊

初黃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顧炎武爲什麼選擇「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淒淒」的時候移家到陝西華山下來呢？仔細分析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一，他詩裏曾經說過：「竊聞關西士，自昔多風尚。」（「酬李處士因篤」）他認爲「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與三任書」）。人事上有較好的憑藉。第二，他覺得「華陰管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口，亦有建瓴之便」（同上）。地理上有很大的戰略價值。第三，當時西北的形勢還是動盪混亂的局面。在題名「河上作」的一詩裏反映當時兵荒馬亂的光景說：

……去年方門爭，掘壕守朝那。車騎如星流，衣裝兼囊駝，……嗟此河上軍，來往何時罷？今年暫寢兵，邏卒猶譏訶！手持一尺符，予錢方得過。……窺窬來攫人，遠路橫長蛇。

「三藩之亂」波及到陝西，滿清統治階級自然在鎮壓暴動中加強了對人民的壓榨，西北關中人民遭受到的塗炭是難以想像的，顧炎武在給他的外甥徐公肅的信裏說：「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蠻橫無道的軍隊就是這樣的壓榨人民，魚肉人民，驅使人民，而壓榨魚肉和驅使的結果是「強者鹿銜，弱者雉經」；或「闔門而聚哭投河」，或「併村而張旗抗

令」！或者死亡，或者反抗。當時社會混亂到難以設想的程度：

……寰區恣刀俎，飛走窮網羅，萬類不足飽，螻蟻其奈何？

這就是當時的現實情況！而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們的詩人是完全同情人民、關心人民的，他說：「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他替窮人控訴，爲窮人吶喊：

……行將朝白帝，一訴斯民罹。猿鳥旣長吟，窮人亦悲歌，歌止天聽回，勿厭辭煩多！

早先顧炎武在北方結識的同志孫奇峯曾經慨歎過：「世路荊榛」，而顧炎武則十分積極，十分堅強地說：

……華山有地堪作屋，相與結伴除荊榛。（「薊門送子德歸關中」）

他到華山下居家的企圖不是非常明顯嗎？但是他在陝西住了五年，他的偉大抱負畢竟未能實現，一六八二年陰曆正月在山西曲沃墜馬而死了。早在顧炎武渡江北上後，江南的舊友王仍曾經寫過這樣兩句詩：「有心嘗險阻，無路拔羶腥。」（「丁酉——一六五七——臘月八日在韭溪草堂奉懷寧人道兄聯句三十二韻」。案作者除王仍外，尙有歸祚明、戴笠、潘樾章）現在看起來這兩句詩對顧炎武說來真是意味深長的；儘管顧炎武在北方「客遊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而筋力強固，無減壯年」（潘稼堂「贈炎武六十壽序」）；儘管他曾經實踐了早年的志願「願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和李因篤等廿餘人在山西雁門之北、五

台之東「匄資墾荒」，作反清愛國鬥爭的經濟準備；儘管他曾經在山西和傅山合開過錢莊，創立了票號，流動金融，以便利於革命事業的進行（「章太炎文錄」續編卷六：「書顧亭林軼事」）。但是由於顧炎武及其同志受到歷史條件和階級立場的限制，停留在少數地主階級之間的反清愛國鬥爭是不可能有所開展的。何況有些和顧炎武來往頗密的士大夫還各有其程度不同的反動落後的一面。試舉兩個典型的例子：譬如顧炎武的族父顧咸正，一六四〇年（崇禎十三年）起做過陝北延安的推官，滿清入關以後，逃回江南。顧炎武本來打算和他同往福建投奔唐王的，後來顧咸正因松江提督吳兆勝起兵反清失敗，株連而被大漢奸洪承疇所殺。可是顧咸正在延安推官任內曾經血腥壓過當時陝北地區的農民起義，並曾在西安一度做了農民起義軍的俘虜。早年顧炎武對晚明的農民革命也是認識不清的，南明初亡，他在「贈顧推官咸正」一詩裏還恭維他的族父說：「當年關中陷，九野橫虹霓，……君持蘇生節，冒死決蒺藜。揮刀斬賊徒，一炬看燃臍。」顧咸正的這種反動罪行難道還值得歌頌嗎？這是多麼錯誤的思想！再說顧炎武後來在北方結識的反清同志，被顧炎武譽為「蕭然物外，自得天機」的傅山，明亡以後做了和尚，堅決不應康熙召試的博學宏儒科，不做清朝的官，全祖望寫的「陽曲傅先生事略」記述他的反清鬥爭的堅決性是非常動人的，但是遠在一六四三年（崇禎十六年）當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軍快打到太原時，他竟然幫助

封建統治階級撰擬了一些敵視農民革命軍的反動宣傳品，如詛咒李闖王說：「馬在門內難行走，明年又是弼馬溫」之類的韻語，企圖藉以組織落後羣衆反對農民革命的部隊。其他像被人稱爲二曲先生的關中大儒李顥，被顧炎武譽爲「好學不倦，篤於朋友」的王宏撰，他們的父親都曾經在明末領導或參加了反對農民革命的戰爭，而他們自己對於當前的現實又都不敢正視，採取逃避的立場。不但如此，據「顧炎武年譜」所載，李因篤、李顥、王宏撰還都和當時在陝西鎮壓響應「三藩之亂」的起義部隊「有功」的張勇有忘分交。這些例子不說明別的，只說明封建時代一般地主階級對待革命羣衆及其鬥爭的反動落後的態度。

顧炎武在北方所領導的反清愛國鬥爭局限於這樣的地主階級之間，試問怎麼可能獲得具體的成績呢？他的偉大抱負怎麼可能實現呢？晚年，我們的詩人顧炎武向留在南方的老友說：

……平生四海志，竟作終南老。（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  
這是不能不令人爲之深深惋惜的。

雖然顧炎武的反清愛國鬥爭實際上沒有見出什麼具體的成效，但是直到他的蓋棺之年，他始終是堅持了堅貞不渝的民族氣節的。

一六七八年康熙藉口纂修「明史」，特開博學宏儒科，企圖網羅海內名儒，籠絡人心，沖

淡民族矛盾，達到以漢人統治漢人的目的。當時顧炎武的同鄉葉訃菴、長洲韓慕廬都想推薦他應試。他聽到這消息，預先叫他在北京的學生代為拒絕說：「刀繩具在，毋速我死！」他寫給他學生潘耒的詩裏更明顯地說道：

……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棱。孤跡似鴻冥，心尙防弋繒。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爲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

這是多麼堅決的抗拒！顧炎武老而彌堅，他終於勝利了，他是爲這個勝利感到幸運更感到驕傲的：

……年老更迂疏，制行復剛褊！

……幸得比申屠，超然竟獨免。（「春雨」）

他把自己比作東漢時不願接受統治階級的徵聘從而取得可鄙的富貴的申屠蟠，的確，在當時滿清王朝的威脅利誘之下，要想拒絕薦試，若沒有足夠的反抗決心是難免不「下海」的。試看「鶴徵錄」所列的錄取五十位名儒中，就包括了顧炎武在北方結識的同志李因篤、朱彝尊和他的得意門生潘耒，顧炎武怎麼不爲他的「超然獨免」感到幸運感到驕傲呢？常熟吳龍錫寫了如下的一首詩歌頌顧炎武說：

終南山下草連天，種放猶慚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顧圭年。



是的，無論和歷史人物宋朝的種放比較起來，或者和並時諸賢李因篤等比較起來，顧炎武對於這樣的歌頌是當之而無愧的。第二年（一六七九）葉訥菴做明史館總裁，又想招炎武入局，他同樣表示了嚴厲的斥拒。在給葉訥菴的信裏再一次表示了他不出仕的決心：「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事實上遠在八九年前當他在德州時（一六七〇）就曾經表示過這樣的態度：

……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俟來哲。（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

現在他以無比堅決的反抗精神完成了他的晚節！在他死前的兩年（一六八〇）他的元配王氏死於崑山故里，顧炎武在陝西華陰寫了五首悼亡詩，末首說：

貞姑蠶馬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他始終是實踐了他嗣母的遺訓：「無爲異國臣子」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對那些可恥的漢奸表示了強烈的憎恨。顯而易見：滿清統治階級入關以後，其所以能够維持他的政權統治是與從多爾袞起掌握利用漢奸政策，大量收買漢族士大夫，實行以漢人統治漢人的毒辣手段分不開的。顧炎武對於那些出賣人民利益，向新的統治者妥協投降的大漢奸自然會有無比的憤恨：

……葡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生女須教出塞妝，生男要學鮮卑語。（葡門送子德歸關中）

尖刻辛辣的筆觸揭露了當時北京的一般在朝漢奸向滿清統治階級奴顏婢膝奉迎獻媚卑鄙無恥的醜態。在另一首詩裏作者有感於明末的叛官降將倒到滿清方面去的非常之多，因而沈痛地呼號道：

……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井中心史歌）

鄭所南是南宋的遺臣，蒲（壽庚）黃（萬石）是叛降到元朝去的南宋官吏，原詩開頭有這樣兩句：「有宋遺民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顧炎武說：如果鄭所南看到明末清初似蒲黃的漢奸較之南宋末尤多，不知道他該如何痛哭呢？——顧炎武正是明末清初的鄭所南。

## 五

無庸諱言，歷史和階級的限制決定了顧炎武的反清愛國鬥爭只能是爲了一姓王朝大明帝國的恢復，但是，必須知道：他雖然眷戀着這個封建王朝，他對於這個封建政權的腐朽仍然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的。一部著名的「日知錄」就有不少的篇幅記載了他對晚明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必需改造的具體意見。這是他的矛盾。也正因爲這個矛盾，顧

炎武才不是「愚忠」的「不貳之臣」，顧炎武的創作和著述才顯得具有相當鮮明的人民性。

已經是明亡以後八年，一六五二年他旅行到蘇北淮上的王家營——這是三百年前從江南到北京的交通孔道——向着遙遠的北京，他想到：

……燕中舊日都，風景猶自好？

但是他更想到晚明封建統治集團奢侈糜爛的生活，他們——

……衣殘荇上繒，米爛東吳稻。

對於晚明賣官鬻爵貪污腐化的政治尤為深切痛恨。「與友人論門人書」說：「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當時人民的諺語：「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廢起十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豫變紀畧」）兩者都同樣真實地反映了晚明「朝政濁亂，貨賂公行」的情況。顧炎武在同一首詩裏接着說：

公卿不難致，所患無金寶。（「王家營」）

這不是對晚明封建腐朽政權的深刻諷刺嗎？同年他旅行到清江浦（淮陰），看到黃河改道後所造成的災難：

……黃流侵內地，清口失新渠。……蒼生稀土著，赤地少耰鋤。

農民流亡，耕地荒蕪，構成了一幅淒慘的農村破產圖景。河決之後，封建腐敗的政府

不但沒有很好的善後措施，相反，「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顧炎武曾經指出明朝的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天啓以前，無人不利用於河決者，侵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河渠」條）水災的結果自然是——

米麥江淮貴。

而這種相沿成風的利用水災從上而下的集體貪污，其結果必然是——

金銀帑藏虛（「清江浦」）

了。但是明朝歷史上封建集團中也有個別的賢明官吏注意到農田水利，關心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的，例如一六〇四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常熟縣官耿橘講求水利就取得了成績，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作爲他的治水經驗總結的「水利全書」，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采之頗備。爲此，顧炎武曾經寫了一首題名「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的詩歌頌他說：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勁。水利久不修，累歲煩雩禱。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

耿橘修治水利所得到的具體成績是：「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農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

的改善。但是顧炎武說：「頃二十年以來，淞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天下郡國利病書」）誠如這首詩裏所反映：「三季饒凶荒，庶徵頻隔并」，連年水旱不調，造成了嚴重的災荒。至於由災荒而造成的農民生活的貧困則是沒有人去關心的——

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

面對着農民現實生活的困苦顧炎武是有所感憤的。因此在「日知錄」裏一方面他揭發了晚明官吏和地主對於農民的殘酷剝削（見「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條），一方面也正面地提出了均田和墾田的主張（見「治地」「後魏田制」「開墾荒地」三條），在這首詩裏他說：

……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

這是他對改良農民生活的意見。而他自己——

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賦漕徧中原，粒食詒百姓。

像宋朝勸民墾田的陳靖一樣，作個勸農官到各地巡行，獎勵農民開墾田地，增加生產，改善生活。這種均田墾田的主張當然不可能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也就不能根本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生活問題，它只說明了顧炎武看到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並由此出發的一種企圖緩和矛盾的「改良」觀點。

顧炎武理想的農村社會的圖景是：

……豈知太平之世，飴甘茶，川流不盈，澤得漑。風雨時順，通祈粵，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濟濟，郊壇趨，歲輸百萬供神都。江頭擔酒肴，江上吹笙竽。吏無敲扑，民無逋！

但是這個理想的農村社會的圖景在顧炎武的時代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五十九歲的顧炎武在風沙冰雪的北方流轉，他曾經寫了一首題名「雙雁」的詩，揭發了滿清封建統治集團對人民的貪污與剝削：

……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書札。上寫「召閔」詩，如彼泉池竭。下列周鼎文，食人象饕餮。書成重密緘，一字一泣血。傳之與貴人，相視莫敢發。所計一身肥，豈望天下活！

「召閔」是「詩經」裏的一首譏刺周幽王壓榨人民的怨恨詩，饕餮是古代銅器花文上常見的一種圖象，古人說「貪財曰饕，貪食曰餮」。這都是暴露統治階級貪污剝削的象徵說法。「所計一身肥，豈望天下活！」真是一針見血地揭穿了滿清封建統治集團的醜惡本質。這是「神聖的憎惡」，這是「諷刺的鋒芒」！同年顧炎武又寫了題名「夏日」的兩首詩，其中一首說：

首夏多恆風，塵蠹蔽昏旦。舞雩告山川，白紙催州縣。未省答天心，尙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歎。

嚴重的旱災，苛繁的捐稅，統治階級貪婪嚴峻的搜括與壓榨，人民煎熬在無底的痛苦裏。「未省答天心，尙望除民患」，我們的詩人爲了解除人民的苦難由衷地發出了這樣沈痛的歌唱。在陝西他拒絕了博學宏儒科的薦試和葉訥菴關於纂修「明史」的招聘之後，一六七九年冬天寫了一首題名「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的詩，一方面對於漢時桓寬所寫的「鹽鐵論」作了如下的評論：

……桓生書一編，恢卓有深旨。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

一方面聯系到他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他看見滿清封建統治階級在一般地區向人民橫征暴斂非常嚴重，而西北人民所受的高利貸剝削尤其殘酷，他不得不控訴說：

矧乃衰亂仍，征斂橫無紀！

而當時作爲滿清最高統治者的爪牙，一般在朝的無恥宦紳，只圖自己的利祿享受，不管人民的死活，因此顧炎武痛詈道：

太息向朝紳，食粟斯已矣！

他曾經以無比憤慨的心情寫了一封給薊門當事的信，爲廣大人民呼籲：「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

間省倍蓰之出……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價米四石。此尙能支持歲月乎？」我們的詩人就是如此熱情地寄予勞動人民以深厚的同情，爲勞動人民發出了正義的呼聲的！

## 六

晚明的腐朽表現在政治上也表現在學風文風上。顧炎武在「與友人論門人書」裏說：「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那時一般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空談所謂明心見性的理學，顧炎武對於這種空談理學的腐朽頹廢的學風，採取了堅決反對的態度。「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下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



「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並指出這種腐朽頹廢的學風所造成的嚴重影響：「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一六七〇年顧炎武有感於此，在北方寫了三首「述古」詩，其中有幾句說：

後代尙清談，土苴斥鄒魯，哆口言性道，捫籥同矇瞽。

就是針對這種腐朽頹廢、空洞粗疏、澈底唯心主義的、不能聯系實際的晚明理學而作的極其概括而又極其尖銳的批評。和這種學風相反，顧炎武自己則開創了比較重視歷史現實的有清一代的樸學風氣。在垂老的二十五年的實際鍛鍊中，和反清愛國的實際活動相結合，對於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歷史、地理、農林、水利等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與研究，並據以寫成專著。他自己在詩裏曾說：

絕塞飄零苦著書。

又說：

放跡江湖間，猶思理墳典。

全祖望寫的「亭林先生神道表」記述他的著述生活說：「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亡，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

之。」

……空山羸馬西風路，竹笈雙駝萬卷書。

史可程在太原晤到的顧炎武就是這種樣子。鄧實寫的「明末四先生學說」一文中也說顧炎武「周覽郡國，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莫不究其利弊，論其得失」。想像他的有名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陸續寫成的。但是他不是爲著述而著述，爲學問而學問，誠如黃汝成所說，他是「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的（「日知錄集釋序」），他的著述正是爲了「經世」「資治」。黃師正送給顧炎武的詩裏有如下的兩句：

山經水志關王略，豈爲窮愁始著書。

也說明了顧炎武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他撰述他的研究心得真是從調查研究中來而又希望回到實踐中去的。

## 七

除開熱中科舉追求利祿的人不說，與顧炎武同時的一般知識分子呈現着兩種特殊的現象：一種是好談理學的人襲取陳獻章王陽明的牙慧，寫些空疏的語錄；一種是其中小有

才華的人還歡喜做些歪詩。而當時詩與語錄其量之多，其質之劣，又都是難以想像的。顧炎武說：「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這便是當時知識界所表現的一般文風。

從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來考察，顧炎武的時代顯然不是以傳統的詩歌爲主流的時代，可是這並不妨礙顧炎武之爲當時的獨特詩人。沈德潛周準合選的「明詩別裁」說：「寧人肆力於學，自天文地理古今治亂之迹以及金石銘碣音韻字畫，無不窮極根柢，韻語其餘事也。然詞必已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他在詩文創作上既不像明朝的前後七子專門從事擬古，以爲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相反，他是根本反對摹擬和求古的。「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擬，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錄：文人摹倣之病」條）這是因爲他覺得：「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習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日知錄：詩體代降」條）這種科學的文學發展觀點和帶有創造性的反對摹擬的寫作方法，是受了比顧炎武稍前的以袁宏道爲首的公安派的文學理論的一定的影響。但是顧炎武決不是標榜獨抒性靈、頹廢色彩非常濃厚的公安派詩人。從文學創作的目的性來說，

他與公安派有着原則的分歧：晉朝的葛洪認爲「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顧炎武同意這種對於詩歌的看法；唐朝的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爲時而作，歌詩合爲事而作」，顧炎武認爲「可謂知立言之旨」（見「日知錄：作詩之旨」條）。——這是真實的，如果我們從顧炎武的全部作品來考察，就會知道他是繼承了杜甫、白居易、陸放翁等偉大詩人優良的現實主義傳統的！現存的顧詩雖然只有四百首左右，但是一般說來，這些作品的題材是現實的，主題思想是嚴肅的。統治階級的腐朽，滿清的入侵，人民的苦難，變成了他詩歌創作的的主要源泉。他作品裏也有若干首歌詠歷史人物山川形勝的詩篇，透過這些詩篇我們覺察到的不是作者庸俗的自我陶醉，而是偉大的戰鬥胸襟。顧炎武所處的時代是「天崩地解」的動盪的時代，面對着那個痛苦的現實，我們的詩人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反清愛國的立場寫下了許多優秀的帶有戰鬥意義的作品。從這些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顧炎武的歷史，更可以看到十七世紀中國的歷史。

大致說來，顧炎武的詩歌古體遠比近體多，五古遠比七古多，無數的好詩又往往集中在古體方面。這是因爲中國傳統的詩體中近體的韻律的局限性太大，不大適宜表現積極的豐富的思想內容。由於當時現實的壓力，他在詩裏不得已運用了許多象徵性的典故與詞藻；但是更由於作者的學養淵博，他能够十分確當地安排了這些典故與詞藻，並賦予新

鮮生動的現實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關於寫詩的持律和用韻的意見，他認為「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日知錄：古人用韻無過十字」條），因此主張「詩以義為主，音從之，……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日知錄：詩有無韻之句」條）。「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毋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日知錄：次韻」條）這些由創作實踐而得來的精闢見解，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顧炎武的詩歌創作和學術著述都是中國人民的文化遺產，我們要批判地接受這份遺產。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

##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五）

王 瑤

—

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逐漸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運，同時也自然開始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一部近代史可以說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統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鬥爭史。這種鬥爭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戰線上，因此在晚清的許多文學作品裏，無論是詩文或小說，比之過去封建社會的文學來，就都帶有了顯明的不同的性質；而且在表現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雖然在今天看來，因為作者大部分還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裏所反映的中國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夠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帶有相當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但那本來是一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作者們受着更多的歷史條件的限制；那些文學形式上的「改革」自然也是失敗了，正像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能成功是一樣的。但從歷史的意義看來，不只那些作品的內容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仇恨以及要求中國進步的愛國精神，而且晚清的文學改良運動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證明了「此路不通」也正

是促使中國人民另外找真理的動力。由這些作品的閱讀，我們可以體會到在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過程中，中國人民是怎樣表現了他們的憤怒的反抗和高度的愛國熱忱的。

詩是過去文人表現自己情感最常用的文學形式，因此在知識分子中發生的影響也最大；當晚清一些落後文人正沈溺於模仿宋詩，形成所謂「同光體」的風氣時，另一型的「新派詩」也出現了；而且有许多人喜歡讀它，這就是黃遵憲的詩。他自稱他的詩是「新派詩」（見「酬曾重伯編修詩」），這不只是指他在語言文字上的某一程度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他寫了許多在傳統詩篇裏面所沒有的內容，而詩體的解放正是爲了要適應這些新的內容的表現。梁啓超稱他爲「詩史」，從他的詩裏的確是可以顯明地看出中國近代史的面貌，特別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經過和詩人自己的愛國精神的。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及「日本雜事詩」二卷。現在「人境廬詩草」中最早的詩是作於一八六五年，他十八歲的時候。那時正是太平天國革命剛剛失敗，帝國主義勢力加緊侵入的時候；廣東是接觸新思想比較早的地方，他十八歲時的詩中就說：「世儒誦詩書，往往矜爪嘴，昂頭道皇古，抵掌說平治。……古人豈我欺，今昔奈勢異，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感懷」）他認識了今昔勢異，不滿意當時一般士大夫的迂闊的論調，要求「知

今」和「閱世」；對於當時提倡考據和義理的漢學和宋學，他都認為於事無補；「區區漢宋學，烏足尊聖哲？畢生事鑽仰，所慮吾才竭。」（同上）尤其對當時的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試制度，更爲不滿。他說：

吁嗟制藝興，今亦五百載，世儒習其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虛榮逐冠蓋，勞勞數行中，鼎鼎百年內。束髮受書始，即已縛紐械，英雄盡入彀，帝王心始快。豈知流寇亂，翻出纓鋤輩。（「雜感」）

他比康有爲梁啓超的出生時代都早，寫這詩時他只有二十一歲（一八六八），但已經認識到統治者以制藝取士的用意和農民是推翻統治者的主要力量，不能不說是晚清孕育民主思想比較早的一人，因此他詩中的愛國思想和反帝情緒也就特別濃厚。譬如他到香港，就感到「虎穴人雄據」（「香港感懷」）；對於鴉片戰爭的結果，他認為「紛紛和戰都非策」，「聚鐵雖堅奈錯何」，而對當時抗敵死亡的關天培將軍，卻盛贊他的富有將略（「羊城感賦」）。寫英法聯軍入京燒圓明園，清廷訂立屈辱和約的詩說：「驪山烽火成焦土，牛耳牲盤捧載書」（「和鍾西耘庶常津門感懷詩」），對帝國主義的殘暴和滿清統治者的馴從也寄予了很深的憤慨。一八七五年寫的詩中他感到帝國主義者「今年問周鼎，明年索趙璧，恫疑與虛喝，悉索無不力」，而願「荷戈當一兵，吾亦從殺賊！」他「時時發狂疾，痛灑憂天淚」，覺得「到此法



不變，終難興英賢」（述懷再呈謁人樵野丈）；沈痛有力地表現了反帝愛國與民主革命的要求。同年英國翻譯官馬嘉禮在雲南被殺，滿清官吏藉此誣殺了很多夷族人民，所謂「馬嘉禮案」；他感到「惟誣化外人」，「國恥誠難雪」（大獄四首）。這時他二十八歲。

一八七六年清朝任何汝璋爲首任出使日本大臣，命他爲日使館參贊，偕同赴日。前兩年他就說：「平生攬轡澄清志，足跡殊難出里閭；萬一鉛刀堪小試，可容韞匱便藏諸？」（將應順天試仍用前韻呈謁人樵野丈）；據他弟弟黃遵庚說，何汝璋和黃家是世交，這次是他自己請求相從的（見錢萼孫撰「黃公度年譜」光緒二年下注）；從此就開始了他二十年的外交僚屬生涯。當時日本正是明治維新以後，國勢由衰轉盛，這對他思想上的影響很大。他盛贊日本的維新志士，說「有志之士，前仆後起，踵趾相接，視死如歸。死於刀鋸，死於囹圄，死於逃遁，死於牽連，死於刺殺者，蓋不可勝數。卒以成中興之業，維新之功，可謂盛矣。」（近世愛國志士歌序）後來他自己說這時他「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爲之一變，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新民叢報」壬寅「論學牋」）。於是探訪日本國情政治等，成「日本雜事詩」（七絕）二卷。又努力學習日文，發凡起例，草「日本國志」一書；後來戊戌政變前梁啓超作的「後叙」說：「以吾所讀『日本國志』者，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法之由，若入其閨闈而數其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數年前，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

而數計也。」當時國人還並不覺得日本的可畏，他書中已說「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後日本謀奪我琉球，他爲何汝璋致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請防彌，說琉球如亡，「不出數年，閩海先受其禍」（「錢譜」光緒五年下）。後日人滅琉球，他作「流求歌」，沈痛地寫出了琉球人民的痛苦。他看出日本接着一定還要侵略朝鮮，因此上書陳利害，主張「乘彼謀未定，先發制之」，但滿清廷議不採納（見梁啓超「嘉應黃先生墓志銘」）。他是很早就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的。

一八八二年他調爲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那時美國正醞釀排斥華工，梁啓超「嘉應黃先生墓志銘」說：「先生既以先事禦之之謀告其上而不用，乃盡其力所能及以爲捍衛。」據最近司徒美堂先生作的「我痛恨美帝」一書中說，他是中國歷來駐美外交官中唯一做過一些保護華僑工作的人。「清史稿」本傳記載一事說：「美吏嘗藉口衛生，逮華僑滿獄，遵憲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衛生顧右於僑居耶？美吏謝，遽釋之。」這當然並不能根本阻遏美帝虐待華僑的事實，他感到非常憤慨，在長詩「逐客篇」中說：

嗚呼民何辜，值此國運剝！軒頊五千年，到今國極弱。鬼域實難測，魑魅乃不若，豈謂人非人，竟作異類虐。……從此懸厲禁，多方設局鑰。不持入關襦，一來便受縛。但是黃面人，無罪亦箠掠！……倒傾四海水，此恥難洗濯！他邦互效尤，無地容飄泊。遠步想章亥，近功陋衛霍，茫茫

問禹跡，何時版圖廓？

詩中描寫了旅美僑胞的辛勤勞作的情形，但得到的卻是「但是黃面人，無罪亦箠掠」，能不令人感到「倒傾四海水，此恥難洗濯」嗎？在「紀事」一詩中他記載美國選舉總統時的情形說：「烏知舉總統，所見乃怪事。怒揮同室戈，憤爭傳國璽，大則釀禍亂，小亦成擊刺，尋常瓜蔓抄，逮捕徧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對美國政治所標榜的民主也給予了直感而深刻的揭發。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馮子材大破法軍於鎮南關外，他作「馮將軍歌」，對馮子材七十衰齡，猶能赤膊大刀獨當前陣的勇敢，唱出了熱烈的歌頌。詩中說：「何物島夷橫割地，更索黃金要歲幣，……得如將軍十數人，制挺能撻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另外又寫了長詩「越南篇」，對越南的終於淪敵寄託了很深的感喟。

一八九〇年他任駐英使館參贊，至倫敦。據他自己後來說，到英國後就感到中國的政體應該效法英國（「新民叢報」壬寅「論學賤」），在思想上又有了一點變化。這年作的「感事三首」中說：

堂堂大國稱支那，文物久冠亞細亞。……鄂羅英法聯翩起，四鄰逼處環相同，着鞭空讓他人先，臥榻一任旁側睡！古今事變奇到此，彼己不知寧勿恥？持被入直刺刺語不休，勸君一騁四方志。

詩中顯明地表示了愛國精神和民主革命的要求。次年由倫敦調任新嘉坡總領事，作長詩

「番客篇」，寫出了南洋華僑的辛苦勞作和愛國情緒；他們在外到處受人欺凌，回國又不得不到政府的保護，結果「番漢兩棄卻」；結尾說：

近來出洋衆，更如水赴壑。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腳。他人殖民地，日見版圖靡，華民三百萬，反爲叢毆雀。螟蛉不撫子，犬羊且無羈，比聞歐澳美，日將黃種虐。向來寄生民，注籍今各各。周官說保富，番地應設學。誰能招島民，回來就城郭！羣攜妻子歸，共唱太平樂。

我們今天所實行的僑務政策，可以說正是詩人多少年前夢想的光景的實現。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戰起，中國陸軍敗於平壤，海軍敗於大東溝。日本佔旅順，寇威海；海軍提督丁汝昌降敵，旋又自殺；最後訂立了屈辱的馬關條約。他對這次事件非常憤慨，有「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馬關紀事」、「臺灣行」、「度遼將軍歌」諸詩，都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忱和反帝精神，對滿清官吏的昏庸無能也給予了無情的譏刺。「悲平壤」說清將葉志超「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東溝行」說「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哀旅順」和「哭威海」中都形容了地勢是如何的天險，而竟然「一朝瓦解成劫灰」，「萬鈞礮，棄則那」。他感慨說：

噫吁戲！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螻屈，不得伸。……四援絕，莫能救；即能救，誰死守？礮未毀，人之咎。船幸存，付誰某？十重甲，顏何厚？

「降將軍歌」有力地譏刺了無恥的投敵將領丁汝昌，說他「有礮百尊槍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但一定要「乃爲生命求恩慈」。「度遼將軍歌」借着一顆「漢印」作線索，辛辣地嘲諷了一個愚昧怯弱、未戰而全師敗績的官僚吳大澂。在「馬關紀事」中他慨歎「括地難償債」，說「瓜分倘乘敵，更益後來憂」。而意義表現得最明顯有力的是歌詠臺灣人民抗日的「臺灣行」：

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既此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覩，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臺灣人民反帝的光榮傳統，也表現出詩人自己的熱烈的愛國精神。以後接着的是滿清政府紛紛割地賠款的屈辱外交，殖民地化的程度愈來愈深了，他在「書憤」一詩中說：「一自珠崖棄（膠州），紛紛各效尤。瓜分惟客聽，薪盡向予求。秦楚縱橫日，幽燕十六州。未聞南北海，處處扼咽喉！」此後他對滿清統治者的幻想就開始逐漸破滅了。但對中國的前途並不悲觀，他希望「弟兄同禦侮」（「馬關紀事」五），終有一日能够「馬蹄蹴踏西江水，相約扶桑濯足來」（「送文芸閣學士」）。

一八九六年他在上海識梁啟超，因捐錢辦「時務報」（旬刊），鼓吹君主立憲，這是中國

最早的雜誌。開頭數月他對一切事務都親自參加，曾對報社同人說：「吾輩辦此事，當作爲衆人之事，不可作爲一人之事，乃易有成。」（見梁啓超「創辦時務報原委記」）這年他曾代表南洋大臣劉坤一與日本領事珍田議商馬關條約中的蘇州杭州兩處租界事；他答應自營市政，與外旅方便，但堅決不允治外法權。事已成議，日本政府不滿，撤回珍田而直接與清廷交涉，結果仍然屈從了。次年他任湖南按察使，與陳寶箴等辦時務學堂，勵行「新政」，譚嗣同梁啓超等都去參加，有很多的改良設施。第二年戊戌政變起，幾被株連，此後就沒有再出仕了。「感事詩」說：「可憐時俊才無幾，瓜蔓抄來摘更稀」，就是詠戊戌死難諸人的。

庚子事變時他寫的關於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入侵的詩很多，如「誰人秉國竟養盜，坐引強敵侵畿疆」（「南漢修慧寺千佛塔歌」）等句，對滿清政權的幻想已差不多完全破滅了。但對英勇抗敵而犧牲的將領聶士成卻寫了「聶將軍歌」來歌詠他的壯烈事蹟；「敵軍方疑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對滿清統治者的昏庸誤國是極端憤慨的。辛丑和約訂後，他說「坐視陸沈誰任責」，又說「畢世難償債築臺」（「和議成雜感」），沈痛地寫出了他的不滿和悲憤。「入境廬詩草」中最後的詩是「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啓超）」，一九〇四年寫的。所謂「夢」實際是抒寫他的政治理想；其中說：「孰能張網羅，盡殺革命徒；汝輩主立憲，寧非愚復迂。」又說：

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懷刺久磨滅，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難俟。倘見德化成，願緩須臾死。

這時梁啓超遠在日本，而黃遵憲已經將君主立憲的思想完全否定了。同盟會成立於一九〇五年，當時國內革命運動正熾，他已經看到「無復容帝制」的趨向，可惜次年春他就因病逝世了。死前與弟書說：「生平懷抱，一事無成，惟古今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望矣。」（黃遵楷「入境廬詩草」跋）這和他以前所說的「窮途今何世，餘事且詩人」（「支離」）的意思是相合的，他的詩原是爲了要表達他的政治懷抱的。

## 二

隨着表現新的內容的要求，晚清曾有過一度所謂「詩界革命」的運動。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說：「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擷摭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曾佑），而復生（譚嗣同）亦綦嗜之。」這些詩中充滿了「新約」典故和翻譯名詞的字樣，結果自然是失敗了的。但在這個運動的三十年前，一八六八年黃公度就有過更徹底的主張（「雜感」詩），而且他是以創作實踐來堅持了四十年的，就是梁啓超他們也承認他的詩是最成功的新派詩。「雜感」詩中說：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他在「入境廬詩草」自序裏也說：「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主張「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因此他的詩相當散文化，持律不嚴，選韻尤其寬，異聲通押的例子很多。古詩寫得比近體好，尤其是五古。方言俗諺也不避諱，可以說是將傳統的詩體相當地解放了一些；而這種詩形的解放正是爲了要適應他所要表現的啓蒙的民主主義的內容的。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說：「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在沒有澈底打破舊詩的形式以前，要想鎔鑄新理想，是一定會有「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要求的。因此他的詩不只和「同光體」派的「鸚鵡名士」（梁啓超語）們根本不同，而且也不同於徒以運用新名詞爲貴的夏曾佑諸人。他詩中的新名詞並不多，就因爲他怕破壞了詩的表現力量；他要在不澈底突破舊詩形式的範圍內仍然寫成一首好詩，這自然會使所寫的內容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梁啓超「夏威夷游記」說：「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今別離』四首，又『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尙少，蓋因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避免之也。」但



晚清熱心「詩界革命」的諸人，把詩寫得根本不是詩了，連梁啓超自己後來也放棄了這一運動；而一些做「宋詩」的人又只在形式字句的模仿上用功夫；因此從詩的藝術成就上講，黃公度的詩在詩形的某一程度的解放下容納進一定的民主主義的內容，使詩還能發生藝術的作用；還能使「海內折柬相追，欲讀其詩而知其人者，迄無虛歲」（黃遵楷跋），在當時也是最成功的。我們完全可以認爲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代表詩人。

這也並不僅只指上面所引的那些反帝愛國的詩，雖然那的確是他詩集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思想是連貫的，寫別的題材的詩也同樣表現出他的特點來。譬如「今別離」四首分詠輪船火車、電報、像片及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但仍賦予了新的情感；「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詠新理新事，讀來都並不感到生硬。又如寫愛情的綺豔之辭，也和舊文人的「憶內」「寄內」或猥褻之詞不同，他採取了民間文學的優點，所寫的爱情也是健康的；如「山歌」第五首：

鄰家帶得書信歸，書中何字儂不知，等儂親口問渠去，問他比儂誰瘦肥。

他又有「出軍歌」二十四首，集中未收，見梁氏「飲冰室詩話」。歌分出軍、軍中、還軍各八首，每首的最後一字連起來讀是「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梁啓超評論說：「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現在我們讀起來都

感到氣魄雄偉，充滿了愛國的熱情。在他集中不只歌詠時事的詩，無論哪一方面的題材，差不多都是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貫串着他的新的思想；而且正因為如此，詩也就波瀾壯闊，境界擴大，成就超過了當時一般的詩人。他在「寒夜獨坐臥虹榭」末首中說：「蜡餘忽夢大同時，酒醒袞寒自嘆衰；與我周旋最親我，關門還讀自家詩。」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憂國憂時之情就都表現在詩裏了。

就他的思想說，當然還存有許多保守的改良的色彩。例如對於滿清統治者，就存着許多幻想，直到戊戌政變後才逐漸消除；早年主張模仿日本明治維新，後主張變法必師英國，都和他不想根本推翻滿清的思想有關係。但抱有民主主義的思想是很顯然的，戊戌前一年他在湖南南學會的演講詞中說，「人必能羣而後能爲人」，「國以合而後能爲國」；又說周前「封建之世，世爵世祿世官，即至愚不道，如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驕淫昏昧，至於不辨菽麥，亦靦然肆於民上，而舉國受治焉；此宜其傾覆矣。」這顯然是指當時的政治情勢說的。又竭力鼓吹「地方自治」，說官吏「入坐堂皇，出則呵道」，「吾民之疾病禍難，困苦顛連，問其所以，瞠目不能答」，「乃舉吾之身家性命田園廬墓，委之於宴會之生客，逆旅之過客，而名之爲官者，則烏乎其可哉！」（「錢譜」光緒二十三年下注引）在當時這是極激烈的意見，反映了啓蒙期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又如辛丑和約後他說曾國藩「事事

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說曾國藩忘記了洪楊之徒「爲赤子爲吾民也」。這時他已主張「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說滿清統治者「俾一切士大夫習爲奴隸而後心安，其文字之禍，誹謗之禁，窮古所未有」（皆見「新民叢報」壬寅「論學牋」）。他由事實的教訓中，已堅決主張推翻滿清了。總之，從「人境廬詩草」存詩的一八六五年起，他就已初步地具有了民主主義的思想，這是比康有爲梁啓超諸人都要早的；而且四十年來，他的思想總在不斷地向前進步，這也是超過康梁諸人的。因此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受了歷史條件的限制；他沒有可能超出了軟弱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範圍。

此外他也受到了他的階級出身的限制，所以對事情的主張不够堅強，常帶有溫情的妥協傾向。譬如滿清以制藝取士的考試制度，他是從來就反對的，詩中詠此的很多；但他自己還是應試了，說是「暫垂鵬翼扶搖勢，一學蠅頭世俗書」（「將應廷試感懷」）。而且還解嘲說：「孔孟生今日，必就有司試；豈能無斧柯，皇皇行仁義」；這種妥協傾向主要是由他的出身決定的，他想到了「掄才國所重，得第親亦喜」（「述懷再呈靄人樵野丈」）。因此他集中述及國內政情的詩就比較溫和，最有力量都是記載外禍的反帝愛國的詩；而這些詩才正是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的反帝要求的。他一生沒有做過掌權的大官，四十年中，只在僚屬的

職務內隨時考察各國情況，努力想使中國進步，表現了啓蒙期的民主革命的歷史要求；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殖民地化的程度卻愈來愈嚴重了，這是一個悲劇，而這悲劇正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結果。但從他的作品裏，我們仍然可以體會到中國人民是經過怎樣摸索的道路，來求中國的進步和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 附 記

本文前於「人民文學」發表後，曾引起任訪秋先生的批評。任文主要根據黃遵憲對太平軍及義和團的態度問題，認爲他的政治思想是屬於晚清封建大地主的自救運動（李鴻章張之洞的洋務運動）一類的，毫無進步性可言。而作者則認爲黃遵憲在政治思想上是接近於康梁一派的變法維新的改良主義思想的；但由於當時還沒有發生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種改良主義思想對當時中國人民的覺醒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此也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此後的改良主義思想就再沒有可能發生任何進步的作用，而必然是反動的了，這是我們必須根據歷史情況來加以區別的。康梁維新派是反對農民革命的，對滿清皇室存有幻想；黃遵憲的思想雖然在戊戌政變後有所改變，但基本上也是如此的，不過我們並不能

因此便說他的思想沒有發生過進步的作用。本文主要是就他的詩講的，因此將許多次要的材料都略去未講，遂引起了任先生的批評和懷疑。本文中所要說明的兩點主要意思是：（一）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代表詩人；（二）他的詩中極富於反帝愛國的精神。我想無論就他的詩，或就他的政治思想說，這兩點還是可以肯定的。任先生的文章和作者的答覆均發表於「人民文學」一九五二年一月號，讀者可以參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831B

中國的詩歌有着悠久的光榮傳統。歷史上產生過許多爲人傳誦的詩篇，反映了當時社會一定的現實情況，也反映了當時人民一定的真實要求。這些作品就構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本書選擇了由屈原以至近代黃遵憲等十二位詩人，說明他們對我們祖國作了怎樣的貢獻。



定價 8.000 元

~~1031231~~